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章开沅 马敏 主编
王忠欣 著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第四辑



责任编辑　孙艳魁

书籍装帧　夏金钟

基　督　教　与　中　国　文　化　丛　刊



ISBN 7－5351－2676－6
G·2175　定价:14.80元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章开沅　马　敏 主编

王忠欣 著

第四辑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王忠欣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4辑/章开沅,马敏主编)

ISBN 7-5351-2676-6

Ⅰ.基... Ⅱ.王... Ⅲ.①基督教-宗教文化-影响-教育-中国-近代②基督教-宗教文化-影响-教育-中国-现代 Ⅳ.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5642号

出版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孝感市印刷厂　　(432100·孝感市城站路43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4插页　6.25印张
版　次: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43千字　　印数:1-5 000

ISBN 7-5351-2676-6/G·2175　　定价:14.80元

主　编　章开沅　马　敏

编辑委员会　章开沅　马　敏　王奇生
　　　　　　周洪宇　何建明　史静寰
　　　　　　陶飞亚　徐以骅　刘家峰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教育与英美近代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教育。中国的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尤其是西方的教育，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而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之间的差别则更大。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是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一致的。促进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西方的教育也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固有的教育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改革，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为了了解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历程以及基督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西方的近代教育。

一　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教育。中国的土地上一有人类存在，教育活动也就随之开始。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夏代，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有了文字后，教育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成为国家的重要事务。从夏代始学校也开始出现，当时称为“序”，但它并非独立的、纯粹的教育机关。其教育内容主要为军事教练、宗教教育和人伦道德教育。西周时，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礼、乐、

射、御、书、数等所谓“六艺”的训练，其训练过程是先经过家庭教育，然后进行学校教育。当时，教育已有所发展，分为不同形式。一为小学教育，入学年龄为10至15岁，学习年限约为7年。二为大学教育。这里的大学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中学程度而已，入大学的年龄为15至20岁，学程为9年。小学和大学只设在王都，总称为国学。王都以外的地方学校，总称为乡学。地方学校自乡[①]以下有四学：乡校、州序、党庠、家塾。乡学的教育内容有明确的规定，一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基本要求和国学是一致的。乡学实行定期的考查和推荐，优秀者送至国学。关于小学的考核制度，未见史籍记载。大学第1、3、5、7、9学年考核，合格者毕业。对合格的学生，最直接的奖励就是官职、爵位、俸禄。乡学中成绩优秀者也有奖励，如升入大学的，可免除对国家的赋役。西周时，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专业化还不是很细，教师还未成为单独的社会职业，皆由政府官员兼任。“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因为军事训练是教学内容的重要方面，教官自然也由军官担任。久而久之，作为军官称号的“师”也就转为对教育者的称呼了。西周的学校不仅是教学场所，也是多种社会活动的场所。西周的教育内容可以总称为六艺教育，它是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对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到了春秋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当时创办私学最有

① 这里的乡不是现在使用的行政级别。据《周礼·地方司徒》记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保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见孙培青著《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影响的就是孔丘，他的私学子弟有3000人，其教学内容最充实，办学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私学是私家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它是独立的组织机构，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场所，是分散的、流动的。私学的入学以自由受教为原则，学校向平民开放。春秋时，教师也成为社会中独立的职业。私学的教育内容也突破了传统的“六艺”教育，加入新的内容。如孔丘私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诗》，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书》，古代历史文献汇编；《礼》，道德规范；《乐》，美育教育；《易》，古代哲学；《春秋》，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秦朝时曾严禁私学，但从汉朝起，私学又重新复兴。汉代为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私学则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中央官学中最重要的是太学。由于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太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太学的设立，也就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太学中的教师称为博士，主要通过荐举或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学生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在京都或京郊内18岁以上者中选择产生，为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选择，为非正式的特别生。正式生不仅可以免其赋役，而且还享有一定的俸禄。太学中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但考试制度很受重视。学生通过考试取得一定的科品，获得相应的官职，其后还可参加下届考试，以获得更高的等级和官品。汉朝的启蒙教育多依靠私学。书馆主要是从事识字和书法教育的，书馆里实行个别教育，重视口授和背诵。学生从书馆结业后，除少部分人继续深造外，大部分人中断学业，从事农工商活动。经馆则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程度相当于太学。汉代的私学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

的任务。

汉朝以后，唐朝以前，中国教育事业的延续主要是依靠私学和家学。但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则有了新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儒学外，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也得到设立。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鼎盛时期。隋朝时中央设置了国子寺，后改为国子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国子寺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这些机构称为中央官学。官学，尤其是中央官学是隋唐教育的主干。唐朝的中央官学又增加了培养司法人才的律学，以及为考进士的人创立的广文馆。此外，在太医署下还创建了医学，培养医学生。与中央官学相对应，地方官学也得到发展，地方官学主要有经学、医学和崇玄学三种类型。学生毕业后，或升入中央官学，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去做一些地方小官吏。隋唐在教学管理方面已开始制度化。中央官学规定，学生从14至19岁开始入学（律学为18至25岁）。学校每年举行三种形式的考试：旬试、年试和毕业考试。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与地方官学一样。官学每年有短期和长期两种假期。官学的入学有明显的等级性，达官显贵的子弟依家庭品级可进入国子学、太学等，一般平民百姓的子弟则只能进入水平较低、待遇较差的学校。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

产生于隋唐的科举制，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科举制是一种选士制度。随唐前的选士制度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科举制自唐朝产生后，直到1905年清末才被废除，影响中国教育达1300多年。科举考试考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官学中考试合格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学有成就经

地方考试合格的乡贡。考生到京城后要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填写三代履历，经户部审查后，再将明册送往礼部，然后由礼部定期举行命题考试。考试之日，考生自备水、炭、蜡烛和餐具，考官点名后，方可入场，时间以一日为限。科举考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常科，每年定期举行；二是制科，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常科的科目主要有注重选拔博识高才、出类拔萃人物的秀才科；注重考核儒家经义的明经科；注重诗赋的进士科；注重考核法律知识的明法科；注重考核文字理论和书法的明字科；以及注重考核算术的明算科。实际上经常举行且又为人们所重视的只有明经科和进士科。科举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和诗赋五种。其中帖经相当于填空。墨义是一种简单的笔试。策问是让考生针对某一社会问题写出一篇论文。这些考试实际上主要考查了考生的记忆力。科举制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宋朝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在中央和地方陆续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中央官学中最主要的为太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书。此外还有专科学校六种：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和通学。地方官学有州学和县学。宋朝还在诸路设置提举学事司，管理地方官学，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地方官学在办学经费上，实行以学为主、政府资助、社会献田、捐款集资、学校刻书创收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办法。这一制度为以后各朝代长期沿用。

宋朝太学已经开始实行“积分法”。这是一种积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类似于现在的学分制，这种方法到了元代国子学时已趋于完善。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平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从唐末起，书院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开始出现。书院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到了宋朝，书院的数量大为发展，遍及全国许多地方。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是靠设置学田，传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

明朝时，由于皇帝的提倡，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学校。当时流行的学校主要是官学。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的官学主要是国子监，属大学性质，学生入学资格放得较宽。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也学习当时的律令以及书法等。明朝国子监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创监生历事制度，即教学实习制，学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或地方各部门实习。地方官学主要是儒学和社学。各地方设立的儒学相当于中等学校性质。社学相当于小学程度，基本上每50家设社学一所，主要设在城镇和乡村，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它招收8岁以上、15岁以下民间儿童入学，带有某种强制性。学生主要学习识字，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此外还要学习明朝律令、礼仪等。

清初沿袭明制，在中央和地方广设学校。这时期的官学也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官学仍以国子监为主，其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以及清朝有关的诏、诰、表、策论、判等。学生每天还要临摹晋、唐名帖数百字。教学方法既有教师讲授，又有学生自学和质疑问难。学生的入学资格分为考试选举、高官子弟特权入学以及捐纳资财入学三种。学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地方官学与明代一样分为儒学和社学，儒学设在州、府、县上，社学设在乡镇。社学与州、府、县学在学制上相互联系，社学中成绩优秀者经考试可升入州、府、县学。

然而自嘉庆、道光之后，虽然清朝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十分完备，但学校积渐废弛，已有名无实。清末的官学已完全成

为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属品了。官学教育的目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尤其是考试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科举考什么，学校就学什么；自明代出现“八股”考试后，清末的学校就专教学生仿作空疏无用的八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

由于上述学校有名无实，徒具形式，所以一般真正求学的士子，多在私人所设的学塾读书，故清代学塾甚为发达。学塾的性质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有钱人聘请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称教馆或坐馆；二是教师在家设馆教授生徒，称家塾或私塾；三是地方出钱聘请教师在公众地方教授贫寒子弟，称义学或义塾。

纵观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教育是沿着官学和私学两条线并行发展的。官学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机构，私学则主要承担着启蒙教育的任务。从教学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及各朝的律法等，另有一些史、历、算知识。专科教育主要以武学、医学为主，医学则全是传授中医、中药等知识。学生毕业后的去向主要是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得一官半职。故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准备科举考试。

清末，西方已进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已开始在西方的学校中被教授，中、小学已趋于完善，大学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则还停留在儒家经典、科举考试的状态，难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中国教育何去何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　19世纪英国的教育状况

西方教育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它在近代的发展却领先于中国，在许多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教育的不足。19世纪西方传

教士来到中国，开办了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为已经衰落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来华开办教育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为了了解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我们还需知道19世纪时英美的教育情况。

18世纪末，英国已有小学、中学和大学。英国政府没有资助或控制任何教育机构，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由私人，或私立组织掌管的。在多数情况下，教会承担着兴办教育的义务。

1. **初级教育**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最普遍的初级教育模式是导生制学校。导生制学校是适应于当时英国经济及工业状况的大规模地普及性教育。在导生制学校中，高年级成绩较好的学生协助教师维持秩序，辅导低年级的同学。一名总导生又负责其他导生，而大量的学生只由一名成人教师管理就可以了。教师所要做的就是组织、奖赏、惩罚及鼓励导生们。教师只教授导生，然后导生们再把他们学到的教给其他同学。整个教学方法是机械的，学生们没有机会提问题，他们只是用单纯机械的方法记忆所学到的。进入导生制学校学习的儿童年龄在7至14岁之间，他们不需要付任何费用，但学校要求他们参加主日崇拜。

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初级教育中又出现了民办小学和寄膳小学，并且这两种小学逐渐成为英国小学教育的主流。19世纪中期，一个主要由公理会教友组成称为志愿者的新团体开始出现。这一团体的信条是，所有的教育必须有一个宗教的基础，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是不保险的，教育的普及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和自助。志愿者们开始集资办学，到1851年他们开办的民办小学达364家，没有一家是接受国家或地方的资助的。1870年左右，一个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新的地方当局——学校委员会开始出现，学校委员会有权力用政府拨款、学校学杂费

及地方税来开办和维持公共小学。学校委员会开办的小学就是寄膳小学。民办小学和寄膳小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一般来说，寄膳小学是世俗的，无宗派背景的，是由地方当局开办的，并由政府拨款和地方税所维持的。民办小学则大多数是有宗派背景的，是由捐款或赞助开办的，其维持费则部分来自捐款，部分来自政府拨款，但不是依靠地方税。寄膳学校并没有遍及整个英国，它只是建立在民办力量所不及的地方。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也开始对教育进行干预。1862年英国教育部颁布的《修订法规》规定，儿童上小学的年龄为5岁，小学毕业年龄为12岁。小学毕业的程度为具有阅读一篇报纸短文，并把它听写下来以及能够算账的能力。小学共分6个水平（相当于年级），1882年又增加了第7水平。从1880年开始，英国实行义务教育制，从1891年开始小学实行免费教育。

2．中级教育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中学主要有资助学校和文法学校。这两种学校是免费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文法学校的课程主要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尤其是算术都被拒之门外。除了文法学校外，还有私立学校存在。私立学校的课程主要有算术、图画、历史、地理和现代语言等。资助学校和文法学校只招收男生。大多数中下层家庭的女子则进私立学校读书。在女子学校中，除了阅读和写作外，还开设现代语言、图画、刺绣、声乐、器乐等课程。

19世纪上半期的中学教育同以前相比，没有多大改进。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中学的课程开始有了变化，虽然古典著作和宗教指导在公共学校中还占主要地位，但数学、语法或德语，某些自然科学、音乐、图画也开始被包括进来。一般来说，进入中学的年龄在十一二岁左右，离开学校的年龄在16至

18岁。中学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外，主要依靠赞助和学杂费维持。

3．高等教育

在英国，几乎所有的教育都由国教会所控制，大学也不例外，在19世纪，英国的大学主要有牛津和剑桥。

19世纪中期这两所大学的课程主要有古典著作、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和历史，学费非常昂贵，通常只有富贵人家及上流社会子弟才能读得起。这种状况受到了社会上一大批非国教徒的反对，他们要求新的、实用的学科而非陈旧的、传统的及所谓“文化”的教育。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不受国教会控制的新的大学开始出现，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其课程主要包括语言、数学、物理、古典文学、实验哲学、化学、道德学、逻辑、英国文学、商业原理、作曲、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学、医学、外科，学校还附属一所医院，学校的学费也很低廉。新的大学主要是为中下阶层服务的。

4．女子教育

在19世纪的英国，女子在初级教育方面，与男孩已无多大差别，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力。但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方面，则仍受到一些歧视。由于赞助学校和大学建立的目的，是为培养在社会和国家侍奉上帝的人才，所以妇女就不包括在这一类人中。19世纪中期，大学的大门仍是向妇女关闭的。公共学校也不接纳女子，只有很少几所赞助学校向女子开放。大多数中上阶层的女子都不去学校，通常在家中由瑞士、法国或德国籍的家庭女教育辅导学习。女子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行为举止上，事实上，当时女子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使女子变得有吸引力，因为向女子开放的惟一事业就是婚姻。这一点倒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习俗差不多。

然而从19世纪中期起，女子教育的改革运动首先从高等教育中开始了。1848年皇后学院建立，该学院首次招收成熟的女子入学。1869年剑桥大学开始对18岁以上的女候选人实行高等地方考试。但女子仍不能被授予学位。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向女子授学位。

从19世纪50年代起，争取女子中等教育的运动也开始展开，进入中学的女子逐年增加。19世纪60年代学校调查委员会建议，在每一个可以建立文法学校的城镇，也应该为女子建立日校，教授数学、拉丁文等课程。一般进入中学的女生都是中产阶级的女子。从70年代开始，女子公共日校开始设立。到1891年在英国各地已有36所女子公共日校。在女子公共日校中，主要课程被安排在上午，下午则学习音乐、艺术等。

三　近代美国的教育模式

19世纪美国的教育与英国的教育有很大不同。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的教育主要由教会来承担，政府很少过问教育的事。但在美国，政府在普及教育方面则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分为50个州，各州都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故教育在美国的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亦不是绝对平衡的。大致说来，美国的教育主要在新英格兰地区率先发展，然后由东北部向西部、南部扩展。波士顿和纽约可以说是美国教育的先驱。另外，美国的宪法规定政教分离，故美国公立的教育很少有教会染指，但大多数私立学校则与教会有密切的关系。

19世纪，美国的世俗主义流行，也影响到教育。由于失去了宗教热情，许多教区学校找不到赞助而逐渐关门。然而美国

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教育。早在18世纪末，联邦政府就表达了支持公共教育的意愿，并提出在每个镇都要建立公立学校，政府可在经费和土地上予以支持。

1805年，纽约市免费学校协会成立，该协会主要致力于推动儿童的免费教育。1826年该会更名为公立学校协会。起源于英国的主日学校也在美国的初级教育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主要为被忽视的下层人民服务。1818年波士顿开办了幼儿学校，接收4岁的儿童入学，学制为2年。学生经2年的学前训练后再入小学。

19世纪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公立学校是由公众资助，在州政府的管理下，向全体公众免费开放。这种由税收支持的学校主要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公立学校制度首先是于19世纪上半期从波士顿开始的，迅速遍及全美。它的这种免费及向全体公众开放的特点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世纪以前，美国的中等教育机构主要是拉丁语法学校，主要教授古典知识，然而，随着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学（Academy）开始出现，并且逐渐取代了拉丁语法学校。早在18世纪50年代中学已经出现了。中学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私立的中学一般都要求学生付学费。与拉丁语法学校一样，早期的中学也只向男孩提供教育机会。中学所设立的课程主要是一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如自然科学、实用语言、商业的技巧和指导。到了19世纪中期，中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以后，公立中学逐渐占了上风。

由于学生家长的压力，从19世纪20年代起，一些公立学校开始向学生提供超出小学程度的课程，这样学生的毕业时间就

延迟了，这一课程的增加与延伸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免费的公立中学。

最早的公立中学于1821年在波士顿出现。公立中学由公众出资兴办，学校为商贸阶级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入学的年龄为12岁左右，学习期限为3年。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作文、语法、朗读、数学、航行、测量、历史、地理、逻辑、道德政治哲学等。真正赋予公立中学力量的是法律。1827年马萨诸塞州法律规定，每一个有500个家庭的城镇要设立一个免费的、由税收支持的中学。马州的样板很快被其他州所效仿，到19世纪60年代，全美已有300多所公立中学。公立中学是美国的产物，它是美国民主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

美国的公立小学是向男孩和女孩平等开放的。但小学以上的教育，性别上的平等就停止了。虽然也有女子私立中学存在，但数目极少，学院完全是男人的世界。经过数十年努力，到19世纪中期，一些女子学院开始在南部和西部出现。1833年俄亥俄州率先开始了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在教育上一直领先的东部，在女子高等教育和男女同校教育方面则非常保守，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实行。

美国的大学分为私立和州立两种。私立大学大都是由教会兴办，且是由各宗派的神学院演变而来，其历史也较长。州立大学则是从19世纪开始兴办的。美国的第一座世俗的州立大学是成立于1825年的Virginia大学。真正促使州立大学发展的并不是州政府，而是联邦政府。在1862年的Morrill法令中，联邦政府自愿给每个州3万公顷的公共土地作为兴办高等教育之用。由于这项法令，70多所大学应运而生。一般来说，申请进入大学，申请人需要出示证明或通过考试，表明他或她在中学期间的15门课程取得了尚好的成绩。这些课程主要包括英语、

数学、科学、历史、古代或现代语言。有时学校还会要求一些关于申请人品格的材料，如申请人牧师的证明、有信用之校友的推荐等。

早在18世纪，美国人就开始关注师范教育的重要性。1816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建立培训师资的学院的请求。1823年美国的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在佛蒙特开学，学习内容主要有数学、伦理、逻辑和基督教的证据。1839年在莱克星顿，马萨诸塞州开办了全美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然而，师范学校开办的初期也遇到很多人的反对，不光纳税人，就连中学和私立学校也反对，他们认为师范学校毫无意义，是浪费钱财和时间。直到南北战争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师范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　中西教育的异同

综观中国传统教育和英美教育在19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英美的教育同中国的教育并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英美的近代教育都是沿着公共教育和私学两条线发展。中国古代的公共教育称为官学，主要由政府所倡导和主持，学生毕业后也主要在政府机构工作，谋个一官半职，故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有影响。由于长久的中央集权传统，中国的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也就是说各级政府都有责任办学。政府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办学方面也显示了出来。在英国，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起步较晚，一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才开始参与教育工作，拨款开办一些学校。从总体上看，英国官

学的比重较小，私学的比重较大。美国的教育境况与中国较为相似，其公共教育由政府操纵，并且较为发达，政府在普及教育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中西教育虽然都有官学和私学，并且官学都由政府所支持，但两者之间也还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中西私学的承办者不同。中国的私学主要是由儒家学者士大夫所主持开办，这是中国民间办学的一个特点和传统，儒生在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办学似乎毫无疑问是儒生的专利。英美的私学则主要由基督教会来主持。从历史上看，教会一直是英美社会中的基层社会组织，负责社区的一切公益事业，开办教育自然也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故基督教在英美的教育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英美传教士秉承他们在西方的传统试图在中国开展教育活动也是十分自然的。

其次，19世纪英美的学校中已开始教授许多科学课程。我们知道西方的科技从近代开始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发明都产生于西方，从物理、数学、化学中的许多以西方人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公式、元素等，我们就可看出西方人对科技所作出的贡献，西方近代的科技成果自然也影响和促进了他们的教育，所以到19世纪时，英美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已经开始教授自然科学的课程。与此同时，中国清末的学校教育内容却还是局限在儒家的经书中，没有自然科学的课程。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传统内容，这种悠久的传统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包袱，有时会阻碍新生学科的植入。中国虽然也有过四大发明，在科技上也有过领先，但这些科学都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这不能

不是一种遗憾。在近代，中国传统教学内容的这种落伍的状态自然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难以抵挡西方先进的教学内容。

第三，19世纪英美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末才刚起步。西方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末，在宗教改革期间，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已经出现了大学，美国的大学也在17世纪出现，如哈佛大学等。到19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大学不管是在教学内容方面，还是在教学水平上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现在大学中的课程，在那时的大学中已经出现，现代的西方大学是在当时的大学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过来的。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大学这个名称，并且也有过较为高级的学校，但不管是在这种学校的连续发展上，还是在其教学内容上，都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大学都是建立于19世纪末，并不是在古代所称的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面几乎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这也就是说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差异也是中西近现代实力发展悬殊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这些方面我们似乎可以预感到，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以及教会学校的开办，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一定会起到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的官学在近代已经衰败，私学较为流行，而传教士在西方又是开办私学的主力，所以传教士不管是在办学动力上，还是在办学经验上，都会对中国教育的复兴有所贡献。传教士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也会把西方已有的教学内容输入到中国，不论传教士的主观目的是什么，西方先进教学内容的输入必定会带动中国教育的革命性变革，使中国的传统教育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西方的高等教育也会透过传教士将

其模式和内容渗入到古老的中国，使中国在经受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后，不能不对传教士鼓吹和举办的西式高等教育另眼相看，从而使中国产生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传教士到底会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介绍。

参考书目：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李桂林：《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Marjorie Cruickshank, *Church and State in English Education: 1870 to the Present Day*. St Martin's Press, 1963.

H. C. Barnard,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From 1760 to 1944*.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47.

S. J. Curtis,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Lcd, 1948.

Adolphe E. Meyer, *A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7.

Adolphe E. Meyer, *An Education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65.

第二章　传教士在华开办的中小学校

虽然从19世纪初起就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传教，但人数极少，并且传教的方式也是秘密的。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传教士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公开地借助各种方式，向尚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传播基督教。随着传教活动的深人展开，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最初的教会学校都是中小学。

传教士来华的初衷并不是办教育。许多英美的基督徒感到在迫近的千禧年来临之前，拯救尽可能多的灵魂是一项迫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讲道和分发基督教的单张来播下福音的种子，就成为传教事业的首要任务。至于办教育，一些传教士认为这将会从拯救灵魂的最重要的目标中转移基金和能量，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另外，教学可能会使福音活动世俗化。故此，许多传教士反对办教育的努力。然而，最后大多数传教机构都开办了学校。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传教士的讲道和福音单张并不十分感兴趣，这使得传教士们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渠道与顽固的中国人进行交流，他们很快发现，学校恰恰是一种把福音扩展到家庭的适当而有效的方法。由此看来，中国人对基督教福音的抵制，是教会学校得以发展的一个直接的缘由。许多传教士在办学校的时候发现，通过接收小孩入学，为他们提供食、宿，教育他们，起码可以保证有一批福音的听众。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崇尚学习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座右铭。中国人对学习的渴望可以被用来作为联系

中国人的桥梁。而最初的教会学校也必须满足中国人对学习内容的企求。故19世纪教会学校中理想的课程都是与中国传统的课程密切相关的。

一　教会学校的一般发展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即在1860年以前，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口、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

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人R·S·布朗（R. S. 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是马礼逊教育会委托布朗创办的。1836年9月28日在广州的部分外侨为纪念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美国商馆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其宗旨为采用开办学校和其他办法，改进和推动中国的教育。该会成立后就向英国、美国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经费由该会负责。该会聘请到的第一位牧师就是美国人布朗，他于1839年2月19日到广州，后又去澳门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为创办学堂进行筹备。1839年11月4日，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首批学生共有6名，全为男生，年龄最大的15岁。他们全部住在校内，免缴学杂费并享有免费的食宿以及必要的衣物。当时学生半天学中文，半天学英文，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除了学习外，也有一些课外娱乐活动。

1842年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到香港，学生人数有所增加，

达到20多人，大部分是从澳门迁来的，小部门是在香港招收的。学校的课程也有所增加，并渐趋正规，除中文课外，西学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经过了三四年学习后，除熟悉中文外，对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都有了相当的基础。与此同时，学校也向学生们宣讲基督教的知识，学生可去布朗家参加早晚礼拜。到1843年，该校学生人数发展到42人，分为4班，同时《圣经》也被列为必修科目。因师资和经费短缺，马礼逊学堂于1849年关闭。

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华开办的小学比较有名的还有：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这对中国的女子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年，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了崇信义塾。此外在上海、福州等地传教士也开办了一些男塾。

1860年英法联军打人了北京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其中准许外国传教七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伴随着传教的深入，教会学校也迅速地增加。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当时比较有名的教会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山东登州开办的蒙养学堂；1865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开设的崇实馆；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培雅学堂；1866年在上海开办的度恩学堂；1867年在杭州开办的育英义塾；1870年在苏州开设的存养书院；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惠廉纪念学堂等。

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业日益增多，同时

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3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19世纪后期，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也开始起了变化，特别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多数教会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贫苦孩子入学，而是设法吸收富人子弟入学，并且收取较高的学费。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宗教教育。无须讳言，教会学校开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故在教会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程及要求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是理所当然的。教会学校中的宗教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有关的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此外，学生还被要求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

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

三是西方科学知识。19世纪时，英、美的学校中开始设立了一些科学课程，当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时，自然也以英、美的学校为模式，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

另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最早开设英语课的教会学校大都位于通商口岸。1865年上

海英华学堂率先开设了英语课。到19世纪90年代时，大多数教会学校都设立了英语课，有些学校还用英语教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　早期教会学校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吸收与融合

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封建社会，人们对教育的渴求不仅来自通向上流社会的科举考试的引诱，而且也来自商品市场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中国的广大农民都卷入了当地的商品市场，在买、卖、土地租用、借债、分家以及政府的征税、户口登记、发布谕令等方面，老百姓都需依靠书写的契约和文件。在清朝，中国的官学虽然日落西山，但私学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私学有着明确的课程和辅助系统。一般老百姓都有机会接触私学。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捐资兴学是一种崇高的、有价值的活动。慈善学校的捐助者在当地的乡邻中备受尊敬，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匾上以纪念他们的功德。中国人也懂得运用学校去宣传、普及他们所期望的价值和学说，这就是为什么儒家官吏和皇帝要在老百姓中提倡教育。教育可以改变人，教育作为道德改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中国的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也以相似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开办教育的动机。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学生能够得到一些基督教书籍，他们把这些书带回家，仔细阅读，那么基督教的伟大真理就可能在他们心中扎根，他们在家中也就可能成为真理尺度的掌握者。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寻求中国儿童入学的传教士就必须首先去适应中国的价值体系。只有当教会学校提供了中国人所认为的适当教育，即教授适当的传统的中国教学内容时，老百姓才会对这些学校感兴趣。

中国小学程度的私塾从宋代起，所用的教材主要为：《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这三本书为初入学的孩子提供了约2000字的知识，其主要价值就在于为初学者识字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形式。学完这三本书后，学生们将进一步学习《四书》和《五经》。这些教材是儒家教育的核心。

传教士最初开办学校时，毫无选择地只能使用中国传统的教员和教材。很少有传教士拥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用中文讲课。例如在马礼逊学堂，学生半天学习英文，半天学习中文，而中文的教材、教学方法都是采用传统中国式的，教员也由一位年长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担任。当然，传教士们希望他们所雇用的中国教师最好是基督徒，但由于这样的人很难找，在初期，许多非基督徒也在教会学校任教。后来，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对英语的需要开始增加，英语逐渐成了教会学校中的通用语言。除了中国传统经文外，其余课程都可用英文讲授。这时非基督徒在教会学校中任教的现象才逐渐减少。

早期的教会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提供许多物质利益，但入学的学生还是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中国古典经文以外的知识不感兴趣，许多学生进入教会学校后，学了一些中国经书和英语后，就尽早离开了学校。为了吸引学生，教会学校必须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当时传教士对在小学教育中是否使用传统的中国教材有过争论。有的传教士认为《三字经》之类的书，除了帮助识字外，毫无其他知识可言。他们希望在教会学校中提倡基督教的

价值而终止中国传统的价值；中国经书是阻碍基督教传播的绊脚石。但是也有许多传教士主张使用中国传统的教材，他们认为中国经书中几乎没有教义成分，其道德教训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如果期望向中国人推荐教会学校，传教士必须尊重中国人关于学者的看法；如果想通过学生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知识，这些学生还必须懂得他们自己的文化。即使许多拒绝中国传统课目的传教士也认为中国经书必须被保留在教会学校中。由于没有自己合适的教科书，大多数教会小学还是要使用《三字经》等中国传统课本。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开始以《三字经》的格式撰写基督教的教学小册子。在正统的中国小学教科书中，只有《三字经》被传教士广泛地模仿。到19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包含基督教道理的小册子以《三字经》的格式和标题写出来，在教会学校中广泛使用教授，并收到不错的效果。传教士自己编的三字经包括《素女三字经》、《三字经注释》、《圣教三字经》等。所有这些小册子都像中国三字经一样，三字一节，押韵排列，讲述福音故事。基督教的三字经先以描述上帝开始，然后讲亚当、夏娃的故事，人的堕落，原罪的概念，人有永恒的灵魂，耶稣的到来，为世人的罪而死，相信他的人将得救，救赎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基督徒的任务有三，读经、受洗、圣餐，最后以对千禧年的描述告终：那时所有的坟墓都要被打开，所有的人都要受上帝的最后审判。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圣教三字经》："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

在编写基督教三字经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把基督教的一些术语翻译成汉语。许多传教士采取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佛教和民间宗教的术语。如把God译成神，把Soul译成灵魂，把

Heaven译成天堂，把Hell译成地狱等。

通过对中国传统教材和教学方法的采用与改进，教会学校找到了一大批福音的听众，当然传教士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直到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教会学校才真正把西方的教学课目较多地介绍给了中国人。

三　教会学校的典例——登州文会馆

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小学校数以千计，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的遭遇，我们很难在这本书中将每个学校都讲述一遍。为了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有一基本的感性认识，我们不妨以当时十分著名的教会学校——山东登州文会馆作为一个例子，对当时的教会学校作一番观察。登州文会馆是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1864年9月25日正式开学，初名为蒙养学堂，是教会小学，1873年起设置中学课程，1876年正式改名为文会馆。

开办学校实际上是狄考文妻子的主意。狄考文的妻子朱莉娅因不能生育，故选择了当一名养母的角色。在1873年以前，她一个人承担了学校⅔的工作。学校创办的初期凝结了她的大部分心血。所以狄考文总是承认登州文会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朱莉娅的功劳不可抹掉。

1864年秋天蒙养学堂开学时，使用的是儒家的教材，并且免收学费，所有的费用都由狄考文负责，包括一切衣履、鞋袜、饮食、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的路费。然而老百姓对此的反映大多都是冷淡、恐惧或疑虑的，有钱的上层阶级则认为传教士开办学校是太放肆了。故首批学生寥寥无几，只招收了6名穷孩子人学。这些孩子年龄不等，最大的11岁，都来自

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除一人外，其余都不识字。他们全部住读。由于狄考文夫妇的汉语水平有限，他们请了一位教徒张干臣帮助教书。识字启蒙的教材为《三字经》，每天上课前，张干臣都要先带领学生祷告、读圣经。然而第一年的效果并不理想，6名学生中有2名被其多疑的父亲带回了家，1名由于过分呆滞被劝退。3名新生被招收进来。总数仍为6名。但没有一人皈依基督教。

为了扩大招生人数，狄考文向他的差会写信，寻求经费。他的差会批准了他的要求，给了他足够的资金。这样又有6名学生人学，在校人数达到12名。蒙养学堂的学生主要来自登州附近的乡下，特别是长老会影响较大的地区。狄考文常去这些地方向老百姓宣传他的学校。如果双方都满意，他们就签订一份契约。作为学校的监督，狄考文答应要用儒家的经书教育小孩，并提供食宿、衣物、医疗等费用，并保证不把小孩带离登州。学生父母则同意，在完成学业前，他们的儿子则不能回家或营业。若无故离开学校，学生人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前，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许方可。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

早期的蒙养学堂学制为6年，而契约又尽可能长的把小孩留在学校，故许多家长不愿签订契约，或以后与校方在此点上争辩，因为他们确实也需要有壮劳力帮助他们在田间劳作。许多家长撕毁契约，违反学校条例，让他们的儿子回家。狄考文用契约维持学生人学的实践并不成功。由于缺乏可靠的教师、教科书、持久的课程，加上学生流动性很大，蒙养学堂在早期的办学中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和困难。从1864年到1872年，蒙养学堂共招生85名，而学满6年者仅有4人。学生中皈依基督者有14名，到1872年时背道者已有5人。到1874年，总共人学

的91人中只有7人完成了6年学业，27人肄业，17人因学习跟不上而退学，11人因愚顽而被开除，另有11人失踪。在14名皈依基督者中，真正能效用教会者只有1人。1874年朱莉娅曾说过，我们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的朋友或亲戚由我们的学校带到福音的影响下，学生回家探亲非但不能宣讲福音，反而使得他们更加反对基督教。由此可见，在教会学校开办的初期，事情并不像传教士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从1873年起蒙养学堂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件事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学校改变了招生政策；二是建立了更好的教材和课程；三是师生之间的交流有了突破。

在招生方面，蒙养学堂一改过去在穷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而注意招收年龄稍大，基础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学，基督教的影响比以前有所扩大。1873年，狄考文鼓励学校中的基督徒学生邹立文参加蓬莱县考，结果名列前茅。在随后的10年中，学校又推举17名学生参加县考，结果16人通过。这些事都使蒙养学堂在当地民众中赢得了好的声誉。报考蒙养学堂的申请者明显增加。狄考文在录取学生时，仍与学生家长签订长达12年的契约，并且在契约中学生家长被要求每年支付部分费用。1874年时只支付衣服费，以后逐渐扩大到住宿、儒家经书、学校供给等。

在课程方面，儒家典籍的学习一直占总课程的⅓，几乎占用学生学习时间的一半。1873年县考的成功，使得狄考文更加重视中国经书的学习。狄考文看到中国社会的支柱是儒家思想，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摇篮，教会学校要在山东立足并产生影响，不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是行不通的。否则学生毕业出去会被旧式士大夫看不起，另外参加科举考试也需要儒学知识，所以蒙养学堂很重视中国经书的学习。

除了儒家经书外，基督教的宗教教育也是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教育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必修的《圣经》课程，二是参加礼拜和到校外实习传道。学生在校期间还在课余组织辩论会、传道会、戒烟酒会、新闻会等活动，培养演说的能力和学习做社会工作。

西方科学课程和实验课程则是蒙养学堂教学内容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使该校赢得声誉的突出之点。狄考文一直在学堂中不定期地讲授算术。1873年时他开设了中学课程，如代数。到1876年时他又开设了几何学、三角学、天文学和化学等课程。朱莉娅也在学校为学生们开设了地理课和音乐课。学校使用的教材，除上海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的一些教科书外，狄考文自己也编写翻译了一些教材，如《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要理问答》、《振兴实学记》等，他还编了一些教义，如《理化实验》、《电学》、《测绘》、《微积习题》等，供学生使用。西方科学课程的开设使学生们彻底信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是有用的。中国基督徒对西方教育的认可，也使教会学校的声誉进一步提高。

在师生关系方面，狄考文夫妇与学生们建立起了成熟的、带有人情味的师生关系。狄考文夫妇对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和以后的工作非常关心。学生有困难时，狄考文总是毫无偏见地、慷慨地、恰如其分地找出帮助他们的方法。当他制定出条规后，他总是严格地执行，如有人违反，他就严厉惩罚，但是事情过后，他就立即忘掉了，再不去想它。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狄考文为学生制定了条规和禁令，使学生的生活条理化。1876年学校开始实行导生制，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狄考文对学校的一切——课程的难易、教师的勤懒、学生的适应不适应——都了如指掌。朱莉娅则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年幼的孩

子。她总是不知疲倦地亲自检查饮食、宿舍的温度。如果学生的衣服脏了，她就帮着洗，如果衣服破了，她就帮着补，如果有的地方脏了，她就组织大家打扫，如果有学生病了，她就给他们医药，学生的生活都在她的照料之下，学生们也都喜欢她，尊敬她。狄考文夫妇还帮助学生成亲、找工作，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种师生关系，使得双方互相感谢、互相尊敬、互相忠诚。

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变化，蒙养学堂的入学人数不断增加。1874年入学人数为22人，1876年则增为34人，1880年入学人数更达45人。学生中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1874年入学的22名学生中，竟有14人受洗入教。狄考文夫妇为学生开设了道德科学课，他们通过讲座、问答等形式建立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学生们至少每天与他们见一面，礼拜天则在崇拜、演说、宗教讨论等活动中见4次面。1876年学校还成立了由学生自愿参加的传道会。传道会的成员平时在学校中向非信徒学生传道，礼拜天则走出学校向社会传福音。

1876年底，狄考文夫妇发现有3名学生已经掌握了学校所教授的一切课程，并且他们也在学校中学习了10年，已经可以毕业了。于是1877年2月，学校举行了第一次盛大的毕业典礼，学生、学生家长及当地的外国人都被邀请来参加。狄考文在毕业典礼上宣布这3名学生完成学业，予以毕业，并发给了他们毕业文凭。这是蒙养学堂结出的第一批果子。

作为毕业典礼的一部分，蒙养学堂正式改称为登州文会馆。从一个男童寄宿小学变为一所教会中学。

登州文会馆的办学经费最初是由差会支持。为了减轻差会对外宣教的负担，狄考文想尽一切办法减少学校的花销。从1874年起，狄考文开始改变以往全部免费的作法，开始向学生

家长收取部分费用。但是办学的大部分费用还是来自他从美国差会以外得来的捐款。狄考文写信给他神学院的同学、教会的牧师及朋友，报告他创办的登州学校的情况，要求他们捐款支持。到1876年差不多有50多所教会都收到了这类的信件。对狄考文的回应是以主日学班级的认捐款的形式出现的，美国的教徒特别喜欢对单个的中国学生进行赞助。所以许多中国学生都是由美国教会主日学的学生支持完成学业的。当时每个学生的费用约为15美元左右。从1881年开始，登州文会馆升为具有大学水平的学院。1904年迁到山东潍县改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逐步扩展为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关于这一段的发展变化，我们还将在以后几章陆续提到。

四　英国浸信会在华开办的学校

英国传教士中开办学校的也很多，我们仅以英国浸信传道会为例，看一下英国传教士在华开办学校的情况。

英国浸信传道会在华开办教育的目的，正如其国内委员会1928年所阐明的那样，有三点：一是使年轻人皈依基督；二是提供一种基督教的教育，特别是为基督徒的子弟；三是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一定的贡献。

为了使基督徒的子女每日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就需要有基督徒的教师，他除了教孩子们读、写、算、地理和历史外，还要指导小孩学圣经，参加早、晚崇拜。由此可见培训基督徒教师的任务非常迫切。1884年英国浸信传道会在山东青州府开办了第一所培训学校。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从一所中心寄读学校中发展出来的。中心寄读学校从村学中挑选男童入学，向他们提供中、西课程教育，其中较聪明的学生则被挑选出来进

一步训练，以准备担任教学工作。

1893年当该会第一位女传道人来到山东时，他们又在青州府开办了一所女子中心寄读学校。英国浸信传道会还在山西、陕西开办了许多小学，大多数学校都是寄读学校，建立在村庄中，备有基督徒教师。1905年以前，西方的教育主要是由教会学校输入到中国的。

1905年时，英国浸信传道会在这三省开办的村庄教会小学，在许多地方都已成为当地教会的生活中心。成人早、晚及主日参加学校的祷告和崇拜，主日学也在学校的房屋内进行。许多教师也成为当地基督徒团体的领袖，在传福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正常的崇拜、学习圣经以及参加主日崇拜都是教会学校生活的中心特点。在1928年以前，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参加这些正常的宗教活动。

1911年以后，由于对西方教育的需求，许多非基督徒也要报考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入学人数大大增加，这也对教会的福音工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英国浸信传道会在中国也开办了一些中学，学生毕业后或成为基督徒教师，或到电报、邮电、海关部门工作，还有一些升入大学继续深造。浸信传道会还选派一些学生赴英国、加拿大留学。

五　中华教育会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教材和各学校间的协调问题。我们知道传教士刚开始办学校时，毫无新教材可言，他们不得不沿用传统的中国教材，在教学方法和内容方面没有多少创新。为了同中国传统

的学校竞争，吸引更多的儿童入学，编写出版新的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大会决议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为教会学校编写、组稿和出版新教材。这是中华教育会的前身。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根据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结合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为了有效地推广教会学校教育，制定了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编辑方针：1．最好是编，不是译，文字用最浅显的文理，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易于接受；2．不仅为学生用作课本，而且教员也可用来进行教学；3．不仅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要着眼于让教外学生使用；4．最重要的是，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①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傅兰雅、狄考文、丁韪良（Will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黎力基等。其创办经费大部分来自上海的外商和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该委员会成立后便开始编辑教科书，到1890年，一共出版了约3万册教科书和图表。教科书共有59种，包括宗教教材、数理化教材和外国史地教科书。

教会学校的增多，使得各学校间的交流、合作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了协调各教会学校间的工作，1890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议决，将原有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中华教育会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教会学校的

---

①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附录E，《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第712—719页。

联合组织，其工作范围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中华教育会规定的任务包括：继续负责编辑出版学校教科书，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和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的经验，策划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具体措施。该会章程的第二条则对该会的目的作了明确的说明："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加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兄弟般的合作。"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特别是中华教育会的成立表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开始时将办教育视为有碍于传福音转变为将办教育视为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并予以高度重视。教会学校的出现与发展，特别是西方科学课程的开设，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或多或少都会起到刺激和推动作用。当然，教会学校开办的权力来自西方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则是基督教的不幸。

参考书目：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85.

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H. R. Williamson, *British Baptists in China 1845 - 1952*. London: The Carey Kingsgate Press Limited, 1957.

第三章　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也在近2000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当数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在通州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育英书院。

一　登州文会馆

早在1877年登州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由一家教会小学升为教会中学时，该校校长狄考文就有了一个长远的打算，想把文会馆逐步地升格为大学性质的教会学校。他甚至在该校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上，宣布在该校读完10年的3名学生邹立文、

李秉义和李青山为大学毕业，并发给了文凭。当然没有人承认他们真的是大学毕业，然而他们却成了日后齐鲁大学的最早一批校友。

1879年5月至1881年1月，狄考文夫妇回美国休假。他一面积极为文会馆募捐，一面进修科学知识。此外他还积极扩展文会馆的声誉，向美国长老会建议把文会馆扩充为大学。1881年1月，狄考文夫妇回到了登州，他们再次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正式提出了：一、登州文会馆宜扩建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二、书院由山东教会组成6人托事部负责管理，差会部给予认可。三、书院学制为6年，包括学习中国典籍、普通科学和基督教伦理，设置"四书"、"五经"、中国历史、《圣经》历史、世界通史、数学、物理、心理学、伦理学、基督教教义论证等课程。四、书院的目标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给学生进行充分的中西学教育。五、整个课程都用中文教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教授英语。六、设立大学预科。七、书院最终要求学生完全自备学费入学，同时尽快地培养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国籍师资。八、书院目前仍设在登州，是否迁往更为中心的地点，容以后再行考虑。[1]

美国长老会差会于1882年批准了狄考文的要求，同意将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其中文校名暂时不变，英文名称改为Tengchow College，并答应在经费和师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狄考文成为了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校长。

狄考文将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后，首先在管理和学制上作了较大的变化。学校在行政上分为两部分，一是正规的大学部，

---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 207.

学制为6年，称为正斋，狄考文负责大学部的工作；二是预科部，称为备斋，学制为5年，由朱莉娅负责。在入学程序上，狄考文设置了基于学校课程的入学考试，包括面试。

在课程建设方面，狄考文仍沿袭以往西方科学、中国经典和宗教指导相结合的课程结构，但增加了不少新课程，并形成统一的课程，每年都可提供。在西方科学方面，登州文会馆设有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其中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三角和微积分，另外还有测量学和航行学。这些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除了自然科学，登州文会馆还开设一些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生在最后一年还要学习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称为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这3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

文会馆不仅重视科学课的教授，而且也重视学生们的实验能力。学校经常举行地理知识旅游、天文观察、物理实验等。早在狄考文在美国休假期间，他就积极为文会馆筹备理化实验室，他从一家光学仪器厂得到一架10英寸的天文望远镜，还从一家电业公司那里募到一套发电设备，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图书仪器。除了来自美国的设备外，文会馆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仪器设备都是由狄考文自己设计制造的。他还教学生一起来制造仪器，学会做实验。文会馆的学生从科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习中，得到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的许多新鲜事物，对于学生及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启蒙影响。

文会馆还十分重视中国古典经书的学习。毕业生需要熟记“四书”、“五经”，并要学习对此的注释，写出自己的评注，并能按照中国传统的格式写出诗赋。学习中国经典的重点在于使毕业生们能够熟知并适应他们自己文明的社会。狄考文认为

西方的知识或许可以改造中国，但这些知识首先要用中文表达出来。

在宗教指导和道德科学方面，文会馆主要教授“天路历程”、救赎哲学、罗马书等课。学校所提供的56门课中只有6门是宗教的并全是解释性的。1880年以后，文会馆的学生大多来自基督教家庭，学校制定了一些礼拜条规，督促学生的宗教生活。从70年代中到1900年，狄考文负责每天的祈祷，并在礼拜三晚上和主日讲道，学生们则被要求参加主日学和晚祷会。学生中的宗教组织也不断增多，1883年学生成立了勉励会，每周聚会一次，学习圣经、唱诗、交流彼此的宗教经验。1885年传扬福音会建立，目标是向其他省的中国人传福音。青年会传入中国后，这些组织都被青年会所吸收。

文会馆在生活和学习上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学生的伙食和衣着都很简朴，住的是土坯砖炕。每门课都有提问和测验，每月和期终则有考试。学生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暑假，春节和圣诞节放几天假，平时每天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周六则为两个小时。

经过多年的建设，狄考文为文会馆扩建了校舍，添置了图书仪器等设备，建立了天文馆，安装了发电设备，扩充了印刷工场。在师资方面，1895年时学校有4至5名传教士和5名中国教师，其中4名是文会馆的毕业生。学校提供的课程与美国一般大学的课程不相上下，在中国则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该校成为早期基督教大学的佼佼者。

学生的正规化及较高的声誉也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入学。1900年时文会馆在学学生达到近50名。据1908年统计，文会馆从1864年到1904年共毕业学生26届，170名。另外还有近200名肄业生。毕业生的生路从早期主要为教会服务转向社会。文会

馆办学40年，教出的学生虽不到400名，似乎数量很少，但其能量却不可低估。这些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除在教会工作的以外，大多数在国家重要机关和学校工作。在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北洋大学、云南政法学堂、保定和奉天的陆军学堂中，都有文会馆的学生在执教，或担任教学行政职务。所以文会馆在19世纪的华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　圣约翰书院

与登州文会馆相对应，在南方的最早的基督教大学要数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开办的圣约翰书院。该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Samuel I.J.Schereschewsky）于1879年开办的。早在1877年离开美国来华前，施若瑟就呼吁在中国建立一所传教大学。他写道，对我来说我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宣传基督教的努力似乎是最不明智的。到达上海后，施若瑟就开始在曹家渡附近沿苏州河以南的一块三角洲上筹建一个新的校舍。1879年，他正式把美国圣公会在1865年设立的培雅书院和1866年设立的度恩书院合并，组成圣约翰书院，并于同年9月正式开学。这时的圣约翰书院还只是一所中学。虽然在80年代初，该校就开设了一些高中课程，但大学课程的设立则是在1890年，当时仅有大学生2名。1895年大学生人数增至6名，1899年人数更增至27名。施若瑟担任圣约翰书院的首任院长，直到1888年退休。在施若瑟退休时，圣约翰书院已扩展到5个部，即初级部、“学院”部、神学部、医学部和英文部。施若瑟之后，由另一位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任院长。卜舫济于1886年底到达上海后，一直在

圣约翰书院教英语，1888年升任院长。

卜舫济担任圣约翰书院院长后，立即着手致力于把该书院逐步经营成为一所在华的教会大学。从1890年起，卜舫济在书院中增设了大学课程。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中正式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3个科，文理科学制为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为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为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到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在学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要缴学费120元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故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英文课的设立。这是与登州文会馆不教英文的作法截然不同的。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8元。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日英文、半日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为了加强书院的英语教学，美国圣公会还派遣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卜舫济到校后，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加强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他并于1887年向圣公会差会部提出报告，要求把英语教学列为圣约翰书院的重点。他提出："一、教授英语可以训练中国人的智力，如同给外国青年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所能成就的是同样的性质。二、这样做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偏见。三、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和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可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了

解。四、我们可以证明，对培养人才为社会作出有益的服务方面，可以指望基督教教会提供这样的服务。”[①]1888年卜舫济担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后，逐步开始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并用英文教学，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故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英语一直是该校的教学强项。

三 北京汇文书院

1870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日校，当时只有3个男孩入学，作为他们上学的代价，学校每天要付给他们一碗米。到了1876年这所小学升格为中学，并逐渐发展成一所大学水平的教会学校。1888年随着4年大学课程的设立，这座学校终于演变为汇文书院。汇文书院开办的目的是要把当时的学校发展成为拥有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以及预科和工业学院的大学。1890年该校董事会在美国纽约州注册成立。1892年一个包括美国和荷兰牧师、中国海关总监赫德（Robert Hart）、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及卫理公会差传部代表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董事会首次向学校毕业的5位学生颁发了学士证书。然而事实上，纽约立法机构并没有授予董事会颁发学位的权威。但不管怎样，作为一所高等学府，汇文书院已开始在北京产生了影响。

汇文书院的首任校长是皮尔奇（Leander W.Pilcher），1893年11月皮尔奇去世，管理委员会选出柏锡福（James W. Bashford）为校长，高厚德（Hiram H.Lowry）为副校长。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P. 5.

但当时柏锡福是美国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校长，无法到中国就职，故校长一职实际上一直由高厚德担任。高厚德担任汇文书院的校长长达25年之久，他退休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接替了他的职位。

汇文书院在授课方面向学生提供两种选择，一种是学生用中文学习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课程，当然也包括中国古典经书；另一种是学生用英语作为学习的媒介，但中国经书不包括在内。使用英语教学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知识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需要；二是学生在用中文学完已被翻译成汉语的自然科学、历史等书后，很难再进一步提高，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快，有时当一本科学书被译成中文后，里面的知识已经过时，跟上时代步伐的最好方法就是直接用英语学习。

汇文书院的校舍就是一座二层楼房，学生宿舍、行政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博物馆全都在同一楼内。1892年时，书院共有89位学生，其中文学院16名、预科27名、工业科6名、医学科2名、神学科30名，另有8名特别学生。到1894年时，学生人数已达到141名。

汇文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烈，学生在校4年被要求参加日常的礼拜、早上和晚上的祷告以及每周一次的查经班，所有的学生还必须参加一年一次的福音布道会。

1892年时汇文书院有教员7人，其中4位美国人，3位中国人。其教学领域包括历史、政治学、化学、物理、心理学、道德学、英语、数学、中国经书、中国历史等。1894年又有7位教员加盟汇文书院，大多为美国人，只有一位来自登州文会馆。总体看来，汇文书院的师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雄厚的。

四　潞河书院

在北京地区第二所达到大学水平的学校当数通州潞河书院。该校是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江戴德（Lymam D. Chapin）于1867年单独开办的，当时的校名为潞河男塾，并没有得到公理会差会部的批准和支持。1886年这座小学发展成为一所高中，校名改为潞河中学，学生由华北其他美国公理会教会学校选送。1889年该校在高中的基础上加设了一个4年制的学院，学生经过5年的小学和4年的中学学习后可以进入大学。这座学校就是后来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3年该校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

潞河书院的开办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努力的结果。谢卫楼一直有志于用汉语作为近代教育的指导媒介，他用汉语写的世界历史在全中国普遍使用，他还发明了一个有5000个汉字的打字机。由于他的汉学功底，他被推举为圣经古文修订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中国官员和学者中也很受尊敬。1889年他向公理会华北差会部提出建立一所宣教大学，为中国的教会建设培养领袖。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

开办潞河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的捐款、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所编汉语音韵字典的销售等。在这些经费的支持下，一个面积达10公顷的校园在通州城外建立。

潞河书院开办的目的并不是为政府控制下的工商业或政府部门提供人才，而是为教会培养领袖，学院的存在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为了基督和教会。因此学校最基本的要求是，所有的学生必须使他们的生活与基督教的原则协调一致。喝酒和抽烟在学校中是绝对禁止的。学生在上街前一定要得到教师的

批准。

同汇文书院截然不同，潞河书院坚持只用汉语教学，这也与他们的校长谢卫楼的兴趣和观点有关。潞河书院拒绝英语教学的原因主要是：一、教授英语会为年轻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及有诱惑力的前景，把他们从在教会的事奉中吸引走；二、汉语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自尊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实践上，学校的条例很难抵抗住时代的潮流，学生们或者自学英语，或从一些热心的传教士那里学。到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时，英语正式列入课程表。

潞河书院的首任校长是谢卫楼。在19世纪90年代，该书院的教师有10人，其中8人为美国人，2人为中国人。在该校任教的富善（Goodrich）博士是一位赞美诗作者，他创作了一本新教赞美诗集，在中国教会中广为流传达半个世纪；他精通中文，还编写过一本在中国使用很广的汉英词典；在狄考文去世后，他成为圣经官话文本修订委员会的主席，稍后他成为设在北京的华北协和神学院的院长。

1892年时，潞河书院的学生人数为62人，其中10人为大学生。到1900年时，该校的大学生人数达到25人。

五　育英书院

在南方的另一所在19世纪末达到大学水平的基督教学校是育英书院。该学院的前身是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崇信义塾。1867年秋该校迁至杭州成为杭州育英义塾。1893年美国长老会华中差传部表示应该优先考虑把杭州育英义塾进一步建成更高水平的学校。根据这项建议，杭州育英义塾在高中的水平上增加了两个大学班级，从而使该校发展成为一

所初级大学。杭州育英义塾大学部的产生实际上也是回应中国人对近代教育日益增加的要求。西方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和语言的需要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更加认识到了西学的重要。

到1896年时，杭州育英义塾的入学人数达到65名，学校的宿舍越来越不敷使用，然而，有更多的人申请入学。大多数申请者来自基督教家庭。如果学校能提供宿舍，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付学费。

1897年，美国长老会华中差传部正式把杭州育英义塾定名为育英书院，虽然该校的大学部学制仅有两年。育英书院的学费预科为12元，大学部为24元，基督徒子弟可以享受学费免费。同时学校还为那些穷学生提供校内工作机会。育英书院的早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牧师的努力。裘德生牧师是来华的第一批受过职业教育训练的传教士，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教育工作中去。他的专长是数学和物理。他从美国订购并且自己动手制造了许多数学和物理方面的教学仪器设备。他在科学方面的发展为以后该校工程学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他在育英书院工作了近40年，成为该校的指导精神。

19世纪末，还有许多教会学校也宣称他们的水平已达到大学程度，但大多数还是处于中学的水平。虽然有些学校也增设了一些大学课程，但并不具备4年制大学授予学士学位或相应学位的能力。甚至一些早期大学开设的神学和医学课，实际上也只是中学水平而已。还有些学校虽然校名改为大学，但或者是开设不出大学课程，或者是招不到学生。真正具有大学规模和水平的大学只有我们以上所介绍的这5所。

虽然这5所大学在19世纪末所拥有的学生只有100多名，但

它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当时的汇文书院曾宣称它的教育水平已达到了欧美国家大学的水平，我们反观当时英美国家的大学教育，不能说这是没有根据或自夸的。由于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的古老教育开始有了转机，并逐渐与世界教育接轨。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高等教育的开拓和模式上也为中国教育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 - 1950*.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Irwin T.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 Three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Clarence Burton Day, *Hang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Charles Hodge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四章　中国基督教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也在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一切又为传教士在华开办新的学校创造了良机。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大学希望能有进一步的扩展，一大批中学又渴望发展成为大学。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我们要通过差会力求母会帮助发展现有的中、高等学校，并在尚无此类学校的地区开设新学校。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派遣男女人员从事这项工作的数量方面，我们请求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更多的支持。”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其中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显著。中国的绝大部分教会大学都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建立的。老的基督教大学经过迁移、合并、发展形成新的大学，而新的教会大学更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早期的登州文会馆经过两次迁移、一次合并，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潞河书院与汇文书院及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合并发展为新的燕京大学；育英书院也变为之江学堂；圣约翰书院在规模和质量上成长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

时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昌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下面我们就对几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学作一介绍。

一 早期教会大学的发展演变

1. 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义和团运动期间，基督教会和教会开办的学校都受到冲击，登州文会馆的校舍也被义和团捣毁。义和团运动过后，1902年6月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在山东青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先设文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各教派保留他们各自学校的所有权，但共同分担此后学校的开支。1904年登州文会馆从登州迁到潍县，与原在青州英国浸礼会办的广德书院（一所高中）合并，形成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文学院，中文名称取两所学校名称的头一个字合并，定名为广文学堂。当时来自登州的学生有85名，来自青州的学生有30名。另一部分文会馆的学生则去青州与部分广德书院的学生联合，组成了该联合大学的神学院。此时的医学院尚在筹备的萌芽中。1904年时广文学堂的教师共有14名，其中美国人2名，英国人2名，中国人10名。

1910年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医学院正式在济南开办。开办医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英国。参加医学院教学工作的有来自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和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医学院很快就成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最强部门。

早在医学院开办以前，许多参与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工作

的传教士就认识到建立一个共同校园、将分散的3个学院合并到一起的优越性。由于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也是该省的文化中心，故新的校址就选在济南城郊靠近医学院的地方。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亨利·鲁斯（Henry W.Luce）受命于1912年回美国筹集建设新校园的资金。经过3年的努力，他共筹到了305000美元的建校经费。

1917年新校址的少数校舍已经建成，广文学堂从潍县迁到了济南，与此同时，神学院和师范学院也从青州迁了过来，师范学院遂成为新的文理学院的一部分。由于新校舍的大部分工程还没有完成，学校只能维持很少一部分学生入学，故当时整个学生人数不足200名。

在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历史上一直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该校对中国语言的特别强调。早期的文会馆和广文学堂一直把此看作该校的独特之处。组成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各学院也一直是用汉语作教学语言。然而随着中国人对外语的兴趣逐步增强，该校的这一政策开始遇到质疑。1906年时学生们曾举行过要求教英语的罢课活动。狄考文以后的第3任校长伯根（Paul D.Bergen）曾提出在学校中开设英文课，但立即遭到拒绝，后来这一提议虽然勉强通过，但英语仍被列为不被重视的选修课，没有成为教学的工具。这种状况直到第一个中国人校长上任后才被改变。在医学院，教学则实行双语制。从整体上看，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还是保持了用汉语作为教学媒介的特色。

在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差会参加进来。1909年，美国圣公会开始参与该校的办学活动。1916年加拿大长老会差会开始对医学院感兴趣。次年美南长老会、伦敦传道会和英国循道公会又参加该校的办学工作。

英国长老会对医学院的教育也予以支持。1920年美国公理会、1925年美国美以美会又加入到这一办学的行列。5个美国差会、5个英国差会和1个加拿大差会共同合办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使该校成为在华基督教大学中最具国际性的大学。1931年该校正式命名为山东齐鲁大学。

2．**燕京大学**

1916年北京汇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协和书院）和北京协和神学院合并，共同组成了燕京大学。从表面上看，燕京大学迟至1916年才建校，但组成燕京大学的这些学校却早就存在了。其中的汇文书院和华北协和大学还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所以燕京的历史也要往前追溯。

义和团运动期间，潞河书院和汇文书院的校舍都被夷为平地。1900年秋天，汇文书院副校长高厚德博士回到北京，招集以前的学生共28人，在租借的房屋中重新开始了该校的教学工作。第二学期末，入学人数包括预科，达到了164人。随着购买新的土地，建立新的校舍，西方教员的返回以及中国教师的增加，汇文书院又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1913年汇文书院庆祝建校25周年，同时开始向毕业生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潞河书院的被毁程度更加严重，就连校舍的砖块和基石都被拿走了。学校只得在北京租房临时开学。与此同时，学校也在通州重新建造新校园。1902年秋该校迁回通州。1903年英国伦敦会加入美国公理会的高等教育工作，这年北京伦敦会教会学校的校长比根（Thomas Biggin）转到潞河书院负责生物学的教学工作。以此为标志潞河书院演变为一所联合大学，其中文校名也改为协和书院，英文名为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也有人将此译为通州华北协和大学）。

由于单个差会很难开办并维持一座高水平的大学，故联合

办学就成为一种较可行的道路。早在1901年协和书院的校长谢卫楼就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美国卫理公会差会部、英国伦敦会和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提出了高等教育应该联合兴办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当时并没有产生效果，到了1905年这4个差会合办了医学院，而一个联合大学的产生则经历了15年的艰难协商。

谢卫楼有关联合办学的建议提出后不久，英国伦敦会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提出合办文学院和神学院的主张，同时这两个差会也邀请美国长老会差会部加入他们的运动。1904年这3个差会共同组成了华北教育联盟，联盟设有一个管理委员会（或托事部），但各个学校则由不同的差会负责。具体分工为：美国公理会负责设在通州的协和书院；设在北京的华北协和神学院由美国长老会负责；设在北京的华北协和医学院由伦敦会负责；美国公理会还负责设在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05年美国卫理公会开办的医学部也加入到华北协和医学院中，医学院成为这4个差会合办的第一个部门。

1910年秋爱丁堡宣教会议任命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高御（Jolm F.Goucher）来到北京，他提出要在中国发展高质量的基督教大学，并号召北京的宣教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办学。在他的倡议下，一个39人的委员会成立了，专门负责有关联合办理高等教育事宜。1911年39人委员会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联合办学的问题。1912年2月该委员会向华北教育联盟、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汇文书院提呈了一份5点声明：新的大学应该：（1）设在北京；（2）包括文学、科学、医学、神学和其他适当的科系；（3）成为一个权力集中的大学；（4）设有一个管理所有资产的董事会；（5）当地设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向董事会负责。汇文书院在回应中提出可以提供它的校园和开办文件给联合大学

使用。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同意了汇文书院的建议，但英国伦敦会却以新的学校不应该设在一个差会的校园中为由加以拒绝。

为了促成新的联合大学，1914年4月汇文书院提出该校与美国卫理公会差会部分开，在此基础上联合办学。美国公理会和长老会很快就同意了这项提议。1915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伦敦会在人力、财力上非常紧张，无法满足在北京的独立办学需要，故也同意加入新的北京联合大学。1915年12月2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批准了汇文书院许可证的修正案，同意不同的差会联合经营该校。1915年12月31日老的董事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从1916年开始，一所新的北京基督教联合大学诞生了，这就是燕京大学，当时的校名为北京汇文大学。

新的北京汇文大学实际上是由北京汇文书院的文学院和神学院、通州华北协和书院的文学院以及华北协和神学院共同组成的。当时由于尚无统一的校址，各学院还留在它们以前的校址上课。其中汇文书院的神学院与华北协和神学院先于1915年合并，移到汇文书院的校舍中上课。新的汇文大学的代理校长暂由汇文书院副校长高厚德担任。1916年至1917年，汇文大学有教师29人，学生178人，其中163人在文学院，15人在神学院。

1918年秋分散在各处的学院开始集中在建在北京盔甲厂（原汇文书院以东）的新校址上课。所有的学生都是男生。那时女子学院还没有成为汇文大学的一部分。

由于高厚德年事已高，汇文大学急需新的校长。1918年12月汇文大学董事会执委会在纽约开会，选举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当时在南京协和神学院教书的司徒雷登任校长。1919年2

月，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于1919年秋上任。

几乎与此同时，华北协和女子学院也于1920年初正式加入汇文大学，成为该大学的一个学院。当时女校部设在灯市口。

由于参加办学的其他差会不同意继续延用汇文的校名，故该校管理委员会于1919年4月决定该校名为北京协和汇文大学。同时该校还邀请蔡元培等中国学者组成一委员会帮助推荐新校名，该委员会一致推荐用北京的另一名称“燕京”作为校名。这一提议得到各方面的赞成，故从1919年起汇文大学正式改名为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到任后，即着手选择新校址，筹建新校舍。经过他多年奔走，一共在北京西郊海甸一带买了700多亩土地，陆续地建造了88座建筑物，形成一座独具中国古典风格的美丽校园。到1926年整个燕京大学都搬到了海甸的新址。

为了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最高水平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在招聘师资、设置课程、筹措经费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1919年时，燕京大学共有29名教师，其中中国籍人士只有4人，其余的都是外国传教士。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司徒雷登一方面尽可能吸引高质量的中国学者来燕大任职，另一方面也注意提高西方教授的学术水平。在吸收中国学者方面，一大批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被招聘到燕大，其中不少人已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这些归国留学生的加盟，使燕大的中国教授人数大为增加。到1926年燕大迁到海甸新校园时，已有2位中国教授任院长，9位中国教授任系主任。此外燕大还设法在国内聘请其他大学的学者到燕大执教和兼课。1922年司徒雷登聘到前清的一位翰林吴雷川到校任国文教授，1926年又任命他为副校长。

在课程设置上，燕大在1927年以前重点是放在一些实用的

职业课目上，主要是为学生提供谋生的机会。这些新的科目包括畜牧科、制革科、劳动调查统计科、新闻科、社会工作科、工商科等，这些实用性的课目大多没能在燕大继续办下去，其中畜牧科于1928年移交给南京金陵大学，制革科于1926年并到化学系中，劳动调查统计科因纽约“托事部”不同意设置而停办，工商科也因不符合燕大的办学宗旨而停办。开设于1924年的新闻科是亚洲第一个新闻专业，不仅生存下去，而且为燕大争得了卓越的声誉。1927年以后，燕大的课程设置重点放在文科上，我们将在以后论述。

经营燕大的经费主要是学费和来自美国的捐款。燕大的学费在当时的大学中算是非常昂贵的。据统计，1927年时，燕大的学费就为50元了，而到1930年北京大学的学费才为40元，清华大学的学费只有20元。当然学费只占学校经费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经费还是来自美国，包括纽约信托部、洛克菲勒财团、哈佛燕京学社及铝业大王霍尔遗产的捐款。

3. **圣约翰大学**

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工商都市的上海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⅓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整个入学人数为187人，学生大部分来自富有的商人家庭。学生中基督徒为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圣约翰书院也从是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了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产生了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国合法地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收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

圣约翰大学设有文、理、工、医和神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¼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时整个大学的入学人数达到250多人。

圣约翰大学的常年经费为70万美元，其中10万美元来自学生缴的学费，其余60万美元则由美国圣公会负责筹措。学生每年的学杂费在200元左右，这是一般平民家庭无法支付的，故考进圣约翰大学的大多是富家子弟。但该校也为穷人子弟和优等生设置了奖学金和免费制度，对成绩优异的平民考生录取后给予一定的补助和免费。每年这样的名额约有30名。卜舫济在管理学校方面非常强调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以身作则。每逢周末，他总是在家举行晚会，请学生轮班到家里做客。他也要求其他教师多与学生接触，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给予他们个人的同情和忠告。

圣约翰大学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在当时中国教育界起着风气开先的作用。卜舫济在圣约翰组织的第一个学生体育组织是射箭俱乐部。20世纪初学校又规定学生每天早晨要做15分钟的哑铃操，每周一、三、五还要做军事操。接着学生足球队也被组织起来，经常与校外球队比赛，在上海一带小有名气。到1902年时，学生们又开展了田径、网球、自行车、游泳、摔跤、攀登等运动。这些体育运动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不多

见的，由此也招来一些保守的旧式文人的批评。为了加强学校的体育运动，卜舫济特别济资选派该校大学毕业生沈嗣良去美国专攻体育。1920年沈嗣良回到上海后，被任命为圣约翰大学的体育科主任。由此也可看出圣约翰大学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当时圣约翰也有了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每月举行一次活动。学生们还成立了文学与辩论会，用英语开展定期的活动。由于学生们对西方音乐，特别是对唱诗有兴趣，诗班也被组织了起来。此外，学生们还组织了中文和英文的戏剧社，主要在圣诞节和其他重要节日演出，有时也为帮助中国各地的灾荒举行赈灾义演。

早在1890年圣约翰就创办了英文校刊《约翰声》，每两个月出版一期，主要报道学校的新闻、有关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文章等。该刊一直延续了40年之久，对于锻炼学生读、写能力有不少帮助。19世纪初高年级的学生又创办了《龙旗》年刊，1915年改名为《约翰人》。该刊主要报道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帮助读者了解当时中国的大学生活。《约翰人》延续了25年之久，相当于一本高校年鉴。

1927年1月初受当时时局的影响，圣约翰大学除医、神两院外，全部停办。但部分学生和教员在法租界租房继续上课，并为这个临时学校取名为“丁卯学社”。直到1928年，圣约翰大学才又在原址复校。

4. 杭州之江学堂

20世纪初，杭州育英书院仍旧只提供两年的大学课程，在20年代末以前，该学院也仍然只是处于初级大学的水平。1905年学校的入学人数达到115人，其中35人在大学部。1906年育英书院开始在钱塘江畔建造新的校园。1908年美国北、南长老会建立了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决定合办育英书院。1909年11

月美南长老会的代表开始参与该校的教学工作，育英书院成为一家合办的大学。1911年新校园竣工，学院搬入新学院，校名也改为杭州之江学堂，之江是钱塘江的另一名称。这年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17人。其中31人在大学部，86人在中学部。学生中85人为基督徒。教师人数，包括西方和中国教员共有12名。

在课程设置方面，之江学堂从1912年起每周增加3个小时的用英语讲授的课。这些用英语讲授的课包括历史、地理、逻辑和政治经济学。学校里用中文教的课则有天文学、圣经、生物学、化学、中国经书、汉语、地质学、物理、生理学、心理学和三角学。之江学堂首次设置了5年制的课程（2年初级，3年高级），并增设了一些新课程如绘画、教育学、社会学、哲学、高级物理等。

1920年11月之江学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获得颁发证书和学位的许可证。1922年6月之江学堂首次向毕业生颁发学士学位，两位毕业生获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之江学堂的入学人数达到258人，其中一半以上在大学部学习。到1926年，该校共产生毕业生218名，其中48人在教会工作，另外的人大多从事教学工作。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之江学堂也很重视学生的宗教活动。校长经常带着学生到附近的村庄去传教，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也经常请杭州各教会，甚至外地的牧师主持主日晚上的聚会。1912年秋之江学堂还在学校建立了教会。除了参加宗教活动，之江学堂的学生在课余生活方面也很活跃。他们组织了文学社，经常举行中文和英文的演说和辩论比赛。各种体育队也在学生中组织起来，如足球、篮球、网球、田径等。1918年5月该校还成功地举办了华东高校田径运动会。

二　20世纪初新兴教会大学的建立

1. 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

20世纪初，美国浸会系统在中国的力量比较薄弱，在华中和华东浸会建立的教会只有20家，会众不到1000人，由10位中国牧师管理。没有一位中国浸会的牧师或平信徒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浸会也没有一所完全的中学。当时，在中国新教的其他差会已经相继建立了10所大学或初级大学，浸会感到有必要创办自己的高等教育，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然而，当时浸会的传教士都没有受过职业教育方面的专门训练，他们也缺乏资金，创办一所大学谈何容易。

在华的两家美国浸会的差会，美南浸会和美国浸礼会同意合作共同创办大学。1905年两家差会在美国的总部批准了共同开办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的计划，并答应提供4万美元购地筑房。新校园的工程随即在黄浦江岸铺开。同时，神学院在城内租的房屋内开学。

1909年，浸会大学正式开学，首批学生中49人在中学部就读，7人在大学部学习。当时的教员共有2名美国人和5名中国人。1912年浸会大学与神学院合作。浸会大学是在华基督教大学中首家正式招收女生的学校。1917年浸会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获得授予学士学位的许可证。1919年该校首次向37名毕业生颁发了学士学位。在这以前，毕业生只能获得一张证书。是年，该校的入学人数超过了100名。

浸会大学的招生政策是非基督徒学生的人数不能超过基督徒学生人数与出身基督教家庭的学生人数或曾在教会学校学习3年以上的学生人数的总和。到1928年，该校在学人数已超过

900名。

2. **东吴大学**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办了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实际上是在苏州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认识到学习西方是中国富强的惟一道路，年轻人中学习西学的热情被激发起来。1896年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安德森（D. L. Anderson）为回应一群年轻的中国学者学习英语的要求，在苏州开办了苏州中西书院，第一批学生有25人。除了教英语外，书院还教授汉语、数学、地理、基督教等课。到1898年11月，中西书院的学生已超过100人。1899年11月，卫理公会开会讨论在华传教的教育工作计划，决定在苏州开办一所大学。1900年5月这所即将开办的大学在美国田纳西州注册，获得颁发学位证明的许可证。11月该校董事会在上海组成，安德森被选举为新大学的首任校长。新大学取名为东吴大学。

1901年3月苏州中西书院作为新的东吴大学重新开学。真正的大学教育直到1905才正式开始，当时有12名学生入学。1907年东吴大学首次授予毕业生学士学位。

1911年3月安德森去世，校董会选举同属卫理公会系统的上海中西书院的校长克莱（J. W. Cline）为东吴大学的新校长。这一任命也就使上海中西书院与东吴大学合并到了一起。中西书院的学生则与东吴大学相对应的班级合并组成了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当时大学生人数为50名左右。

上海中西书院是由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82年开办的。1899年设在苏州的博习书院并入到上海中西书院。博习书院也是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始建于1871年。所以东吴大学实际上是由这几家美国卫理公会开办的学校所组

成的。

同当时的其他基督教大学相似，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重点也是放在英语和科学方面。东吴大学在生物、化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力量十分雄厚，在全国的高等教育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也为东吴大学争得了荣誉。东吴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从1915年左右就开始了。1917年该校第一次颁发硕士学位，这或许是在中国授予的第一个化学方面的硕士学位。

东吴大学另一个在全国领先的科系则是法律学。1915年9月东吴大学招收不到10名学生开办了法学院，而当时教法学的教师则有10多人。1918年7人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法学院对人学的要求很严格，一般学生在进人法学院以前都要先完成至少3年的文学士学位课程。法学生每周要上15小时的法学课，还要参加实习法庭。法学院的课程除很少一部分的中国法用汉语教授外，其余的课程全用英语教，这种英语的强化训练使毕业生较容易考入英、美大学进一步深造。1920年法学院的9位毕业生中有4名赴美国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2年法学院出版《中国法评论》季刊，该刊对研究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法律变迁很有帮助。

3．南京金陵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是由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基督会（Disciples）于1910年创办的。早在1888年，卫理公会就任命福开森（John C. Feguson）为南京汇文书院的校长，然而当时该书院既无校舍、课程，也无教师和学生，只是一种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意识。第二年福开森在他的家中开办了一个很小的学校，1890年又开办了一个医学部，接着宗教部也被开办。到1907年该学校已发展到拥有3座校舍，200多名学生的规模，一些高级课程也被教授，然而其水平还远远未达到大学的程度。

1910年南京汇文书院同美国北长老会与基督会合办的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合并，形成了南京金陵大学。宏育书院是由基督会开办的基督书院与北长老会开办的益智书院于1906年合并而成。这两个书院都是开办于19世纪80年代，属于中学水平。汇文书院的校长包文（Arthur J. Bowen）被选举为金陵大学的校长。1911年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故也有人把这一年作为金陵大学开办的时间。

南京金陵大学开办初期，校址设在原汇文书院的地产上。3家差会决定在资金、地产或校舍上共同支持新的大学。随着基金的增多，新校园，包括一所学生宿舍和一座科学楼在靠近鼓楼基督会的地产上兴建起来。这两座建筑是近代中国高校中最早采用中国建筑风格的典范。1916年金陵大学迁到靠近鼓楼的新校址。当时，该校的学生只有50多名。在1920年以前，该校的学生一直在100人以下。

除了文学和科学外，金陵大学在其他学科上发展很快。1912年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办了一个现代语言学院及一个宣教中心。第二年，由7家美国差会支持的华北协和医学院又成为该大学的一部分。然而，医学院又于1917年合并到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中。1918年金陵大学又开办了一所护士学校。金陵大学较有优势的学科是农林系。

1911年的大饥荒导致数以万计的农民流落到南京。为了帮助他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的数学教师裴义理（Joseph Bailie）组织起几百名农民在城外开荒种地。他的这种作法得到了社会上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出于裴义理的热情，1914年金陵大学开办了农科，第二年又增添了一个林科。这以后不久，政府的工农部关闭了他们所开办的学校，而把他们的学生送到

金陵大学培训。

4．福建协和大学

同中国的其他教会大学不同，福建协和大学不是从中学发展而来，也不是由几家教会学院合并而成，而是1910年爱丁堡宣教会议的直接产物。该会议成立的高等教育委员会计划在中国的东、西、南、北方建立4个高等教育中心，其中南方的中心设在福州。

1911年，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高彻来到福州，召集传教士商讨建立大学事宜。会议决定在福州开办一所各宗派均可参与，包括学士以及更高课程的联合大学。6个基督教差会参加这所大学的讨论工作，它们是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但后来英国公理会和长老会因经费紧张而退出了福建协和大学的创建工作。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是要为基督教培养领袖，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

1915年福建协和大学预备委员会推荐庄才伟（Edwin Chester Jones）为大学校长，稍后，这座大学的中文名称被正式定为福建协和大学。

1916年2月福建协和大学在租借的校舍中正式开学，当时共有学生86人，其中72人为基督徒。他们全部来自教会学校。1918年2月，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在纽约成立，6月该校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获得颁发学位的许可证。由于学校在美国注册，它所授予的学位实际上是美国的大学学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原因。1919年4月董事会正式选举琼斯为福建协和大学的首任校长，其实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多年。

福建协和大学开办后，即着手在闽江北岸、鼓山脚下购地

建造新校园。1922年春天，随着大部分建筑的完工，福建协和大学搬到了新的校园。当时学生人数增加到120人左右。1924年首任校长琼斯因病去世，学校管理委员会选举高迪（John Gowdy）为第二任校长。高迪任职于1924年至1927年，在这期间，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去为学校筹集资金。

5. 广州岭南大学

中国的教会大学中没有一所像岭南大学这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早在1879年美国长老会在广东的传教士哈巴（Andrew P.Happer）就萌发了在中国建立一座基督教学院的想法，然而他认为这座学院应该建在华中或华北，而不是广东。1884年在广东的美国长老会向美国总部外宣会提出开办学校的建议，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回应。1885年哈巴亲自回美国游说长老会外宣会，最终使该会于同年12月同意在中国开办一所基督教学院。1886年4月哈巴在纽约为这所中国基督教学院组织了一个董事会。1887年董事会选举哈巴为这所计划中学院的校长，并授权他回中国租房开学。当时哈巴并没打算把学校设在广东。但这一消息传到广东后，400多名广东的官员、绅士、商人、学生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把这所基督教科技学校设在广东。这使哈巴大为感动，也使他决定把学校设在广州。1888年哈巴回到了广州，他在珠江南岸的花地租房开办了这座学校。当时有80人参加人学考试，只有30人被录取。3月28日学校正式开学。当时学校的课程主要为英语和中国经典。学生一周上6天课，一天学习6小时，每天的学习以晨祷开始，星期天还有4个小时的圣经学习。到1889年学校共有教员5人，除了哈巴夫妇，还有3位中国教员。1890年8月，由于哈巴疾病缠身，这所学校只好暂时关闭。

1893年3月，董事会选举另一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

（Benjamin C.Henry）为广东基督教学院的校长，同年董事会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获得了在该大学授权下颁发学位的权力。当时这座学校的英文名为中国基督教学院。1894年该学院在广州花地重新开学。学院分为初级部（小学）、中级部（中学）和高级部（大学），共招生105人，其中22人在高级部。高级部的课程主要为神学和大学课程。1899年该校中文名字被定为科学书院。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及由此掀起的排外风潮，科学书院转到澳门继续上课。从1902年起，科学书院开始在广州珠江南岸购地准备建造新的校园。1903年该校董事会向纽约州立大学提出将该校英文名称改为广州基督教学校，中文名称则定为岭南学堂。1904年春新校园的建设工程开工，10月，岭南学堂从澳门迁回广州新校园上课，这年入学人数为61名。1912年岭南学堂改名为岭南学校。

虽然岭南学校从一开始就朝着大学的方向发展，但中、小学部始终比大学部兴旺。1916年时中学生为381人，小学生为154人，而大学生只有23人。学校的一切都围绕着中小学生运转，大学生们感到他们学习、生活在中学生的阴影下，难以有所作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学部于1916年与中、小学部分开，大学生有他们自己的院长、教室、宿舍、食堂等。故有人将这一年视为岭南大学创建之年。实际上，可能直到1927年，岭南大学这个名字才被使用。

岭南学校大学部独立后，入学人数有所增长，1917年注册人数达到48人。到1920年大学部的入学人数超过100人。这一时期，大学部提供的课程分为4个部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农业。主要课程包括英语、历史、经济、宗教、科学、心理学、数学、哲学、社会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农业等。1918年岭南学校产生了第一批自己的

毕业生，这一年3名学生经纽约州立大学批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

岭南学校的大学部成为日后岭南大学的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最早增添的学院为农学院。农学院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鲁甫（George Weidman Groff）博士的功劳。高鲁甫是一位园艺家，毕业于宾州州立学院，1907年到岭南学院任教。在他母校的支持下，高鲁甫在岭南学院先后建立了一个模范奶场、一个柑橘引种站、一个植物标本室，并开始了蚕丝业。1921至1922年，农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提供4年的课程，学生完成学业可以获得理学士学位。

岭南学校的学生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学生团体很多，主要的有4家：学生会、伙食协会、体育协会和学生基督徒协会。

6．华中大学

同大多数中国的教会大学相似，华中大学也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发展而成。华中地区在这里的含义主要是指湖北、湖南、江西3省。到1921年时，这3省的教会中学共有33座，达到大学水平的学校有两家：武昌的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和长沙的雅礼大学。早在1907年英国伦敦会就提出在华中建立一座无宗派的基督教大学，后来这个计划又被扩展为建立一所联合大学，美国教会也可参加进来，然而这项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当时在华中地区拥有较强教员工作的西方基督教差会共有5家，他们是：英国卫理公会、英国伦敦会、美国归正教会中国宣教部、耶鲁大学中国传教会、美国圣公会。英国卫理公会于19世纪后半期在武昌开办了卫斯理学院，虽名为学院，实际的教育程度只是中学，接受中学以上教育的学生非常少。1899年伦敦会在汉口开设了Griffith John学院，也是

一所中学，到1914年只有5名学生学习中学以上的课程。美国归正教于20世纪初在湖南洞庭湖畔开办了湖滨书院。直到1921年才开始提供大学课程。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华大学，始于1871年，当时是一所男童寄宿学校。1903年开始设置大学课程，当时中学部的学生有300多人，大学部的学生为50人，1906年第一批大学生毕业。1907年文华大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获得授予学位的证书。文华大学在华中大学的开办中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耶鲁大学国外宣教会开始派志愿学生到湖南长沙宣教。1906年11月耶鲁宣教学生建立了一个中学，名为雅礼中学；1909年雅礼中学开始开设大学课程，前后有70多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到雅礼来短期教学。1916年雅礼中学增设大学部，第二年又增设了一个医学部。1919年雅礼大学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注册。1920年时雅礼大学的学生只有40名，但它的学术水平在华中则是最强的。

1922年2月美国圣公会差会、归正教差会、伦敦会、英国卫理公会、耶鲁国外宣教会等代表在汉口开会，形成决定要在武昌开办一所华中大学，该大学将把雅礼大学的强项科学与文华大学的强项神学、图书馆学、师范和商业等联合起来，形成华中一带一流的大学。同年秋筹建华中大学的临时委员会成立；1923年11月临时委员会决定华中大学先进行3年的试办期，在此期间，大学不申请颁发学位的许可，也不向政府注册。由于在华中大学的设置地点上有分歧，雅礼大学在华中大学筹建的最后关头，退出了联合计划。

1924年9月8日华中大学在武昌原文华大学校址上成立，当时学生有89人。由于华中大学试办期间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和北伐革命时期，反帝浪潮也是风起云涌，1926年夏华中大学的校园成了难民营。1926年至1927年第一学期末，雅礼大学在长沙

被迫关闭，其理学院移到了武昌，开始了华中大学与雅礼大学的第一次真正合并。1927年春南京事件后，外国传教士也被迫离开武汉到上海集中，华中大学在这以后不久也被迫关闭。这一时期的华中大学也被称为第一华中大学。1929年华中大学才又重新开始。

7．**华西协合大学**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由沿海发展到内地，教会学校同样也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的发展趋势。在华西，特别是四川省，当19世纪传教士进入后不久，教会小学就被建立起来了。20世纪初中学也开始出现。紧接着，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的计划也被提出，并且大多数差会都感觉到这座大学应该是一所联合大学。早在1903年加拿大卫理公会差会就提出建立一所拥有人文、神学和医学系的学院。1904年美国美以美会差会开办了一家“学院”，师资由3位传教士和2位中国人组成。由于意识到单个差会开办高等教育的不便，美国美以美会、美国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会和英国公信会于1905年共同提出创办一所联合大学的提议。1910年4个差会又为新的联合大学制定了章程。与此同时，传教士在成都城南买了60公顷土地，设计了建筑蓝图，并开始动工修建校园。

同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共有11名学生和11名教师。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英语、化学、物理、西方历史、中文和宗教知识。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华西协合大学刚开办一年就被迫关闭，直到1913年春才又重新开学。

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的首任校长。开始时，华西协合大学只设文理学院，1912年又增设了师范学院，1914年医学院开始出现，1915年宗教学系也被建立，1917年牙科系又被增设。从一开始，华西协和大

学就寻求一种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过去英、美、加化的制度，中国研究也被予以特别的重视。到1920年时，华西协和大学已有近100名学生。1922年，该校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获得颁发文凭的临时许可。正式的许可是在1934年获得的。

三　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意义

在华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发展格局，所有的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都已建立。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突破在一方面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我们在第一章中曾讲到，中国的传统教育并没有提供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中国古典的大学如中央官学及书院等，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差距甚远，传统的中央官学及私学书院所教授的主要是儒学经书，从现代的观点看，这只是社会科学的一小部分，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明显地缺乏近现代大学所必须包含的自然科学的内容，并且社会科学的内容也不完全，这种缺欠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制度本身所无法弥补的；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主要是各级政府的官吏，而不能产生大批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以及能够推动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所需要的其他人才，这也与近代高等教育的目标差别太大。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就是教会大学。虽然

教会大学的开办者主要为西方传教士，但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在华的高等教育也是中国教育整体的一部分，因为学校是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学校的学生是中国人，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中国社会。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在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官私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第三，教会大学的出现也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20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的大学是分不分的。

教会大学在享受了在20世纪前20年的全面发展后，开始遇到了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1927年由于中国国内时局的动荡变化，教会大学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被迫关闭，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陷入了低潮。

参考书目: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56.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4.

John L. Coe, *Huachu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62.

第五章　基督教开办的中国女子教育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出现过著名的女诗人、女教师、女历史学家甚至女发明家，但为女子提供的正规学校教育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古代，由于受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等封建观念的影响，女子被认为是不应也不能受教育的；再加上“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遗训的束缚，社会上从没有开办过女子学校，女子与男子同学共读更是不允许的。女子的教育在中国古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上虽也有个别勇敢的学者如明代的李贽，倡导女学，并招收女生，但遭到的诬蔑与攻击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中国女子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与基督教密不可分。近代最早的女子学校以及女子大学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一　传教士开办的女子中小学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就已开始了女子教育的活动。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了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

开办教会女子学校也是传教士迫不得已的做法。本来女子可以到教会开办的一般学校中就读，但由于中国人对女子教育传统的保守看法，几乎没有女子去教会学校读书。父母不愿让

女儿与男孩子混得太近，有些家长甚至不放心让他们的女儿单独走到学校。解决这一难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为女孩子单独开办学校。

教会女子学校同男子学校一样，最早也是在5个通商口岸设立的，以后随着传教的深入而往内地发展。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赛（Aldersey）女士到宁波开办一座女子学塾，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然而由于风气未开，专门对女子开设的女学也很难招到学生。例如1850年传教士在广州设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堂，开学那天，本来报名上学的女生因舆论的压力一个也不敢前来，后来总算动员来了几个，不久又全部退学。

美国归正会曾在厦门地区开办过比较成功的女子教育。1870年归正会在第二厦门教会（The Second Amoy Church）附近的一座房屋内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学生可以走读或寄宿，由女传教士海伦（HelenVan Doren）负责。第一年共有12名女生入学，其中8名走读，4名住校；第二年学生人数增加到23名；1872年时发展到30名，其中寄宿生达到15名，这是因为来就读的女子中许多来自乡下的教会或其他偏远的地区。教会负责资助大多数学生的住宿及其他方面的费用，同时家长也相应地支付部分费用。这座女子学校不仅是厦门城里惟一的女学，而且也是这一地区的惟一女学。学生毕业时，已有相当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足以让他们的亲戚、朋友感到惊奇和羡慕。她们的成绩也证明女子在学习上不比男子差。1879年这座学校迁到鼓浪屿。到1899年秋，学校的入学人数达到76人。学生的年龄在8至2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岁。担任教师的主要为传教士的妻子及单身女传教士。归正会归女国外布道部（The Reformed Church's Women's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对这

些女子教育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除了在厦门外，归正会还在福建的其他地区如漳州、同安等地也开办了女子学校。这些女子学校的课程在1865年至1900年间逐渐走上了正轨。圣经及圣经历史是这些学校的主要课程。其他世俗的课程还包括地理、算术、中文、语言以及少数的美术、音乐和自然科学知识。一般来说，每天上午的课程主要是圣经，下午的课程是语言学习。由于圣经被用作最基本的教材，语言学习实际上就成为传教士传福音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被要求记住圣经中的不同章节，包括耶稣的隐喻和神迹、登山宝训以及许多诗篇。高年级的学生则学习《天路历程》，并参加有关基督教义的讨论课。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汉语教授。虽然当时女子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有的寄宿学校要三四个女孩睡一张床，教室和宿舍非常拥挤，但还是有许多女孩等着入学。传教士还把女子教育与反缠足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女子学校规定，入学的女子不能缠足，这对中国的移风易俗很有帮助。

从19世纪70年代起，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也开始出现，当然女子中学数量是非常少的。1890年美国监理会（卫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女塾。美国监理会妇女国外布道部对这所学校予以经济上的资助，并派海淑德女士来上海主持校政。中西女塾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有钱人家的女子。该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中文、英文、地理、代数、三角、勾股法则、天文、化学、微分、积分、地学、音乐和家政等。从课程设置上看，该校教学水平明显超过小学，达到了中学程度。中西女塾的西学课程和进度，大体上是按照当时美国教育体制安排的。故我们可以说，虽然在总体上中国的女子教育还非常封闭和落后，但就个别女学的教育程度上看，已经与当时的发达国

家相差无几。此外，传教士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一些水平较高的教会女子中学。

传教士不仅开办女子中小学，他们也为成年妇女开办扫盲班、成人女校，开展成人女子教育工作。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归正会传教士的妻子们就在厦门地区为有宗教需要的中国妇女组织了每周的祷告会。不久她们就发现，如果要使基督教在这些中国妇女中，并通过她们在她们的子女中传播，必然解决这些妇女中普遍的文盲问题。当然，女子文盲的问题通过越来越多的女孩进入女子学校最终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对那些没有进入学校的女孩怎么办？对那些成年女子怎么办？很显然，这些成年妇女在女子学校中会感到很不舒服，并且她们也不可能从家务中抽出时间去参加正常的学校教育。

最初传教士的妻子们试图教中国成年妇女阅读汉字，但效果并不明显。从1866年起，她们开始在每周祷告会后教中国妇女拉丁字母以代替汉字，结果收效很好。这项实验在厦门第一教会和第二教会试行几个月后，已有近40位妇女可以流利地阅读拉丁字母的圣经，并可背诵宗教问题手册上的答案。1884年归正会妇女国外布道部资助在鼓浪屿建立了一座成人妇女学校，取名为“夏洛特妇女圣经学校”（Charlotte W.Duryee Bible School for Women），使这项成人妇女教育工作更加系统化、正规化。除周五外，女传教士每天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授课。课程主要为圣经学习和拉丁字母学习。后来学校还为初学者编写了一本4页的基本教材。掌握基本教材上的知识后，学生们开始学习主祷文、十诫和赞美诗，成绩合格者再进一步学习圣经。教材中还包括一本用拉丁字母写的教义问答手册。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一起朗读指定的课文，然后老师向学生提问她们所朗读的内容。学校还向那些有兴趣和有

时间的妇女开设了算术课。学生们学习的期限长短不一，大约¾的学生在离校时已达到了能阅读的水平。许多非教徒的学生参加学校后，到离校时已成为教徒，这种现象十分普遍。1884年这所学校只有5人入学，1889年入学人数达到25人，到1901年时，学校培训过的学生达到700多。学生的年龄老少不一，从15岁的少女到70岁的老妪都有，大多数学生的年龄在25岁至50岁之间。学校还培养了一些中国基督徒妇女教师，雇用她们深入乡村，到老百姓家中教妇女们阅读、识字。到1900年，学校中中国女教师的人数达到11人，她们常被称为“圣经妇女”（Bible Women）。除了在厦门外，归正会在福建的其他地区也建立了类似的女校。

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19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教育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女界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风气。

二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

1.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

虽然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小学校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出现，使中国人对女子教育问题有所认识，但当时保守的中国社会仍然认为女子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直到民国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才开始关注女子的高等教育需要。然而，早在20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就已经出现，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华北女子协和大学的前身是美国方面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

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的夫人于1864年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塾，最早的学生主要是穷人家的女孩和街上的乞丐女孩。1869年裨治文夫人将这座女子小学移交给波特（Mary Porter）女士负责，当时的入学人数已达到16人。以后又有查平（Jennie Chapin）女士和哈维（Ada Haven）女士管理该校。同其他教会女学相似，该校也规定入学的女生不得缠足。1888年至1889年时，贝满女塾的在学人数达到34人。1895年该校升为中学，校名取为“裨治文中学”，当时招收的女中学生有72人。义和团运动期间，该校校舍全部被毁坏，⅓的学生被杀。义和团运动后，裨治文中学暂时在一王宫中复学。1904年该校的学生毕业时已经学习了一年的大学课程，这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始。在此基础上，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把裨治文中学发展为一所4年制的女子大学，作为华北教育联盟的一部分。1905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成立，校址设在灯市口。美国卫理公会妇女外国布道会也于1907年开始支持该大学。1909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产生了第一届毕业生。1912年时该校的女大学生只有14名，到1920年时，在校的女大学生已达73名。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

2．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开办女子大学即使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也会遭到来自男女双方的强烈反对，在古老的中国这种想法会遇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早在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建

立以前，就已经有许多女传教士呼吁开办女子大学。19世纪80年代时，福州毓英寄宿学校的教师星姑娘（Elizabeth Fisher）女士在福州宣教年会的妇女之夜上曾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有男子中学，我们就必须有女子中学；如果有男子的大学教育，我们就必须有女子的大学教育。"1904年5月曾在福建龙田开办过女子寄宿学校的美以美会女传教士程吕底亚（Lydia Trimble），到洛杉矶参加美以美会大会，她也向美以美会妇女外国布道会提出在华南建立一座女子大学。美以美会妇女外国布道会同意在福建建立一所女子大学。1905年5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开会，会议决定把要在华南建立的女子大学设在福州。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建立女子大学的第一步是要发展一所力量雄厚的中学，为大学的生源作准备。所以就像西方的大多数学校一样，这座女子大学实际上是从大学预科发展起来的。预科开始于1908年，特里布尔女士被选为校长。当时这座预科被称为福州女子学院预科。最初福州女子学院预科的学生主要来自福建卫理公会的女子寄宿学校，不久，其他宗派女子学校的学生也被招收进来。在预科期间，学校主要开设师范课程，为各地的女子寄宿学校培养教员，当时学校是在租借的房屋中上课。

1911年底学校开始在闽江南台岛动工修建新校园。1914年秋，学校搬进了新校园。从是年起，学校开始提供两年制的大学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英语、科学、家庭经济学和体育。1916年5名学生完成了两年制的大学课程，4名赴美国、加拿大继续深造，1名进入上海基督教医学院。从1917年开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正式提供4年制的学士学位的课程，有5名学生进入这一大学班。两年后有2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的王世静后

来成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首任中国人校长。1921年第一批的3名大学生毕业，获得了华南女子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到1921年时该校大学生共有42名，预科生202名。

虽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1921年就已经开始向学生颁发了学士学位，但当时它既没有向中国教育部，也没向一家美国大学申请认可。1921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始向美国的大学申请许可，并于1922年9月从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利分校获得了颁发学位的临时许可。

1925年校长特里布尔提出辞呈，新选校长卢爱德（Ida Beile Lewis）于1926年上任。刘易斯女士曾在美以美会在华教育部工作，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并能讲流利的汉语，在中国学者中很有声望。到1926年为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已经产生大学毕业生38名。其中24人在教会学校教书，2人在美国留学，4人在读医学，3人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所有这些毕业生都是基督徒。

3.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11年至1912年8个教会女子学校的代表在上海聚会，向她们的差会呼吁在扬子江畔建立一所联合女子大学。5家差会——美北浸礼会、门徒会、美南卫理公会、美北卫理公会和美北长老会——给予了积极的答复，它们答应各提供1万美元资助校舍、设备和教师的薪水。1913年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选举德本康夫人（Lawrence Thurston）为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瑟斯顿曾在土耳其和长沙的耶鲁学校作过教师，她的丈夫是耶鲁外国传教会在中国的首任代表，也是学生自愿运动的领袖。经过协商，这所学校的校址被选定在南京；金陵，南京的另一名称被选为校名。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1915年9月在两座中国的大宅第中开

学。第一批注册的女大学生共有13名。其中的5名于1919年毕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当时的学位是通过南京金陵大学授予的。到1920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达到70名，教师人数为16名，其中5人为中国人。

20年代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建设时期。该校设在金陵大学以西，占地27公顷，其建筑也是中国风格的，到1923年共投资30万美元修建了6座建筑，可接纳学生400人。到1925年时入学人数达到133人。

1927年3月由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局势动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暂时关闭，直到1927年秋才重新开学，当时的学生只有95人，教员的人数达到24人，其中8名为美国人。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教会大学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教育。上海浸会大学于1920年招收女生，成为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机构中第一个接收女子的大学，同年国立北京大学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当时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新教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6%。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三　女子学校教育的意义

女子学校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女子大学的建立，不管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长久以来是一个父权极强的封建社会，在古代，妇女在三纲五常的束缚下，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地位都是非常低下，女子不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进入学校受教育更是不可能的。虽然也有极少数富家女子能在家中受些教育，但这

些教育大都是教导女子如何顺从男子，很少有真正的学问和知识。妇女越是没有文化，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低，乃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千百年来难以打破。女子教育的落后，受害者不仅是妇女自己，整个社会、国家也受其苦。大批的人才潜力不能挖掘，众多的智慧不能利用，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浪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最先开办了女子学校，打破了千百年来的禁忌，开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基督教在中国举办的女子教育，不仅包括女子中小学，而且还有大学，这显示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还记得西方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女子教育也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到19世纪中期后才开始普及的，所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传教士实际上是把当时在西方也很新鲜的女子教育及时地介绍到了中国。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将西方的女子教育引进到中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中国的女子学校教育与西方的女学有一定的差距也是在情理之中。女学是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教会女子学校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也就标志着中国开始冲破封建封闭，开始走向近代，走向世界。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19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进入20世纪后，女学在中国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发展，无疑，基督教在中国的这场社会变革中起了启蒙和先锋的作用。

女学的发展不光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

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变富强。中国近代的落伍与女子教育的落后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中国近代女学的发展又不能不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基督教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女子教育方面，不管其主观目的是什么，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教会女子学校作为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参考书目：

Gerald F.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 – 1951*.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2.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Ethel Wallace, *Hwa Nan College –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第六章　开办教育的传教士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故人们一直把基督教看作西方的主体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基督教全球性宣教运动自然也是从欧洲开始的，到了19世纪，美国的宣教运动开始兴起，并逐渐处于领先地位。欧美传教士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中国宣教的目的并不是办教育，并且传教士也并非在所有的国家都开办了教育。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育规模之大，程度之高，在亚、非、拉都是罕见的。有些非洲的朋友甚至抱怨说，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那么多大学，为什么不在我们这里办大学？传教士都知道怎样传教，但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知道如何办教育，同时也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对办教育有兴趣。传教士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办教育，这与他们本身的素质很有关系。这些素质包括他们所受的教育、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在中国开办学校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美国19世纪后半叶的宣教背景与特点也与这些传教士的教育活动有关。在这一章，我们就来探索传教士在中国办教育的背景和动机。

一　美国的宣教运动

美国的第一个宣教组织成立于1810年，以此为标志，美国的对外宣教活动正式开始。然而，以中国为重点的大规模的宣

教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时美国基督教中参与向中国宣教的团体有11家，到1923年时，这类的团体增加到65家。[①]美国基督教中向中国选派传教士的机构主要有三类。最普遍的一类为某一单独宗派的差会；第二类是依靠一个或多个宗派支持的独立机构；第三类为无宗派的、直接从公众获取支持的机构。在美国基督教中最为热心宣教的宗派主要为公理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这些大的宗派都有自己的神学院和自己的大学。

在向中国宣教的开创阶段，各差会倾向于选派那些受过基督教教育、已受按牧的牧师为传教士，他们被期望去承担开创教会的工作。早期的传教士大多来自新英格兰中、西部和纽约州北部的小城镇和乡村。然而由于在中国的传教工作非常复杂，许多工作，特别是医药、教育等，已超出了一般传教士的能力，故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日益受到青睐，许多大宗派的差会部开始放弃对传教士专业化的要求。再者美国的年轻人受社会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对街头布道、分发单张之类原始的传教方法不再感兴趣，如果仍一味要求他们接受圣经学校课程的深造或神学训练，许多合格申请者的热情都会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各差会选派传教士的观念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没有神职的专门人才被录用去承担技术和教育方面的传教工作，印刷工、教师、技工和护士开始获得传教士的身份。许多差会还赞助一些短期传教工作，以吸收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最具潜力、最受青睐的招收对象主要为那些在大学读书的福音青年。在19世纪末时，美国男性白人大学毕业生约占当时

---

① Valentin H. Rabe,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 1880－1920. 5.

他们同龄人的1%。在美国的历史上，只有30%的国会议员、60%的总统获得过大学学位，所以最优秀的传教士也是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中挑选的。各宗派的大学是发现传教士的最佳场所，因为许多在教会少年团契或主日学中对宣教有兴趣的年轻人都被录取到宗派大学中读书，成为福音青年。

从19世纪80年代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到中国宣教的主力军。这些大学生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大学，中西部开始取代新英格兰成为大多数传教申请者的诞生地。这些宣教自愿者大都生于东部的大城市，很少有来自乡村背景的。与传教士大多来自贫穷家庭的传统看法相反，大多数宣教自愿者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由以上可以看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传教士在文化教育素质方面普遍高于早期的传教士。

大批大学毕业生加入到向中国宣教的阵营与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生志愿运动有密切关系。学生自愿运动是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基督教中千禧年思想复兴的气氛下形成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英美基督教中流行一种新的千禧年思想，这种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前千禧年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迫近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有一个预备时期。前千禧年思想很快成为美国福音教会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教会开始重新强调协力祷告的训练，重新恢复查经班，前千禧年主义的牧师和组织者在许多地方召集暑期圣经会议。前千禧年主义者根据他们对圣经预言的解释认为，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地球以前，福音必须被传遍全球。这种结论明确地把传教事业看作教会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在美国著名的福音传教士穆迪（Dwight L. Moody）于1886年夏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第一次学生暑期圣经会议上，一群年轻人，主要为大学本科生公开表示要成为国外宣教士，由此开始了学生志愿运动。1888年学生志愿运动的领

袖在美国近200家大学和神学院中进行巡回招募运动，共招募到2200多名志愿宣教的大学生。同年12月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正式成立。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得到了所有宗教国外传教团体的赞同和合作，很快就成为北美洲最大，可能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在学生志愿运动中，有意宣教的学生志愿者通常被激励填写一张誓约卡，作为他们承诺国外宣教事业的保证。这张誓约卡上写着："如果上帝允许，成为一名国外宣教士是我的目标。"为了维持这些写了誓约的学生志愿者的动力和热情，许多大学校园还组织了"志愿队"，并与青年会合作举办一些宣教教育的适当活动。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在福音传教事业中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1898年学生志愿者人数为2221人，1906年达到4235人，1914年为5031人，1919年更达到8140人，超过同一时期北美洲基督教差会派往国外传教士总数的一半。学生志愿运动强调传教士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领袖穆德（Johm R.Mott）反复说，宣教事业的最终成功首先不是依赖于大批的传教士，而是依靠装备完善的传教士。作为这种组织一批基督东征精华顾学的结果，在宣教领域中不断增加的志愿者就能够热情地致力于更专业化的宣教工作，而非简单的街头布道。与学生志愿运动对志愿者教育素质的要求密切相关的是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基督教中流行的一句口号"世界的福音化在我们这一代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培养一批当地的基督教工作者，而由他们负责把福音带给他们千百万的未福音化的同胞才能实现。很明显，世界福音化的任务成功的关键在于接触非基督教国家受过教育的青年。这样的富有冒险性、刺激性的工作对北美的大学生来说似乎特别有理、特别有吸引力。许多美国的基督徒都认为，放在基督教宣教事业面前最伟大的任务就是为基督徒社区以及国家培养领袖，如此重要的工

作只有选派美国最优秀、最棒、在最好的学校中受到最好的教育的年轻人去承担，他们可以用他们充满热情和渴望的心，用他们最佳的成就去与他们面前最优秀的学生接触。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也就改变了美国国外宣教的战略：从传统的尽最大努力向未福音化的大众宣讲福音，转到通过集中力量去争取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来使异教徒社会基督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国外宣教运动，特别是学生志愿运动中，中国是传教士最普遍选择的国家。据统计，1906年学生志愿运动共派出2953名传教士，其中826人，约占29％选择去了中国；在整个1886年至1919年期间，学生志愿运动派出的8140名传教士中共有2524人去了中国，百分比升为31％。这一时期在中国长期或短期工作的学生志愿者主要担任高等教育机构的开创者、管理者、教师、青年会干事等，与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一起工作。另一些学生志愿者作为“传教知识分子”负责编写或翻译教科书、圣经注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编辑和出版报纸、杂志，从事使传教事业更知识化的工作。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传教士都感到，传教士必须具有较高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来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通过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著作纠正他们的谬误并把他们带向基督。岭南大学的创始人汉珀曾说过，如果基督教要攻下中国这个堡垒，这将通过潜移默化，通过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以及基督教的教育，通过中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中国传统教育的自我瓦解才能做到。这种观点也由当时中国的改革派和一些政府官员对近代西方教育越来越浓的兴趣而得到加强。

19世纪下半期美国国外宣教运动的形势、美国向中国传教战略的变化以及学生志愿运动为传教事业提供的新一代传教士，都促成了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开办教育也

成为当时传教事业必不可少的一环。

二 在华兴办教育的传教士背景

除了美国国外宣教运动的大背景外，在中国直接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其个人的经历，特别是受教育背景，或许也会对我们洞察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兴起有所启示。

早期在华开办教会中小学的传教士中，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于1926年毕业于美国阿默斯特（Amherst）大学，并在安多（Andover）神学院受过3年的神学教育。他曾任马礼逊教育会的通讯秘书，对教育很重视，积极呼吁英美派遣教师到中国来办学。创办马礼逊学堂的传教士布朗，1832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以后又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攻读神学。他还在纽约聋哑学校当过教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早期在宁波、登州等地开创男女寄宿学校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49年从美国联合大学毕业后，从事教书事业。1850年他又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19世纪40年代担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36年毕业于英国阿伯丁英王学院，毕业后担任布莱克本学校的校长，成为职业教育家。后来他又进入希伯利神学院学习，准备到中国传教。曾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的另一位传教士傅兰雅，1860年毕业于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所受的就是师范教育，他到中国传教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办教育。在圣保罗书院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同文馆的教习，上海英华学堂的校长。

在中国开办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传教士中，创立登州文会馆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58年毕业于杰佛逊大学，从事过教学

工作，后进入美西神学院专攻神学3年。曾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18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又在纽约总神学院攻读神学。创办潞河书院的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虽然由于美国南北战争使他无法进入大学而不得不去当兵，但他还是于1866年考入纽约奥伯恩神学院学习。在此以前他还有过3年的教学经历。杭州之江学院的创始人，另一美国传教士贾德森，于1876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他是第一批来华的受过职业教育训练的传教士；继他以后任之江学院校长的另一美国传教士马可吐斯（mattox），则是衣阿华帕森思（Parsons）学院的毕业生，获有硕士学位。东吴大学的创办人，美国传教士安德森曾就读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另一在东吴大学当过校长的美国传教士克莱，毕业于阿肯色的Hendrix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曾在上海开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58年毕业于佐治亚的埃默里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福建协和大学的首任校长琼斯1904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州的Weslegan大学，在校时他就是学生志愿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还在耶鲁大学取得化学硕士学位。创办岭南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汉珀，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士，他先是毕业于杰佛逊学院，后又去美西神学院深造，然后又进宾州大学医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担任过南京金陵大学校长的美国传教士鲍恩，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担任该校副校长，曾创办南京益智书院的另一美国传教士威廉姆斯，毕业于Marietta学院，并在Auburn神学院就读过。曾任文华大学校长的英国传教士杰克逊（James Jackson）把英国公立学校的最好传统介绍到了文华。创办长沙雅礼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则全为耶鲁大学学生志愿队的成员。在华南文理学院任过校长的卢爱德女士在Morningside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又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中国教会大学中的风云人

物，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毕业于汉普顿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在中学教过书，后又进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

另外几位在中国教会教育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传教士也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任爱丁堡宣教会议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高彻，曾在中国呼吁发展高质量的教会大学，并主张联合办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的建立都与他的努力分不开。在来中国以前，他长期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女子学院的院长，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在组建燕京大学工作中出过大力的美国美以美会主教柏锡福，曾任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校长，对办教育也是得心应手。在美国组织学生志愿运动，特别是推动向中国的传教工作，并多次来华为基督教教育摇旗呐喊的穆德，曾就读于依阿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得过哲学学士和历史政治学士学位。

从以上这些在华开办教育的传教士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传教士大都受过神学以外的大学教育，他们所受的良好的高等教育，一般来说，使他们对教育的认知比一般的传教士深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产生那么多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至于后来加入到中国教会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受过专业的大学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的传教士，就更多了。

三　在华传教士对教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传教士对传教是否要办教育素有争论。早期传教士的直接目标是集中在使人皈依基督的传福音上，那时教育只被认为是传教的一个辅助手段。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首

次全国会议，商讨各宗派如何联合传教等问题，狄考文在会上作了“传教与教育的关系”的专题报告，强调教育在传教中的作用。狄考文认为如果布道是传教工作的步兵，那么教育就是它的兵员供应站；如果教会不在教育方面起领导作用，那么它就会有被受过教育的无神论者攻击的危险，新的反基督教运动将从新的学校发起。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则会使当地教会自力更生，并使它们在知识上做好准备，以对付所有的挑战。所有基督教家庭的子女都应接受学校教育；然而，最迫切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领袖，特别是有效的、可靠的当地传道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才能提供给他们智慧和威信去面对将来的无神论者和现在的儒家弟子；传教士不仅可以开办学校、教授科学，而且上帝也呼召他们这样做。会上传教士对此展开了讨论，有些传教士认为，过分强调教育事业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应以直接传教为首要任务；更有些传教士甚至坚持放弃“世俗”教育。来自华北地区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对于教会办学校基本上是赞成的，认为它可以作为传教的辅助，吸收一批学生入教，并且培养一部分传教助手；但同时，他又担心如果给学生教授一些神学以外的西方课程，可能反而会使学生背弃宗教信仰。所以他对办教育是持一种矛盾的心态。持有这种心态的传教士也有不少人。

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施若瑟对教会教育有着同狄考文一样的超前认识。他在1877年准备来中国时就呼吁在中国建立一所传教大学。他说，从教会的最早期起，教育就一直是宣传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力量；如果教育在西方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它在东方传播基督教中将不会如此有力呢？

在华北从事教育工作的谢卫楼，曾在1890年2月7日的北京

传教士协会上作了题为《教会教育与其他传教工作分支的关系》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向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解释，教育就是在传教，因为在华北迄今为止的直接传教活动令人失望。与会的有些传教士反对办教育，他们的理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没有指示要办教育开学堂。针对这种说法，谢卫楼反驳说，这同某些中国人坚持孔夫子和祖先都没说过要修筑铁路，因而把已经造好的铁路拆掉一样地保守。他认为，办教育与传教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巩固传统的成果，培养一大批忠实于教会的中坚分子，为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奠定基础。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也曾说过："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只是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是提到西点军校。那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教育和训练。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使者，而且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①

一般来说，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教士对教育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教育必须为传教服务，教育应该为教会培养人才方面。19世纪90年代以后，传教士对教会教育有了更宽广的认识，传福音以及为教会培养领袖不再是惟一的因素，对中国未来公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进行知识和道德的培训

---

① *Records of the Geren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 497.

越来越被强调。大多数传教士产生了一种共识，即基督教通过培养出拥有现代知识和基督教理想的毕业生可以服务于中国。

其实早在1885年，后来成为岭南大学校长的香便文就说过，基督教大学的目标就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传道人、教师和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生活中需要的人才，它所追求的是中国的启蒙和基督化。

1890年5月谢卫楼在上海全国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进一步表示，只有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国家带来的文明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只有传教士开办的教育，才能使中国现代化。教会必须积极办教育，这样就可使基督教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大企业中当督办。

1902年在山东的传教士起草的《教育工作联合的基础》宣称：联合大学的目标首先是为了在中国的基督教事业，是为社会培养拥有基督教理想和动机的男男女女。

1896年傅兰雅发表《一八九六年教育展望》，论述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他写道："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和政府的形式，早已在天平秤上显示出了非常的不足。怎样把中国从目前日本的魔爪和可以预见的西方列强的支配中拯救出来，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简而言之中国已从长期沉睡中苏醒过来，可是她发觉自己正被迅速地冲向一个大瀑布，除非用最大的努力，毫不迟疑地拯救它自己，否则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祸。……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

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危机。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她也不能把基督教拒之门外。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①

1900年以后，在华传教士对办教育基本上有了共识，不再排斥教育在基督教事业中的作用。不管传教士办教育的具体动机是什么，教会学校在客观上对中国教育、社会的近代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书目：

John K.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Valentin H. Rabe, *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 1880 – 192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 University, 5. 1978.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 *Chinese Recorder*，1896年1月，第36－37页。

第七章　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除了开办教会学校外，还有一些传教十直接参与了中国官方学校的教学工作，有些还参与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及官方大学的创建工作，此外在推动中国往海外派遣留学生及早期的选派留学生方面，传教士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工作虽然大部分不在教会教育的范围内，但却是中国教育从保守封闭走向近、现代，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中，传教士所产生的影响，教会学校所具有的开创、示范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在两大因素下促成的：一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开始出现，并且日益加剧，这使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传统的教育已经落伍了，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近代社会的需要，培养不出国家急需的人才，这种教育非改革不可。二是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开办了不少教会学校，这些学校教授许多西学课程，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实际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输入，主要是由传教上承担的；教会学校的开办以及西学的输入就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以后的许多教育改革活动，传教上的影响随处可见。

一　传教士参与中国官方学校的教学工作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

剧，这促使清政府内的一些改革派开始注重西学，洋务运动随之开始。因洋务需要，清政府设立了少数几所既区别于教会学校，又区别于旧式学校的洋学堂，也称新式学堂。中国官办的洋学堂是从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肇始的。其后清政府又于1863年在上海开设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开设了同文馆，此后又陆续开设了一些工科学校和军事学校。在这些学校中，有许多传教士担任教员，当时称为教习或总教习。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办的这些同文馆或广方言馆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开办这种学校的起因是翻译人才的急需。按《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这意味着3年以后这类条约将不再附有汉文。为了使与外国人办外交时不受欺蒙，清政府急需翻译人才，而当时的中国传统教育并不能产生翻译人才，通过科举考试的学者不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去建立一些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

1862年建立的北京同文馆，一开始是使用中国人去教外语，但结果令人失望，清政府不得不聘请西方人，而当时比较容易聘请到的西方人主要为传教士。北京同文馆最早聘请的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包尔腾，他于1862年开始教授一个英语班，学生有10名，均为从八旗子弟中选出的十三四岁的少年。1863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接受了北京同文馆的邀请去当教习。他主要教英语，每天授课两小时。同文馆刚开始时，只有英语课程，以后又陆续增加了法语、俄语和德语，最后增加的是日语。法国传教士司默灵应聘为法文教习。1865年，傅兰雅因受上海新开张的英华学堂的聘请，担任校长，辞掉了同文馆的工作。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于同年3月接替了傅兰雅的工作任英语教习，每天授课两小

时。在这几位曾在同文馆工作过的传教士中，以丁韪良工作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丁韪良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于1850年到达宁波传教。在这以前，他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学习过，后又在一所长老会教区学校教书。到达中国后，丁韪良先是于1851年2月和5月在宁波开办了两所走读男塾，后又于1864年5月在北京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丁韪良十分看重教育，他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传播，必须从教育入手。他曾向长老会差会提交一份建议书，要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虽然创办教会大学的目的没有实现，但由于参与了同文馆的教学工作，在推动中国新式学校的建设上，丁韪良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刚开始时，由于学生人数少，丁韪良并不太愿意在同文馆工作，甚至准备辞职，总理衙门连忙派两位大臣前来挽留，对他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就是这十个学生，他们的前程也是未可限量啊！我们一天天地老了，他们十个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语，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丁韪良听了很受启发，他认为同文馆的影响远比北京街头上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于是决定留任。

1866年清政府对同文馆进行了一些改革，增设科学馆，使之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校，所以同文馆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官办的新式大学。这些改革包括：(1) 从全国各省招收聪明的青年人，突破了以前只在八旗子弟中招生的局限；(2) 聘请西方人担任教学工作；这项做法以前已经实行，但现在聘请的人数更多；(3) 购置图书、仪器；(4) 增设新课程，包括：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冶金学、机械学、解剖学、生理学、政治经

济学和国际法。1867年12月同文馆决定聘请丁韪良担任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的教授。丁韪良答应了这个安排，但要求先回美国进修一段时间。1868年6月丁韪良离开中国回美国，在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等课程，1869年夏返回北京。

丁韪良回到北京后，赫德极力推荐他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在通过了清政府对他进行的数学考试后，丁韪良正式被总理衙门聘为同文馆的总教习。1869年11月26日，同文馆为丁韪良举行就职礼，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和美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卫三畏都前往参加。从这一天起，丁韪良担任这个总教习职务长达25年之久。

丁韪良到同文馆上任总教习后，就开始在学制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把同文馆的课程分成5年制和8年制两种。5年制的课程是为那些已经有科名或已有较牢固的中文基础的汉人或满人设计的，不包括外语。前两年，除了介绍西方的数学外，主要学习汉、宋两朝的古典中国数学。后3年的重点则在科学、数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方面。8年制的课程是为八旗子弟设计的，前2年和第3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一种外语，有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学英语的学生在以后的科学课程中也用英语学习，学其他语言的学生则用汉语学习以后的科学课程。第3年的课程还包括地理和历史。数学和科学课程则为后5年的主要学习课程。1869年时同文馆的学生人数仅有40至50名，接下去的两年学生人数开始增加，达到100名，1888年学生入学人数达到125名的高峰。大多数学生进入8年制的课程中学习，入学的年龄一般在15岁左右。另有约20％的学生进入5年制的课程学习，他们或者已获得了科名，或者是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学生的来源在1870年前主要为北京的八旗子弟，1870年后从外省以及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招的汉族学生开

始增加，到1893年时，52%的学生为汉人，48%的学生为八旗子弟，汉人超过了八旗子弟。在丁韪良负责同文馆期间，学校的教员包括8至9名西方人和4名中国人，以及一些助教。教员通常每人教两门课。丁韪良本人主要教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

在学校建设方面，丁韪良劝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臣文祥拨款为同文馆建造教学建筑。1876年清政府拨款在同文馆建造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88年又建立了一个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丁韪良还逐渐为同文馆建起了一个图书馆，图书主要是通过赠送和购买得来的，藏书量达到7500本英文书和2000本中文书，一半的中文书都是有关数学方面的。图书馆的阅览室则有不同语种的报纸和杂志。1880年清政府出资派丁韪良出国考察教育。丁韪良用了两年的时间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考察了各国的教育制度和现状。1882年回到中国，用中文写了《西学考略》一书，向总理衙门作了汇报。这本书对清政府了解世界教育趋势、进行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丁韪良还曾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入科学科目，这导致李鸿章在188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科目。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希望通过这一变化来得到学位。

同文馆是中国官方的一所世俗学校，正式教授宗教是不可能的，但作为一名传教士，丁韪良表示在他的管理下，至少可以减少同文馆对基督教的反对。他还要求他的同事，如课本中遇到有关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学生们也常同他谈论宗教问题。清朝的一位高官曾表示，如果传教士都像丁韪良这样，他也会成为基督徒。

同文馆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培养出一批翻译家和外交家，在中国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1866年3名同文馆的学生就

被送往欧洲，1868年6名学生出使美国，1870年2名学生前往法国。1877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清政府又在德国、美国、法国、俄国、西班牙和秘鲁设立了公使馆。1879年时在这些公使馆中共有16名同文馆的毕业生担任翻译，他们的官品在4至9品之间。1888年时，出任翻译的同文馆毕业生达到20名。后来，同文馆的毕业生逐渐开始担任比翻译更重要的外交职务。早在1888年，一些同文馆的毕业生就开始担任中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团的秘书，1896年两名毕业生已担任总领事，到1907年时，两名毕业生担任驻日本公使，一名担任驻英国公使，一名担任驻法国公使，一名担任驻德国公使。留在国内的毕业生，许多人在皇宫和六部，特别是在户部中任职。到1888年许多毕业生担任文职官员，在各地担任地方文官和县长等。有的则在电报局工作，还有的担任各省要员的翻译，或接受其他显要的职位。很明显，同文馆和西学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的外交界和政治生活中处处可见。同文馆在近代中国的官方学校教育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同文馆的师生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到1888年时，已有20多本西学著作被翻译。丁韪良翻译的两本书《万国公法》和《自然哲学》也被出版。此外，他还参加翻译了其他9本科学、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清政府总理衙门对丁韪良在同文馆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为了感谢他在同文馆的服务，总理衙门还报请皇帝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在国外，丁韪良在同文馆的任职也引起轰动，1870年美国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有的书刊还称他为中国近代官方教育的先驱。1894年，丁韪良因健康不佳辞去同文馆的职务，回美国治病。

除了参与同文馆的教学管理工作外，京师大学堂，即后来

的北京大学成立后，丁韪良也参与了该校的教学工作。京师大学堂产生于1898年6月的百日维新，当时清政府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经常同丁韪良商量学校的建设问题，并听从他的建议用“奖学金”而不是“津贴”去资助学生。孙家鼐为丁韪良的才干所吸引，他提出聘请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1898年8月9日清政府正式授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清政府还把他的官衔从三品晋升为二品顶戴。

1898年12月初，京师大学堂进行入学招生考试，12月31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1899年1月28日正式上课。当时丁韪良所聘请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基督教中人士，外国人主要为从事教育的传教士，中国人则多为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900年春，学校共有10名外国教习，12名中国教习。

义和团运动期间，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1月慈禧任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仍聘丁韪良为总教习。由于张百熙的民族意识很强，认为中国的学校应由中国人自办，外国传教士并不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不应指导中国的学校，故于1902年2月26日以学校经费困难为由，解聘了所有外国教习，包括丁韪良。

1902年北京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组建为国立北京大学。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官办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的参与以及带来的西学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参与了中国的官方学校的教育工作，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习达10多年。

二　传教士倡导参与中国官办大学的创建工作

中国近代的新式学堂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政府开办的大学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分别在天津和上海建立了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戊戌变法中产生了京师大学堂。义和团运动后又出现了山西大学堂和清华大学。清政府开办的这些大学，虽不是教会学校，但大都是在西学及传教士的影响下建立的。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在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的创建工作上起了不少的作用，他还担任山西大学堂的西学专斋总理达10年之久。李提摩太早年就读于英国斯温西（Swansea）师范学院，并曾担任过一家小学的校长，后在英国浸礼会的一家神学院念神学。1870年他到达中国山东烟台，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李提摩太采取的是一种“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法，侧重与中国政府的高官显贵接触。他同清政府的高级官吏、洋务派领袖及维新派领袖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颇深，并极力向他们鼓吹他的变法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后，李提摩太于1895年10月26日在北京拜会了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在翁同和的建议下，他写了一份改革计划奏报光绪皇帝，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成立学部，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在这期间，李提摩太还经常同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会面，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梁启超并从1895年10月到1896年2月间担任李提摩太的临时秘书。光绪皇帝还从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买了近80本有关西学的书，每天在孙家鼐的帮助

下阅读。1898年6月至9月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由此可见，维新运动受李提摩太的影响极大。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出73条改革谕旨，其中有36条涉及到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各地旧有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皆归大学堂统辖。联想李提摩太1895年奏报给光绪皇帝的改革计划中有关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的建议，以及他对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影响力，我们不难看出，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同李提摩太的鼓吹倡导是分不开的。

义和团运动后，山西大学堂的建立更是由李提摩太直接参与筹办的。由于李提摩太在中国鼓吹变法、倡导西学的名气，以及在山西传教的经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1901年5月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拍电报给李提摩太，请他本人或推荐一个传教士到山西去，办理教案善后事宜。李提摩太接受了岑春煊的邀请，并草拟了一份《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7条。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西省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许多中国基督徒被杀，许多教会财产被毁坏，按照以往教案处理方法，山西省要付出一定的赔款。李提摩太在这个章程中首次提出利用赔款办学堂。该章程第3条提出，山西全省应被罚“银五十万两，每年缴款五万两，十年为期。此款不归西人，也不归教徒，专为开导山西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①

李提摩太提出的以山西的赔款办学一事，一开始被岑春煊以山西人民的贫穷为由加以拒绝，但李提摩太指出仅在山西的一些地区每年花在看戏等娱乐上的费用就超过5万两银，每年

①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19卷，“办理山西教案章程”。

拿出5万两银办学对山西全省来说不算什么问题。在李提摩太的压力下，1901年8月岑春煊派员赴上海与他谈判，最后达成一个由李提摩太负责筹建的中西学堂的合同草案。草案规定山西省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学堂，10年之内，学堂课程、延聘教习及考选学生，均归他主政。10年后该校交由中国人办理。

这项合同草案签订后，山西省的一些保守派劝说岑春煊，称这所中西学堂是摧毁儒学、迫使山西的学生成为基督徒、放弃中国神圣的习俗、学习西方邪道的传教大学，应该再开办一所以儒学为基础的大学与之竞争。

1902年4月李提摩太来到太原，花了40多天的时间与岑春煊等官员协商，以消除他们的疑心。李提摩太强烈反对建立两个相对立的学校，他认为这不仅浪费大量的钱财，而且还会使中西学堂力图去结束的中外冲突永久的存在下去。他提出为什么不在山西大学堂的总名称下将两个学校合并，而其中的一个为西学专斋，另一个为中学专斋？岑春煊同意了他的提议。1902年6月7日双方订立了新的合同共23条。这个新合同规定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包括经费的支配、教师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校规章制度的制订等。只是西学专斋的学生膳宿事宜，由中学专斋负责办理。

合同签订后，岑春煊拨款给李提摩太去筹办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自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聘请英国传教士郭崇礼为西学专斋总教习。为了提高培训学生的效率，李提摩太向岑春煊提出，进入西学专斋学习的学生必须拥有秀才的科名并且已经完成了中国经典的学习，这样，6年后他们就会成为有用之才，比在旧制度下度过12年要强得多。由于山西大学堂的新校址尚未建好，6月9日岑春煊暂时将科举考试殿借给山西大

学堂办学之用。6月26日西学专斋正式开学，岑春煊等高级官员出席了开学典礼，入学新生为98人。当时西学专斋设立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5科。

关于大学中的宗教自由问题，双方达成默契，如果传教士不强迫学生成为基督徒，那么中国官员也将不阻止那些希望成为基督徒的学生加入基督教。

为了向学校提供最好的教科书，山西大学堂还在上海设立了一所译书局，由外国教授与中国助手一起翻译、编写教科书，其经费也由赔款中支付。

李提摩太担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直到1911年，这以后山西大学堂改由中国人自办。为了嘉奖李提摩太对中国教育改革、创办学校所做的贡献，清政府曾于1902年赐他“加头品顶戴，赐二等双龙宝星，命参议教案”。

清华大学的建立则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有关。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兴起到国外的留学热，但去美国留学的学生甚少。1906年明恩溥在白宫向美国总统建议，用清政府的赔款在中国办学及资助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美国方面正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并提高留美学生的质量，清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为赴美学生开设了一所预备学校，校名为清华留美预备校，1924年这所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

三　传教士与近代留学潮

中国古代，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很少有学生出国留学，这是因为当时世界的交通、通讯很不发达，中国人很难知道外面的事情；再者那时国外的教育水平一般没有中国高，中国人

也没有必要到外国学习。从明末起，中国逐渐落伍，继而闭关锁国；而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在科技和教育上都赶超了中国。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以及环球传教运动的展开，中国人开始了解世界，并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许多中国青年的志向，他们开始到欧美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由于教会学校与西方教育机构的联系较多，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并且后来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于1847年带到美国的。马礼逊学堂是由马礼逊教育会于1839年在澳门建立的，由布朗负责校务。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问，凡是表示希望和他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着，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4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

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早期的留学生都不是富家子女，主要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留的穷孩子，他们出国留学都与传教士有关。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折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容闳又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且是由传教士最早带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传教士的教育工作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这也是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目的之一。

进入到20世纪后，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势头更加旺盛，形成了一股“留学热”，大批学生到日本、欧洲留学。在推动赴美留学的活动上，传教士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

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情况对美国的整体利益将产生不利影响，故呼吁政府改变政策。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认为：“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收时，将比用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旗舰之后更为合乎情理。”①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向他汇报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如果要防止义和团这样的排外运动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和多设立由传教士进行教育的学校。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此类学校之用。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善意，减少中国人对美国的怀疑，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他全文引用了詹姆士给罗斯福的备忘录，说明吸收中国留学生的迫切性、必要性以及实际效果。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逐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人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②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

① 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PP. 213—218.

② 《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

国庚子赔款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并要求从1909年开始，4年内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5年起每年不得少于50名，直到赔款退清为止。从此，赴美留学的人开始增加。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①

在官办的山西大学堂中，由李提摩太负责的西学专斋也曾于1907年送出25名学生到英国留学。

四　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

虽然从1840年起，中国社会就进人近代，但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却一直保留到20世纪初。学制和课程是教育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中国政府对学制和课程进行改革，使之近代化，这一进程是在20世纪头20年完成的。虽然西方传教士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官方的教育改革，但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办报出版等方式不断批判封建旧学的种种弊病，宣传兴办新学与西学的重要性，并向清政府建议仿行西方的教育制度。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传教士有李提摩太、林乐知、狄考文、花之安等。早在1881年，狄考文就发表了《振兴学校论》，批评中国人古训至上，所学范围太窄，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人学。李提摩太曾任《天津时报》主笔，在《时报》上发表了200多篇社论，其中许多是关于变法的，教育改革也是其重要的内容；后他又

① 《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页。

任基督教在华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在他任职期间，他逐渐增加出版有关鼓吹变法的书籍，其中许多涉及到西方的教育；他还在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鼓吹改革中国的方案。1896年4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呈报光绪皇帝的改革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内容。李提摩太在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后，提出“以新学为当务之急”，“设立新学部，多筹经费，广立书院，从此渐推渐广”，使“人才辈出，为国家宣劳”。[①]林乐知曾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后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林乐知一直任主编。除了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倡导改革教育的文章外，林乐知还翻译了不少介绍西学及西方教育的书。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也在中国出版了许多书籍，如《自西徂东》、《西国学校》等，都是介绍西学和西方教育制度的。

基督教在华的全国性团体也介入了鼓吹教育改革的工作。1896年，中国教育会曾成立一专门改革委员会，推举林乐知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李佳白起草“改革中国考试制度议”。1898年，传教士们又以广学会的名义向总署呈送“速兴新学条例”，并分送各省督抚。

除了传教士的倡导鼓吹，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本身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冲击和挑战，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教育改革的问题。近代中国，官方的教育改革应始于戊戌变法，但由于变法的失败，教育制度的改革也遭到流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进行

---

① 李提摩太：《时事新论》，卷八，新学。

教育制度的改革。

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依日本学制拟订的一系列各级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公布并在全国实施的学制。该学制把整个学校系统分为3段7级。第1段为初级教育，分3级：蒙养院4年，初级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其中蒙养院招收3至7岁的幼儿，为现在的幼儿园性质，真正的小学应为9年。第2段是中等教育，不分级，共5年。第3段为高等教育，分3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至4年，通儒院5年。其中大学预科相当于现在的大专，通儒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整个高等教育为11至12年。总的来说，这个学制的小学时间略长，中学与现在相当，高等教育如果算上博士学位，11年应不为长。此外，与各段学制相对应，还设立了各类专业教育，如农业、商业、商船、师范等院校。在课程设置上，“癸卯学制”仍把读经讲经科和中国文学科列为重点的必修课，自然科学课只占非常小一部分，可以说课程改革在这个学制上没有实现。另外，整个教育系统不设女子教育，仍将女子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

“癸卯学制”的制订与实行，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政府的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在该学制颁布后获得了发展。据清政府统计，至1909年，全国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种实业学堂254所。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9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颁布了《学校系统令》；1913年教育部又公布了各级学校的法令。同年教育部把这些法令和《学校系统令》综合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学校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

制》。

这个学制规定，普遍学校教育系统期限为18年，分为3段4级。第1段是初等教育，分2级：初等小学4年，定为义务教育，儿童6周岁入学，实现男女同校；高等小学3年，男女分校。第2段是中等教育，只设1级，共4年，另专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第3段是高等教育，也是1级，但分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本科除法科和医科中的药学门为3年外，其他科均为4年。

在此以前，教育部还于1912年1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等5个科目；高等小学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手工、体操。中学的课程有：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图画、手工、法制、经济、音乐、体操，女生加家政、裁缝等。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同清末相比，无论是在废除男女教育不平等，废除中小学读经讲经、取消大学经学科方面，还是在缩短学制年限、加强自然科学和实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近代学制形成后，虽经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清末采用的日本学制，存在不少问题，如小学过长，中学过短等。以后，由于美国退款兴学，留美学者日渐增多，美国教育逐步引进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哲学家杜威等访华后，美国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批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并在教育界任职，也对这种影响的扩大起了推动作用。早在1917年，国内就有人提倡美国学制。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7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

学制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提出了各自的学制改革案，其中有不少提倡美国学制和中学分科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修改学制，接着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同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实施。此学制一般称为“新学制”或“壬戌学制”，由于采用的是美国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称“六三三学制”。

“六三三学制”的主要内容是：初级小学4年，从6岁开始，高级小学 2年，共6年的小学教育；初中3年，高中3年。这一学制的颁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扩大了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中学延长1年，取消了大学预科，中学三三分段，这一改变提高了中等教育的水平，以满足对中等教育水平人才的需要，并减轻了大学的负担，不再负有普通教育任务。这一学制较为适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此后除进行个别调整外，一直延用到1949年。

参考书目：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Washington, D. C.: Christian College Consortium, 1978.

B. Reeve, *Timothy Richard, D.D. – China Missionary Statesman and Reformer*. London: S. W. Partridge & Co. Ltd..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图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八章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变化和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大大觉醒。许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近代落后挨打，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是分不开的。由于传教士全都来自西方，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时中国人民中的反帝情绪也包括对传教士的不满。另外，在教会学校中，确实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抱有盲目的西方白人优越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学生指手画脚，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多少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与教会学校中一些传教士所持有的西方白人优越的心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也突破了校园的围墙，扩展到社会上，使20年代的中国不断出现排外反帝的浪潮，教会学校自然也成为公众斥责的对象之一。随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教会学校的不满，传教士在华开办学校之权威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民众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政府对这一要求也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压力下，教会学校开始进行了“中国化”的调整。在这一章中我们就将介绍教会学校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的变化与发展。由于教会中小学的数目太多，我们仍以基督教的高等教育为主线，观察教会教育在20年代后的发展走向。

一　收回教育权运动

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传教士对教育工作更加重视，教会学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1914年时，基督教在华开办的学校共有4100所，学生人数为11.3万名，加上天主教的学校和学生，共有教会学校1.2万多所，学生人数25万名左右。而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有5.7万多所，学生约163万名。官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5比1，学生是6比1，[①]可见当时教会学校的影响之大。到1918年时，基督教的学校增至7382所，学生达到21万多名，加上天主教的学校和学生，教会学校占当时中国学校总数的7%，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②]在高等教育方面，1921年时，中国的公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有5所，而著名的教会大学却有16所。[③]

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有的教会学校都不受中国教育行政当局管辖，到了清末，中国学部更颁发了《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将教育主权让给外国人。在20年代以前，在华的所有教会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1922年由美、英、中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曾在其调查报告《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中较客观地指出：教会大学“从性质上说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创立，由西方捐款所维持，由西方列强的条约所保护，并以同样的理由容许那些负责者索取任何权力和保持任何标准，而且往往是按照西方的法律在国外注册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34页。

② 李桂林：《中国教育史》，第405页。

③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661页。

的。不管过去的真实情况怎样，教会学校正是由于这些状况而阻碍了人们衷心的欢迎和予以承认，妨碍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支持，倒不是因为特殊的宗教性质而不受欢迎。”[①]当然这里既有西方列强的责任，也有清政府的问题。虽然在中国近代，民教纠纷一直不断，各地反“洋教”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没有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教育主权的问题还没有被明确地提出过。民国建立后，特别是一大批留学国外的留学生的归国，也把西方民主、自由等思想带回了中国，从而也加速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这就使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20年代里3种主要的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学生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在学生及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的反帝情绪。这些运动都很自然要波及到教会学校的工作。这些运动实际是中国人民对在近一个世纪中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进行侵略、压迫的强烈反应的表达。引起反帝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特权、治外法权以及西方优越感等方面的公开表现，一直是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中国的觉醒及辛亥革命所开始的中国的新纪元导致了中国民族自尊心的高涨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些反帝爱国运动都包含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不分老幼的支持，而尤以青年学生为其先锋代表。中国在20世纪头30年的近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学生的努力，他们是中国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因素转变，从保守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从漠然向行动转变的有力因素。

学生很早就开始在中国近代的公共事务中产生影响了，然

---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50页。

而从辛亥革命以后，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应该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当时学生们为反对西方列强主宰中国的主权而抗议示威，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反帝情绪和学生运动的一个分支就是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被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威胁中国生活方式的迷信。从本质上讲，这场运动应是反宗教运动，而并非简单的反基督教运动，因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以及佛教也受到抨击，当然运动的重点是放在明显带有外国色彩的基督教上。

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最初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校，主要是想以此作为宣教的手段，通过教育来使基督教信仰得以传播，所以在教会中开设宗教课是必然之事。问题是，在许多教会学校中，传教士向学生灌输的并非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而是西方白人文化的优越感，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生们的反感。比如，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传教士曾对学生说，我不爱中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来爱美国。广州圣三一学校的英国校长在反对学生组织自治会时也说，英国人的学校，断不能任你们中国人自由。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白人优越论的思想根本不是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理应受到中国人的反对。

早在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针对教会学校向学生灌输宗教教育，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这是中国正式提出非宗教教育的开端。触发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1895年由穆德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国际性团体，以各国在校基督教大学生为主要活动对象。从1896年起穆德曾多次来中国举行传教布道会，并把该同盟的第11届大会定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这一消

息传出后，引起了中国社会上的普遍反对，还在大会召开的前一个月，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于3月9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下，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公开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指责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接着北京知识界又于3月20日发起组织全国"非宗教大同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吴虞、胡汉民、汪精卫等都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陆续发表《非宗教大同盟简章》、《非宗教者宣言》等，得到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响应与支持。蔡元培在非宗教大同盟的第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①]同年，胡适等在中国教育改进社的年会上，提出了"凡初等教育（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的提案，将反对教会教育提上了规划教育发展的议程。1923年余家菊在《教会学校问题》一文中，从国家主义教育立场出发，首次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非基督教运动可以说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第一阶段。

1924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又掀起了新的反帝浪潮。出于与西方列强那种藕断丝连的感情，许多西方传教士是不愿让教会学校中的学生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的。这就导致了教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果说在前一阶段，大家反对的是一般的宗教教育的话，那么从1924年起，教会学校就成了众矢之的。导致新一轮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广州圣三一中学英国传教士与中国学生的冲突。1924年3、4月间，

---

① 《非宗教运动》，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78—579页。

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准备成立学生会并举行“五九”国耻纪念，遭到校方的反对；校方开除了多名学生，并以提前放假的方式来分散学生。对此，学生进行了更强烈的抗议，并发表了《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宣言》，提出了争取在学校中言论和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教育、收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主张。该校学生的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会学校的中国师生的震动、同情和支持。从4月到6月，全国形成了一个反对教会教育的浪潮。反教会教育的活动从一个学校发展到全广州市的教会学校，进而扩展到福州、南京等地的教会学校。6月以后，广州、南京、福建、湖南、上海、武昌、南昌、杭州、北京等地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教会教育的运动迅速掀起。广州成立了“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并于1924年7月提出了收回教育主权当前最低限度的办法是：“（一）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与核准；（二）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之支配及取缔；（三）凡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及宣传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堂念圣经；（四）不许压迫学生，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①

一些著名的教育团体也参加了这一活动。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作出了收回教育权的议案，要求政府制定注册条例，凡外籍人之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者应由政府勒令停办。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开会，通过了《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案》和《取缔外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案》两个

---

① 《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向导周报》第72期，1924年3月。

向政府建议的议案。在前一个提案中，提出：(1) 各级学校内，概不得布置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2) 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查各种学校，如遇有前项事情，应撤销其立案或解散之；(3) 学校对教师或学生无论是否教徒，应一律平等待遇。后一个提案提出外人在中国办学有4种流弊：(1) 外人在中国办学不向中国政府注册是侵略教育主权；(2) 外人所办学校不合中国教育本义；(3) 外人所办学校迹近殖民，有使中国之独立精神被撕去的危险；(4) 办学人无意办学，只把办学作为附属品。同时该提案提出了解决办法：(1) 外人办学应一律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2) 注册后应听从中国政府的监督与指挥；(3) 不得利用学校传布宗教。这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第二阶段。

收回教育权的第三阶段是从1925年"五卅"前后到1925年底。1925年"五卅"前后，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了高潮。当时为了抗议西方列强及日帝的暴行，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用退学作为反帝行动的方式。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大学部和中学部全体学生退学，全体中国教职员辞职，另立光华大学，福州的英华书院、协和学校、三一学校等，广州的圣心中学、中法学校等，河南开封的圣安得学校、济汴学校、华美女校，以及北京、武昌、南昌、九江等地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全体退学或部分退学。退学风潮给教会学校以极大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不得不关门。在全国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浪潮中，当时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1) 凡外人捐资设立各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须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官厅请求认可；(2) 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3) 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

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4) 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5)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6) 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至此，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形式上达到了其目的。

二　教会学校的调整

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教会学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渡过教会教育的难关，是当时教会学校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继续采用以往的办学方法，还是根据新的形势作必要的调整，教会学校不得不有所选择。

其实早在1922年由美英中3方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就向在华的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调整口号。组织教育调查团的建议最早是在1915年举行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的。1921年1月在美国各差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有16个差会和洛克菲勒财团表示愿对中国的教育调查提供经费。中国教育调查团由16名成员组成，其中美国人10名，英国人3名，中国人3名，团长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Ernest D. Burton）担任。1921年9月13日调查团在北京会合，然后分成南北两路实地调查。代表团分别到中国36个城市以及香港、马尼拉，调查了近500所各类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官立、私立学校，历时4个多月，到1922年1月结束。随后调查团把一部分报告内容编辑成书，出版了《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在该书中，调查团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中国“有一大批有高度事业心的中国人……决心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教育系统。他们勇敢、爱国、热忱、聪明、有自我牺

牲精神。……一个新的中国教育制度正在兴起，不管它有多少缺陷，未来一定会出现巨大的成就。……这些事实把教会学校放在完全不同于几年以前所占有的地位，以前几乎只有教会学校在中国是采用新式方法教学的。现在是意味着，要从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竞争已是不再有任何可能了。这种竞争已经过去，前十五年中国人设立的学校数已经获胜。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惟一地放在质量上。只有质量能吸引非教徒，……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1900年之前的时代，这对它们是有利的，因它代表了一定的质量，是中国学堂所找不出的。……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彻底地中国化和基督化，如果它要吸引学生和取得中国人的经济支持的话。……这些事实加在一起清楚地提出了教会学校的机会：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把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无所成。……我们根据近年来教会学校的发展和当前发展中所提供的新机会作出的清醒的判断，就是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以此提供给中国和教会一项服务，而这项服务是任何别的机关无法提供的"。①

"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成为教会学校调整的新口号，然而这一口号的真正实行还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以后。从1926年起，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并让中国人担任各级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把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改变得灵活一些，并尽量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的调整。

岭南大学是较早调整其政策、迅速中国化并向政府注册的

①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纽约），第12--15页。

教会大学。早在1925年夏，一群岭南的校友就提出了把大学改由中国人办理的计划。岭南大学的校长香便文非常明智、开放，对这一提议予以支持。1926年2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开会，讨论教会学校是否应该向中国政府登记的问题，香便文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表示，我们应该近早登记，这是毫无问题的。香便文的表态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香便文曾在一次演说中告诉学生，他一生中最愉快的目标就是中国人决定在其领土上管理学校的时候。他许诺尽最大努力使岭南大学向政府登记并表示他时刻准备着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以便把这一职位让给中国人。香便文的态度大大地缓和了岭南大学与民众之间的紧张气氛，也消除了毕业生因学校不登记而难以在政府机构及学校找到工作所产生的忧虑和惧怕。经过校内协商后，从1925年秋起，岭南大学将原先要求文科大学生必修的8个宗教学分课，改为选修课，学生有选择权参加主日崇拜。在中学部，原先课程中列为必修的圣经课，改为每周一小时的"生活哲学"课和一小时的"顾问时间"。"生活哲学"主要涉及影响行为和生活的道德和宗教问题，在"顾问时间"里，各方面的顾问则与学生讨论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1926年底岭南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占多数的指导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中国教职员工的财政需要，另外还建立了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美国基金会，负责西方教职人员的财经需要，校长一职则由中国人钟荣光担任，亨利则担任美国基金会的顾问。钟荣光是广州基督教学院1905年的毕业生，曾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过，后担任广州基督教学院中文系主任，1923年任该院副院长。到1927年1月，所有这些调整都圆满完成。1928年岭南大学正式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卢爱德也是一位积极提倡向政府

登记的美国传教士。1927年6月，她在给董事会的报告中说，不管华南学校董事会是否决定登记，目前学校的行政当局确信必须尽早地走这一步。我们相信这一转化将不会有困难，我们进一步相信这种转化不会减弱基督教在华南学校的影响。她还指出华南女子学院已经达到了政府对登记的要求，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已是中国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是建立在自愿参加的基础上，学校采取的是政府同意的行政管理方法。1928年6月，华南女子学院董事会选举王世静为院长，1930年1月王世静正式上任。王世静是华南女子学院1917级的学生，后又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局不稳，向政府注册也不是一项容易的事。1931年10月，华南女子学院正式向政府呈送登记申请，1933年6月教育部批准该校为一所文理学院，次年授予该校永久注册证。从此华南女子学院正式定名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政府要求教会学校登记的法令颁布后，福建协和大学校长高迪于1926年底就提出辞职，准备把职位让给中国人，但直到6个月后，管理委员会才接受了他的辞职，任命一个行政委员会负责学校的事务。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由中国人林景润担任，这样他就成为福建协和大学的首任中国人校长。林景润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毕业生，1919年又赴美留学，先后在奥伯利、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读书，获得硕士学位，1927年回到中国，在福建协和大学教授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他担任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条件向政府登记。1927年夏，学校董事会改组，中国人开始占了大多数，学校的宗教活动也改为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棘手的是学校的教育宗旨，如果写上宗教宗旨，很难获得政府的立案批准，如果去掉宗教宗旨，又很难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林景润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

其美的声明："福建协和大学以爱、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向中国的年轻人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最难达到教育部要求的是大学的教育能力，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申请大学等级的学校必须拥有3个学院。由于当时福建协和大学只有文、理两个学院，所以教育部虽于1931年为福建协和大学立案注册，但所注册的名称只是文理学院。直到1942年该校又增加了一个农学院后，这所教会学校才正式注册为大学。

东吴大学也是较早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1927年3月东吴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文乃史（W.B.Nance）就提出辞呈并催促董事会尽快找到一位中国人校长。同年夏杨永清被挑选为新任校长。杨永清是东吴大学的校友，曾在东吴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和法律，毕业后一直在外交界工作。1922年他曾被选为东吴大学的副校长。1927年12月杨永清正式上任东吴大学校长。1928年东吴大学开始向政府立案。为了达到立案的要求，东吴大学原先的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再加上法学院，达到了注册为大学的资格。由于杨永清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东吴大学的立案比较顺利，在1928年就顺利完成。

南京金陵大学是第一家向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后，南京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工全部撤到了上海。社会秩序稳定后，南京金陵大学在中国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重新开学，8个月后，陈裕光被选为校长。陈裕光是金陵大学的校友，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到金陵大学工作，曾任理学院院长。新校长面临的新问题之一就是向政府立案的问题。金陵大学申请注册的过程比其他教会大学简单得多。1928年9月20日，在陈裕光担任校长不到一年，金陵大学就顺利立案，成为中国教会大学第一家获得注册的学校。金陵大学当时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

院，被政府承认为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西方教工也于1927年3月离开南京，由校友行政会负责学校的工作，接着董事会推荐吴贻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吴贻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后去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昆虫学的博士，1928年回国担任该院院长。在向政府立案以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有了中国人的院长，董事会的半数以上也换成了中国人，但在学校的宗教宗旨及课程上还没有改动，因有些人还是舍不得放弃明确的宗教宗旨。最后经过变通，在既不放弃最初宗旨，又不使其过于彰显的情况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1930年12月正式在政府立了案。

上海浸会大学虽然一直注重学校的宗教特点，但也积极准备条件向政府登记。学校把宗教课程和活动改为自愿，增加了董事会中中国人的名额，并开始寻找中国校长的人选。1927年秋浸会大学向政府递呈了登记申请。1928年刘湛恩被任命为浸会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出生于基督徒世家，毕业于东吴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又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他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全国教育干事；他还担任两所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全国教育协会的研究主任，政府教育委员会的书记等；1929年浸会大学的立案申请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从这时起，浸会大学的校名改为沪江大学。当时沪江大学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

华西协合大学要求中国化的呼声不仅来自当地，并且也来自国外。1925年董事会就批准了学校向政府注册的建议，并且催促学校尽快找出中国校长的合适人选。虽然有不少西方教工害怕向政府登记将失去学校的基督教特点，但学校评议会认为

学校将不会有太大改变。学校评议会经过改组，中国人占了大多数，张凌高被选为副校长。1927年华西协合大学完成了向四川省教育委员会的立案工作，但向中央政府的立案则又经过了数年的协商。1932年学校评议会让位给指导委员会，张凌高接替美国人毕启成为第一任中国人校长。1933年华西协合大学向中央政府的登记工作最终完成。

华中大学的试办期从1924年开始到1927年结束，在随后的两年中华中大学不再存在。1929年第二个华中大学重新开办，校长为中国人韦卓民。韦卓民是1911年武昌文华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后去英国读书，192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92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宣教会议。1930年秋在华中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都感到应该尽快向政府立案。经过与资助华中大学的外国差会的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后，1931年6月华中大学正式向政府递交了立案申请。在申请书上华中大学声明，大学的宗旨是在基督教爱和牺牲的基础上，怀着把上帝之国以及永久的和平带给人间的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来发展人的智能。在宗教活动方面，华中大学宣称，所有的宗教活动和聚会，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由私人组织发起的，都不在学校的监督下，学生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参加。在课程安排上，华中大学表示将提供以下选修性的宗教课：宗教哲学、基督教思想史、基督教思想综览、中国宗教思想、耶稣的社会教诲、宗教心理学和道德训练。1931年底中国政府教育部正式注册华中大学为大学，其3个学院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政府承认华中大学的教育学院可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定，任何基督教机构是不能建立教育学院的，这说明政府对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工作非常满意。

燕京大学早在1927年2月就在北京的教育部立了案，但是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以前的注册宣布无效，燕京大学不得不按照新的条规重新准备立案的条件。在准备新的条件以前，燕京大学已经为注册作了一些调整。燕京大学聘请吴雷川为副校长；学校董事会也进行了改组，由中国人占大多数席位；宗教活动的参加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宗教课也都改为选修，学校的宗旨也改为：为了满足中华民国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该学校为社会的领导力量提供一种发展智力、道德和身体力量及装备的高等教育。然而这些调整还不能满足南京政府的新规定。按照新的规定，燕京大学必须有一名中国人做校长，而不是副校长，宗教学院必须从大学中分离出去，大学必须有3个学院，每个学院有3个系。为了解决校长的问题，燕京大学设立了校长和校务长。校务长由校长任命，须经董事会同意，其任务是协助校长的行政工作，并在校长缺席时代理校长一职。1929年燕京大学管理委员会聘请吴雷川为校长，司图雷登则担任校务长。燕京大学也建立了3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来应用社会科学院又改为法学院。然而燕京大学始终没有把宗教学院分出去。另外，燕京大学是否在政府教育部立了案，尚无资料可循。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燕京大学在政府完成立案。

1925年时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就作出决定向中国政府立案。1929年李天禄被聘为该大学的首任中国校长。李天路曾任1921年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秘书；1923年到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担任文理学院的院长，后又担任副校长。1931年12月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正式在政府立了案。

在教会大学中只有两个大学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教育法令抱有抵触情绪，没有作及时调整。一所是圣约翰大学，另一所是

杭州之江大学。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政府关于教会学校立案的法令，圣约翰大学内的教工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中国的教员几乎都赞成学校的宗教活动应以学生自愿为原则；外国教员则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站在中国教员一边，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退让将牺牲学校的基本特点，主张不作妥协。后一种立场主要以圣公会上海主教以及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代表。在1924年至1925年的年度报告中，卜舫济曾分析了解决这一困难的3种不同方法：（1）放弃基督教教育。卜舫济认为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为了基督教的利益，绝对需要继续在中国的基督教学校。（2）屈从。这将必定终止对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和宗教课的强制要求。（3）独立。这将使学校的工作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学校可能失去其声望，无法吸引非教徒的学生，这也意味着学校在当地收入的减少以及对纽约差传部更大的财物需求。由于在一所没有注册的大学学习而使圣约翰大学校友所遭受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而这些毕业生反过来给圣约翰大学带来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府对圣约翰大学不满，但却发现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质量足以适合政府的许多工作，这就使政府比较宽容毕业生与他们所受教育的未登记的教会大学之间的关系。在外交界以及医药界，如海关检疫处等，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还可得到政府的执照开业行医。尽管如此，每年毕业生还是担忧他们随时会失去工作。在1926年至1927年度报告中，卜舫济指出，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必须转到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下，然而有着足够教育经验可以担当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中国基督徒实在是太少，即使找到这样的人选，在这种非常的时期里，他们也难以抵制政府当局或学生联盟给他们的外在压力。革命正在进行，没人

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每一件事都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事是永久的。今年政府采取的教育政策可能明天就改变了。在一个稳定的政府建立以前，在一个确定的教育政策最终采纳以前，最好的方法是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或许可能重组学校，并逐步将学校的行政管理转到中国管理委员会的手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圣约翰大学一直等到1947年才向当时的中国政府立案。从1929年起圣约翰大学聘请沈嗣良担任副校长，卜舫济则一直担任校长直到1939年退休。

杭州之江大学早在1917年就曾考虑过向中国政府立案的问题，当时学校指导委员会中的中国校友极力主张学校向中国政府登记，认为登记后，学校不管在招生、还是在毕业生分配上都会有很多益处。然而登记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进行。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这一问题又重新提出。当时的美国人校长费佩得（Robert Fitch）提出辞呈，以便把这一位置交给中国人。8月25日学校指导委员会开会，接受了非奇的辞呈，选举中国人朱清农（译音）为校长，但当时规定朱清农要在美国差会同意立案的决定收到后才能上任。1928年5月学校指导委员会再次开会，外国传教士提出如果政府不作出两点让步，之江大学将不会立案。这两点让步是：（1）立案条款要同意学校有一个明确的基督教宗旨；（2）立案要授予学校的创办者以绝对的宗教指导及崇拜的权力。接着学校给纽约董事会打电报，要求董事会同意之江大学在宗教活动自由参加的基础上向政府登记。6月18日之江大学收到董事会执委会的来电："执委会不同意之江大学的立案和计划。"6月21日之江大学指导委员会执委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决定关闭该校，同时又给纽约董事会发出电报指出董事会的决定令人失望，立案是势在必行，否则这所大学就将关闭，你们能负这个责任吗。7月2日董事会回电说，如

果学校的基督教特点和宗旨能保持不变，不反对立案。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不会为教会学校立案的。7月5日之江大学正式决定暂时关闭该校。

在校友的压力下，1929年秋之江大学重新开学。当时政府拒绝让之江大学开学，因为还没有为之江大学立案。然而在1929年9月政府允许高级中学和初级大学先开学。校友仍旧催促学校尽早向政府登记，以取得完全大学的地位。由于政府坚持被注册的学校应没有宣传宗教的宗旨，之江大学对基督教宗旨作了以下调整：开办之江大学的宗旨是实现国民政府的一般教育目标，也是以基督教爱、牺牲和服务的精神，为中国社会的需要，准备有高尚道德水平、知识能力和身体训练的人才。1930年5月朱经农提出辞职，学校指导委员会选举李培恩为校长。李培恩是之江大学1910级的学生，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还从纽约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曾任上海商务出版社的英文编辑，之江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努力下1931年7月之江大学终于完成了立案程序，被政府注册为高级学院，校名定为之江文理学院。

除了教会大学外，教会中学也大多数换了中国籍人士当校长，向中国政府立了案。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一方面表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战略的一个调整，即通过基督徒开办教育的那种方式和精神，以及基督徒个人生命的活力，而不是通过大肆渲染的宣传工具去见证基督。虽然在教会学校中，行政、经济及人事权力还是由西方传教士掌握，但他们在形式上已经承认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这有利于教会学校与西方列强脱钩，对于教会学校的奉献精神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完全由中国人办

理教会教育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三　抗日战争以前教会学校的发展

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后，就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稳定的环境，不管是教工还是学生的心中都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学生们不会为毕业后的工作而过度担忧，教工们也不会为学校随时可能的关闭而焦虑。在此基础上，教会学校在抗日战争以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时，基督教在华教会学校增加到6000所，学生增加到约30万名，其中大学有16所，中学有200所，小学约5000多所。加上天主教的学生，整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80万名。到1937年时，整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约100万名，其中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36万多名。在华的教会大学也多为基督教开设，入学人数达到近7000名。与20年代相比，到30年代中期，教会学校的外来性已不再是社会批评的焦点，随着立案工作的完成，教会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燕京大学在1927年以后，开设把课程设置的重点放在文科上。司徒雷登延聘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教授执教，使学校的声誉日隆，投考的学生也大为增加。此外，学校还采取设置奖学金、工读计划和低价宿舍等措施，扩大招收一些家境较贫但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入学。燕京大学在向政府登记过程中在学校中设立了3个学院，其中文学院设有新闻系、政治系、哲学系、国文系、英文系、社会学系、历史系、教育系、音乐系等；法学院设有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等；理学院设有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心理学系、家政系等。燕京大学新闻系在近代中国十分出色。司徒雷登曾到美国与美国最有名的密

苏里新闻学院合作，延聘一些有名的新闻学教授到校执教。该系还设立了燕京通讯社，独立发稿、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等。其毕业生供不应求，有的被介绍到国内重要新闻机构任职，有的被派往国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闻机构派驻伦敦、巴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新德里等重要都市的负责人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燕京大学文科系中另一个较著名的系是社会学系，该系是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1928年该系在北京附近的清河开设了一个农村实验站，训练社会系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推行贫民教育和农业改良等活动。从1934年起该系又增设了农村社会学、农村教育、农村合作、现代欧洲农业经济、农村改良运动之比较等课程。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和汉学研究也是该校的一个重点。1928年司徒雷登与美国哈佛大学协商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该社规定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进行合作，培养汉学家。两校还分别在美国出版英文《哈佛亚洲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

为了使燕京大学更具国际化，司徒雷登还同英、法、德、日、意、俄等国广泛接触，进行合作。英国答应资助燕京大学实验“牛津导师制”，法国同意提供燕京大学学生留法助学金，意大利政府也答应提供留意助学金，德国政府则每年给燕京大学外文系一部分津贴。燕京大学很快成为具有国际声望的大学。

从1917年到1936年，燕京大学共产生毕业生约1700名，以在教育界工作的最多，其次为宗教界、政界、商界和新闻界；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占2%。燕京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非常广阔，这与该校英语教学的严格是分不开的。燕京大学的中外籍教师对教学工作都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既严格而关系又比较密

切，该校的教师队伍相当强。到1934年时，燕京大学共有110多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师有44名，中国教师67名，其中⅓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燕京大学的在校学生在1937年以前，每年人数不一，最多为880名。

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到1934年该校共有11个系提供研究生课程。当时教育部承认有研究生培养能力的系为4个：历史、生物、化学和政治学。在1937年以前，研究生人数最高达到过119人。

1931年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向政府立案后，其校名也随之改为齐鲁大学。1930年朱经农担任该校校长，他早年曾在日本学习，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又在美国取得学士、硕士学位。但他很快就去政府工作，离开了齐鲁大学。直到1935年，齐鲁大学才又聘请了另一位中国籍校长刘书铭。刘书铭是齐鲁大学的校友，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在二三十年代，齐鲁大学最强的科系是它的医学院。1924年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合并到该校，医学院的实力更加增强。齐鲁大学也很重视农村研究。1927年该校开办了一个乡村研究所，不久该研究所演化为农业系、经济系、教育系、保健系和家庭制作系。到1936年齐鲁大学的在学人数达到600人。

圣约翰大学进人20年代后，除了原有的文理学院外，又发展了一个民用工程系，后来该系发展成工程学院，在民用工程领域成绩卓著。该校的神学院一直发展不快，到1933年终于停办。由英语系开设的新闻学课程，后来发展成新闻系。在30年代，圣约翰大学的学术课目除了基础的文理学院外，还有专业性较强的工程、新闻和医学科系。该校的医学院虽然规模不大，经费也不足，但却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都到国外进行深造，回国后在教会医院中工作。1928

年圣约翰大学重新开学时，只有182名学生在大学部，1931年大学部的学生增加到270人。这以后入学的人数激增，1932年时达到700多名。从1936年起，圣约翰大学开始接纳女子入学学习，结束了它半个多世纪以来只招收男生的传统。与燕京大学毕业生的去向比较，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50％以上都到商界工作。在教会学校普遍调整的形势下，圣约翰大学也于1931年取消了强迫宗教教育，非教徒学生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宗教课和宗教崇拜。

沪江大学在30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就是于1932年3月开办了商业学校，一开始入学人数就超过500人，商业学校是沪江大学最成功也是最著名的科系。到1936年，沪江大学总共招收了2834名学生，学校中60％的教员都是中国人。

东吴大学在这一期间也在师资建设和学术水平上继续保持领先的高水平，其理学院和法学院成为该校的顶梁柱。理学院在禽学和昆虫学的标本收集上成果显著，1924年建立的生物供应站为中国的生物学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校理学院的毕业生，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都在中国其他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中担当骨干。法学院在1937年已有学生200多人，其师资是全国第一流的，其教学质量和毕业生在社会得到充分肯定。

之江文理学院于1929年重新开办后，当时招收了350名学生，而当时申请者高达900多人。这年之江文理学院也第一次招收了18名女生，开始了男女混合教育。在30年代之江文理学院发展较快的两个系为民用工程系与商业系，其水平已达到了学院的程度，文理学科，特别是汉语和生物也在师资和教学方面得到很大的加强。

1928年南京金陵大学向政府立案时，学生人数达到了近500人，其中女生有14名。该校的农学院成为当时中国领先的

学科。农学院下设有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林学系、园艺学系、乡村教育系、蚕丝系以及函授部等。此外该学院还举办农村干部短训班等。在许多地方，该学院都设立了实验基地。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则在英语和历史教学上有所加强。理学院的化学系、物理系、动物学系以及工业化学、电子工程、自动工程和视听教学等课程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到30年代中期化学系获得硕士授予权。

1927年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共有学生95名，教师24名，30年代初，该校学生很快增至200多名。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生物、化学、中文、经济、英语、历史、音乐、哲学、体育、物理、数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此外还有医学预科和护士专业。该校还建立了高级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培训师资人才。

福建协和大学于1930年新开办了一个农业服务系，该系开办得很成功，1935年福建省政府将其开办的农业实验站也转归该系，1936年国民政府也开始对该系进行资助。在这期间，农业服务系逐渐发展为乡村重建学院。从1932年起，福建协和大学还开始实行了男女混合教育，到1937年女生人数达到全校人数的¼。

岭南大学于1928年开办了一个准大学程度的农学院，1930年又接管了有90年历史的广州博济医院，这使岭南大学的医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孙中山医学院子1935年的建立。1929年岭南大学与铁道部合作建立了工程学院，后来该学院演变为理学院的一个系。从1933年起，岭南大学还与美国方面建立了学生交流计划。从1933年至1937年的4年间，先后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的26个学校的88名学生到岭南大学学习。到1937年岭南大学已发展为拥有文理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和农学院、学生人数达到近600名的综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在这一时期也加速了建设步伐，到1933年，该校学生人数达到了350名，整个大学由文学院、理学院、医学和牙医学院、女子学院和宗教学院组成。医学院与牙医学院是于1927年合并的，成为华西协合大学最著名的学院。1932年该学院内又设立了一个药学系，对于培养药剂师以及进行药物研究作出很大贡献，该系中的⅓的学生为女子。华西协合大学从1924年开始男女同校教育，1926年女子学院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该校的农业系建立于1934年，为该地区的农业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1926年华西协合大学建立了一个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该博物馆不仅在当地十分著名，而且在许多方面具有国际声望。

中国的教会学校在1937年前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教会教育的黄金时代。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教会学校也同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动荡不安，在许多方面元气受到了伤害。

四　抗日战争中的教会教育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以英美传教士为主体的基督教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1941年底由于在日占区大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教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在后方的传教士也不足1000人。同战前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减少了大约5000人。教会学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坏。以大学为例，教会大学在战前约有8000余名大学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到1938年，教会大学学生人数降到不足4000人。许多学校被迫迁移，教学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来依赖与美国的关系尚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教会学校也失去了安宁，除了圣约翰大

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外，所有的大学都开始流离失所。

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开办，两所学校合用图书馆和实验室。东吴大学的校园在1937年11月初被日本人占领后，学校不得不迁移，其大多数师生也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数次搬迁，也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该院在抗日战争中又恢复了原名之江大学。在上海租界的这4所大学作为一个“联合基督教学校”共同工作，它们共同使用所能得到的教学设备。联合学校的总部设在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由于当时公立大学未能恢复，报考教会大学的学生激增。到1941年，这4所大学的在学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租界，联合学校被迫放弃其工作，又开始了动荡不定的迁移。圣约翰大学是所有教会学校中受损失最少的学校，该校于1940年9月迁回到原校址，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1942年该校在学人数达到2200人。圣约翰成为日占区内惟一能正常开办的基督教大学。沪江大学则把一部分的教学工作留在上海，为了避免汉奸学校的名称，它又于1943年在重庆开办了商学院。东吴大学不得不分成若干部分继续生存，其文理学院留在上海办学，1942年春，部分师生与之江大学合作在福建北部邵武一带办学，还有部分师生迁到广东与岭南大学联合办学；194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又在重庆开办了分校，生物服务中心则分为上海和成都两部分。之江大学移到了福建邵武，其工程学院则搬到贵阳办学。到1944年底，之江大学在外地的教学工作全都被迫关闭，学生只好转到其他学校学习。

1937年底南京被日本兵攻陷，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建议低年级的学生

转到其他教会学校学习，部分学生转到上海，大部分师生经香港、汉口、重庆到达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南京的校园则变成了难民营，数万名妇女在那里寻求避难，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金陵大学也疏散部分师生去上海，大部分师生则经过长途跋涉于1938年春到达成都。金陵大学的文学院和农学院设在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内，理学院则留在了重庆，留在南京的员工在1941年前一直从事难民救济工作。

在成都寻求避难的第3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率先迁到了成都，1938年至1941年齐鲁大学曾试图在济南重新开学，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学校不得不全部搬到华西。

日军占领华北后，北京的燕京大学由于其英、美背景，没有受到日军的多大的干扰，《燕京学报》曾报道说："七七事变，本校巍然独存，弦歌不辍。且自由讲学，宗旨不变，不与敌伪发生任何关系。"[①]1937年秋，由于战乱，学生人数还是下降许多，当时只有300多人。然而由于其他公立大学的撤离，报考燕京的人数增加很快，到1941年时，在校人数达到1150名。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由于没有经费和时间建新的校舍，学校临时租用一些房屋，师生们则三两成群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成都。1942年10月燕京大学在成都重新开学，共有学生250名，其中150名来自北京。

---

① 《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随着教会大学的到来，成都成了战时中国大后方三大教育中心之一。另两个中心，一个是重庆，南京中央大学迁到那里，另一个为昆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那里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由5所教会大学组成的成都中心，可以说是这三大中心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中心。在战时的不利条件下，虽然在经费和师资上有很大缺陷，但5所教会大学汇集到一起，则带来了较丰富的学术课目，每个学校都接触到了以往自己学校所无法提供的课程。除了教学外，学校还研制药品，帮助中国工业合作工作，帮助制糖工业，进一步加强家庭经济学与农业的教学科研工作。5所大学还建立了联席校长会议和联席院长会议，在教学、行政上合作，许多课程都是向所有学生开放。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学水平比战前和战后要低。

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岭南大学又迁回广东内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38年5月撤退到南屏，福建协和大学则退到邵武。福建协和大学在邵武期间，其农业科研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农学院的发展最终使该校达到了政府立案的大学水平。华中大学也从1938年夏开始转移，由于成都已有5家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先是选择桂林为新校址，一学期后，桂林也变得不够安全，学校又往昆明转移。由于昆明也变得十分拥挤，华中大学最后撤到了昆明以西大理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也于1938年10月撤退，移到贵阳，1944年该校又移到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为4000人左右，连同教会中学，学生总人数约15万人。加上在上海的教会

大学的学生，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学生人数还是维持在战前的8000人左右。从总体上看，日本侵华战争给教会学校造成的损失不小。

五　抗战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毁损，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剩下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数座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

同其他学校相比，上海地区的4所教会大学面对的迁回原址的困难最小，距离上海最远的杭州，也只有100多英里。圣约翰大学是惟一在敌后维持在自己校园中教学的基督教大学，故没有迁回的问题。这一时期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于1947年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立案，该校也是最后一家向政府立案的基督教高等院校。1948年至1949年圣约翰大学的在校人数达到1300人。沪江大学于1945年10月在租界中重新开学，1946年4月才迁回到原校址。东吴大学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在上海开学，而在苏州的校园直到年底才恢复，但在上海的部分一直未能迁回苏州。东吴大学分成上海、苏州两部分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建立。之江大学于1946年秋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同时开学，杭州校园主要为低年级学生，上海则为高年级学生，在学人数达到近900人。1948年6月之江大学正式被确认为大学，当时该校设有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工学院。

南京的两座教会大学，由于远在成都，加上返迁的人太

多，只好又在成都留了一年。1946年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宝鸡、徐州，用了近3周的时间从成都返回了南京校园。尽管有许多困难，该校在学人数1947年时达到332人，接着又升到近500人，达到该校的历史最高纪录。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春返回南京，经过3年的时间，其学术科目不仅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并且还有了一些发展。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大多数中外教员都留了下来。

由于迁移的困难，齐鲁大学在成都一直留到1947年夏。回到济南的校园后，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由于内战的爆发，齐鲁大学的医学院不得不移到了福州，文理学院则搬到了杭州。随着杭州和福州的解放，齐鲁大学在这两地的教学工作最终停止。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毁坏，战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复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1945年10月部分在北京的师生重开了燕京大学，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则因运输困难，继续留在那里，1945至1946学年，燕京大学在北京和成都两个中心同时进行教学工作。在成都的师生回到北京后，1947至1948学年，在学学生人数达到了941名。1948年底北京和平解放时，大部分师生都留了下来。

福建协和大学于1945年秋迁回了福州的校园，经过整修，到1946年5月才正式开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于1946年3月全部搬回福州。尽管经济上的困难，1946至1947学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在学学生人数达到228人，1948至1949年度在学人数更超过300人。相反福建协和大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发展迟缓。

岭南大学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返回了广州的校园，并于1945年10月开学，入学人数很快超过战前水平，1945至1946学年在学人数为近800名，第二年则超过1000人，1949年9月时更

达到1200人。华中大学于1946年春开始从云南搬回武汉，同时学校又买了一些地，扩大了拥挤的校园，入学人数也不断上升，到1948年秋，在学人数已达600人。

在大后方惟一不需移动的学校是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在其他教会大学搬走后，立即制订扩建计划。这一时期，该校扩建了美术系，新建了护理教育系，1948年春时，在学人数达到1770人。

总之，在1949年10月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以及学生运动，教会教育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参考书目：

Ethel Wallace, *Hua Nan College -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李桂林：《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九章　教会学校的学术贡献与教育成果

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一些中国传统学校中没有开设过的课程，一些中国古代较少听说的知识都被介绍了进来，当然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较大的还是教会大学，它们所介绍的西学知识较全面，也较系统。在1900年以前，教会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主要集中在人文科学和纯自然科学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侧重读经注经的教育体制较容易接受这些学科，另一方面这些学科在西方也是教会所熟悉、神职人员所需要的。早期的教会大学往往只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或文理学院，以人文科学和纯自然科学为主要课程。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对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的需要日益增加，各种专业人才备受青睐，教会大学也开始进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教育，如医学、农业学、经济学、工程学、教育学等。特别是在20年代后半期教会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期间，由于立案的条件规定，大学等级的学校必须包括3个学院，所以各教会大学在原有的文、理学院的基础上纷纷组建第3个学院，而这一学院多以专业教育为主。不管是在纯理论的学术方面，还是在实用性的专业教育方面，教会大学不仅只是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课程，而且还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出了当时在中国属于领先水平，甚至在国际上也较有影响的贡献。

一 人文科学

教会学校在中国传授的最早的西学知识之一就是英语。大多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自美国和英国，他们的母语为英语，教授英语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大多数教会学校都提供英语课。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中设置英语课的是上海英华书院，1865年英华书院决定在学校中教授英语，并准备条件许可的话，还可进行一些其他课程的英语教学。这以后，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中陆续地开设了英语课。教会大学出现后，许多大学还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如圣约翰大学、北京汇文大学等。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开设了英语课。教会学校在早期强调英语，部分原因是中国社会广泛的需要，部分原因是西方教员占了绝大多数，还有部分原因则是缺乏中文的教科书。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普遍高于当时中国世俗的学校。最开始，教会学校中的英语教员主要为传教士的妻子，英语也是作为一种工具来教。随着一批学术上合格并经过专业训练的中西教员的加入，英语逐渐成为学校中的学术科目。岭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英语教学在中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在教会大学中，英美文学以及高级语言课程几乎全由英、美教员主讲，其水平也明显高出中国的世俗大学。教会学校在把英语引入到中国教育领域的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满足中国社会对英语的需求作出了贡献，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拥有英语知识的人才，使这些人可以用英语来服务中国社会。教会学校在英美文学等方面的教学工作则在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在教会学校中普遍教授的西学知识是音乐，这是因为

音乐与崇拜密切相关，教会需要具有音乐才能的同工。几乎从一开始，音乐就在所有教会学校的教育中占了一席之地。19世纪50年代时，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Nevius）的夫人曾在宁波组织了一个很好的唱诗班，这个唱诗班可以演唱全部4个声部：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其精确度令人难以置信。在教会大学中，音乐教学课程和课外音乐活动都在学校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福建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都设有音乐系。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合唱队，学生唱诗班或圣乐会。许多清唱剧，如韩德尔的《弥赛亚》、斯坦纳（Stainer）的《耶稣受难》等，曾在许多地方多次被演出过。教会学校的音乐课程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兴趣，也培养了许多音乐教师和风琴手。

二　自然科学

虽然教会大学开办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回应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受教育的需要，但教会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既不是狭窄的，也不是只突出人文主义的，而是非常广泛的。几乎从一开始，教会学校就有一定程度的科学定向，并且在办学过程中，在科学，包括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科学教育的某些方面，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起了先驱的作用，在一些特别的领域，它们无疑是异常杰出的。教会大学在中国迈进近代西方科技世界的过程中，为中国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及早期指导者对科学及其他与福音无直接关系的领域的兴趣经常是超前的。甚至在任何类似大学的迹

象出现以前，狄考文就已经开始给神学生教授物理和化学了。1881年时他甚至找到一架10英寸的望远镜用在天文学课上。贾德森也在杭州长老会学院开设了最新的数学和物理学课程，20世纪初，他又给该学院带去最新的无线X光设备。

开办教育的传教士对科学的兴趣，无疑又被中国渴望分享西方科技文明的需要所鼓舞，并为学科相对平衡的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保证。1900年以前的教会学校都设有科学课程，而20世纪初建立的教会大学或者开始于单独的理学院，或者始于合并的文理学院。大多数教会大学的本科科学教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理学院往往成为各教会大学中力量最强的学院。在某些方面，教会大学的自然科学教学水平名列全国之首。这样的成果往往产生在具有特别财力、人力资源的学校，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和雅礼协会等资助的学校。

在教会大学的形成阶段，一批受过当时良好教育、在自然科学方面成绩杰出的学者被吸引到这些学校中，最初的自然科学教授几乎全是西方人。20世纪初，美国Vanderbit大学的生物学家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加入新成立的东吴大学；数年后，美国Wooster学院的生物学家马尔济（Arthur W.March）来到杭州之江学堂任教；1907年宾州州立学院的园艺家高鲁甫（George Weidman Groff）开始了他在岭南大学的卓越工作；1911年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晏文士（Charles K. Edmunds）也来到岭南大学教书；同年英国曼彻斯特的化学家斯塔布斯（Clifford Stubbs）加盟华西协和大学；1915年，宾州州立学院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生物学家阿道夫（William H. Adolph）来到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任教。到1920年，大约50多名拥有高级学位的西方科学家任教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中。

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曾在教会大学中学习，后又去国

外深造的中国科学学者回到母校执教，他们中的许多人获得了博士学位，是非常杰出的学者。这批中国学者都在教会大学中担任重要职位，许多教会大学的中国籍校长都有这种经历。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分别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获得博士学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3个主要自然科学系的主任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该校毕业生。

教会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项工作是东吴大学的生物服务中心。该中心提供了当时在中国无法得到的一些特殊原料。在这以前，中学和大学一直依靠国外提供生物方面的材料，特别是寄生物学方面的材料。此外，当地的手工艺者也被鼓励去生产金属或玻璃的基本科学实验设备。

虽然教会大学经常面临设备和经费不足的困难，但中外籍的科学家们还是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工作主要分布在营养学、陶瓷学、化肥学、遗传学、地理学和地貌学、昆虫学等领域。有些教会大学还建立了杰出的标本收藏室。格罗夫在岭南大学收集了代表5000多种植物的1.2万多个标本，他对1万多种植物所作的笔记也赢得美国同行的好评。南京金陵大学收集了3万多经济植物的标本，6万多昆虫的标本和4.5万多华西植物的标本。燕京大学编写了1.9万多个中国昆虫的目录。

教会大学自然科学系的研究成果在许多著名的学术刊物，如《福建协和大学科学学报》、《岭南科学学报》以及《南京学报》上发表问世。许多成果也在其他科技刊物上发表，这些刊物包括中国的，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在这些研究成果中，3项在植物学方面的杰出成果赢得了国际声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陈庸（译音）教授发表的《中国树木分类学》、史德蔚（Albert N. Steward）教授编写的《中国长江下游维管植物手

册》和《格罗夫收藏报告》。

教会大学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不仅在科研教学方面为这些在国外获得高级学位回国服务的毕业生所充实，而且也为其他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科学家。教会大学在这些工作上的贡献远远超过仅仅教授科学知识和技术。1955年《美国科学家》杂志刊登了55位中国教会大学毕业生的简历，其中27人是物理学家，28人是生物学家。此外，美国的高等院校也由战后一批中国学者的加入而实力大增。

三　医学教育

190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教会学院都毫无例外地由文学院或文理学院组成，课程的重点是放在人文科学和纯科学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有增无减，到1920年以前，全部教会大学的学生有⅔是在文学院学习。这种现象受到了当时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出，教会大学在学术方面强调的太多，而涉及中国年轻人专业需要的培训太少。在社会的压力下，教会大学逐渐开办了一些专业教育工作。到1937年实行专业教育的学院和系达到了近30家，其中医学院有6家，农学院2家、农学系1个、工程学院1家、工程学系4个、商学院1家、工商管理学校1家、教育学院1家、法学院1家、乡村重建学院1家、乡村重建系1个，另外还有近12家神学院。到1937年文科的学生降至只占全部教会大学学生人数的⅕。

教会大学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就是医学教育。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最早的西医诊所、医院和最早的医药培训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医学院，这些医学院通常与教会大学联系在一

起，它们对传播西方的医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为中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力量。

同教育宣教一样，医药宣教在基督教传教士到达中国后不久就开始了。早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就在广州开办了一个眼科诊所，然而医药宣教大规模的展开则是在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才出现的。医院很快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建立，发展非常迅速，到1876年传教士开办的医院达到16家，诊治过的病人有4万多名，1889年教会医院猛增到61家，病人有35万左右，而在医院以外的医疗活动及诊治过的病人就无法统计了。

几乎从一开始，医药宣教就担负起了培训中国助手的工作。开办于1895年的广州博济医药在1866年成立了南华医学校，该校成为最早有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这所学校由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J.G.Kerr）和中国第一位西医黄宽负责教学，专收男生。1879年该校接受了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不久，相似的药学培训也在其他城市的教会医院中展开。到1893年，已有151名男生和28名女生在教会的医学培训班中受过医学教育。虽然这些医学教育的水平比同时代欧美的医学教育低很多，但中国近代的医学教育正是从这里形成雏形。

最早设立医学部的教会大学是圣约翰大学。1880年时，当时的圣约翰书院就开始了一个医学系，提供一些中学以上的课程；1896年该系成为医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必须从大学预科毕业，该校提供4年的医学课程，这是中国近代医学高等教育的开始。圣约翰书院第一届医学生于1900年毕业。1886年北京汇文大学也建立了医学系，该系与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的同仁医院有合作关系。1905年该系与洛克哈特（Lockhart）协和医学院合并组成第一个北京协和医学院，新的医学院受到了中国官

方的欢迎，官方对该院资助并授予毕业生中国官方的科名。

进入20世纪以后，一批新的教会医学高等教育机构又被建立起来。1902年英国传教士在汉口建立了一个协和医学院，该院起初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大学，1917年迁到济南，并入山东基督教大学。在湖南长沙，“耶鲁在中国”于1908年开始了医疗工作，1912年并与湖南省政府达成协议，由省政府出钱，“耶鲁在中国”出人，共同开办一家医学院，1916年湘雅医学院正式招生开办。根据湖南省政府与“耶鲁在中国”的协议，一所护理学校也于1913年秋开办。这座护理学校的创办者是盖奇（Nina D. Gage）女士，她是中国近代护理工作的先驱，曾帮助中国建立了中国护士协会。在华东，柏乐文（W. H. Park）医生于1904年开办的一所医学校后来成为东吴大学的医学系，1912年该系关闭，东吴大学将重点放在医学预科培训上。1911年7家美国差会在南京合作开办了一所协和医学院，1913年该院成为南京金陵大学的医学系，不久杭州医学院也加入该系。1916年该系转到济南，并入到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医学院。在上海，4家妇女宣教会于1924年开办了女子基督教医学院，该学院教学设备齐全，教学水平也很高，⅔的教员为妇女，虽与圣约翰大学有合作关系，但该学院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在华南，20世纪初，华南医学校在1909年与成立于1901年的哈肯特（Hackett）女子医学院合并，实力大增。广州基督教学院也于1907年开办了一个医学系，但该系于1914年停办。1928年岭南大学接办了博济医院，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于1935年再次开办医学院，该院被命名为孙中山医学院。1910年福州曾建立了一所协和医学院，但该院仅生存了10多年。

在华北，最强的医学教育中心之一是在济南。济南的医学培训工作开始于1910年，是由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共同主

办的。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议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医学院应成为用汉语教学的高水平医学院，这与用英语教学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好相反。中国医学委员会也开始资助该学院。在随后的两年中，金陵大学的医学系和汉口协和医学院加入了该学院，1924年华北女子协和医学院转到济南，也成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医学院的一部分。

在东北，1912年苏格兰和爱尔兰传教士开办了奉天医学院，1924年该学院开始招收女生，到1940年学生人数达到129名，其中男生98名，女生31名。在30年代后期以前，奉天医学院一直是一家独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后来该校改名为奉天医科大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该校。

在中国开办的最成功的医学院之一是在成都。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要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培养医生，1914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开办4年后，医学系正式开始了教学活动，当时的教师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生。1917年在可能是来华的第一位传教牙医林则（Ashley W. Lindsay）的主持下，华西协合大学开办了一个牙科诊所，林赛所教授的牙医课逐渐形成了牙医系。到1922年牙医系发展为一个学院，该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牙科医生和牙科教育工作者。1927年至1928年，牙医学院和医学院合并，形成医学与牙医学院。该学院的课程是仿照美国A级医院和牙医学院的模式开设的，水平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该学院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到1948年，医学部在学人数为376人，牙科部有学生76人，几乎一半的学生为妇女。

教会开办的医学院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一直名列前茅，他们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国外的大学深造。基督教医学院不仅是中国医学教育的先驱和推动者，并且也将西方近代医学的概念

和值得效仿的模式介绍到了中国，它们引进了基本的技术和工具。教会医学院还翻译了一大批标准的医书。早期医学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严重缺乏中国的西医书籍，这对用英语授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倒不算什么困难，但对用中文授课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奉天医学院等学校来说，教科书的缺乏就成为了紧迫的问题。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医药传教的先驱合信（Benjamin Hobson），他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就已经开始了西医书籍的翻译工作。1850年他在广州编译出版了《全体新论》一书，原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大纲》，这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的第一本比较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此外，他还翻译了《西医略论》、《内科新论》和《妇婴新说》等书。嘉约翰医生从70年代起编译了《西药略说》、《割症全书》、《化学初阶》、《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名目》等近15本西医西药书籍。到1900年时，一本包括1.5万多医学和科学名词的英汉辞典，以及一本《解剖学》又被翻译出版。这些书虽然很有用，但还是不够，还需要更新，许多空白需要填补。1900年以后更高级的医学教科书，如有关眼科学、皮肤病以及有关中国疾病的书又被出版。在编译医书方面比较系统且卓有成效的机构是山东基督教大学的译书局，该译书局得到中国医药宣教协会出版委员会的赞助，由原汉口医学院的吉林逊（Thomas Gillison）医生负责。译书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和修订医学教科书，包括创造一些中国传统医学所没有的新名词。他们编译的教科书所覆盖的领域包括解剖学、外科学、组织学、胚胎学、产科学、病理学、生理学、矫形学、皮肤学、性病、内服药、妇科学等。这些教科书被几乎所有的用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医学院所使用。

最重要的是，中国近代的医疗事业是由基督教传教士，特

别是他们的医学院所创立的，这些医学院培养出一大批训练有素、优秀杰出的医务工作者，也为中国公、私立的医学和牙医学院输送了大批教学人员。他们的贡献在牙医方面尤其突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华西协和大学是在中国惟一培养合格牙医的学校。山东基督教大学的药学系和华西协和大学的药学系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贡献。

在1900年以前，在中国培养出的近代医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基督教医学院的成果。随着中国公、私立医学院的发展，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教会医学院的贡献仍是举足轻重。1930年时，当时的教会医学院共有学生355名，以往毕业生则有近千名。当时教会医学院的毕业生占全国医学毕业生的10%。

教会医学院在医疗宣教方面的另一贡献是提供了护理教育。教会培训学校在妇女护士教育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教士以及传教士培训出来的护士是中国护理事业建立的关键人物。

四　农业教育

教会大学在中国起到先锋、领导作用，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个专业教育是农业教育。虽然中国的第一所名符其实的农学院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传教士所从事的农业教育则很早就开始了。19世纪末传教士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农民的经济福利，这种关注主要是由19世纪70、80及90年代中国灾难性的大饥荒引起的。当时为了对付这些饥荒，传教士曾引进一些优良果树，改良一些粮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些工作主要是实践性的。20世纪初传教士开始一些初级农业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传教士的工作。20年代初时，中国教育委

员会曾进行过争论，认为专业技术教育不是教会大学所应有的功能。1914年以前，中国的教会大学中一直没有农学方面的课目。1914年南京金陵大学率先建立了农科。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该科的建立经过。虽然开始时该科只有两位教师，12名学生，但不久该科就成为一个稳定的教育专业，并且成为金陵大学中最强的部门之一。

这一时期，广州基督教学院和燕京大学也开设一些农业指导方面的课，“耶鲁在中国”则开设一些与生物相关的林业课程，不过这些教学工作很快就停止了。1921年岭南大学建立了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农业系，该系的强项不是在教学方面，而是在科研方面。

教会在山东的农业教育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1923年潍县的文华中学开办了一个农学部，开设一些农业和农业心理学的课程，并往南京金陵大学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山东基督教大学的神学院也于1927年在济南附近开设了一个乡村研究所，不久该研究所发展为农业与经济、教育、保健和家庭制作4个系。乡村研究所在科研和社会培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34年该所出版《田家》，发行量很快达到3万份。

从1919年开始，福建协和大学就开始了非正式的有关蚕、米和重新造林方面的研究工作。1936年乡村重建学院正式在福建协和大学中建立，抗日战争期间，该学院发展为农学院。在华西大学，农业方面的教学工作也在2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迪肯森（Frank Dickinson）博士引进了良种公牛，对当地的牧畜进行改良，他的成功导致了四川乳制品改良协会的建立以及改良牲畜的广泛散布。奶羊和家畜的改良则是后来的重要发展。与此同时，对水果、蔬菜和玉米的研究也开始进行。农业方面的课程先是在神学师生中开始，1934年农学系正式成立。

1941年农学系发展为拥有4个分支的农业研究所，这4个分支为：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食品和营养学、畜牧和兽医学以及园艺学。

教会大学在农业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教会大学为中国官立和私立的农学院提供了农业教育、科研、社会培训的模式。中国官立或私立的农业教育机构都是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农学教育实践后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在促进和建立这种教育方面起了先驱作用。

其次，教会大学为中国的农业教育提供了一批急需的人才。金陵大学农学院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在30年代，该学院毕业生分布在许多农业机构中担任要职，当时7家官立农学院的负责人都由该系毕业生担任，国家农林部5个国家研究所中的3个也是该系毕业生主管。教会大学农学方面的几百名毕业生在改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中起了不少作用。

第三，教会大学在农业科研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迅速超过耕田的增长，加上各种天灾对农田的损害，所以急需生产力的增加。教会大学在改良各种农作物，发展农业工具和技术，以及农村的社会、经济研究方面，为满足农业生产力增加的需要作出了杰出贡献。金陵大学从20年代就开始了预防饥荒的科研项目，这些科研工作成功地改良了麦子、稻米、玉米、黄豆、谷子和棉花，这些科研成果在华中、华北得到普及。到1937年时，27个新的农作物种子被大面积播种，其中麦子的产量增加了20%。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通过选种和控制病虫害，使柑桔和蔬菜的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金陵大学在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方面，在中国起了先驱的作用。卜凯（J.Lossing Buck）所著的《中国农村经

济》（1930）一书成为中国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他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一书，分析了整个中国的土地状况，对中国的农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此外，金陵大学还对中国古老的农业文献进行了收藏、整理，出版了《农业目录》。岭南大学和金陵大学还进行了养蚕术方面的研究，通过普及无病蚕种，使养蚕术得到改进。齐鲁大学的乡村研究所推广介绍了病虫害控制方法以及改良种子的方法等，并在山东地区进行了经济、营养和保健方面的科研、普及工作。福建协和大学进行了稻米育种、提高麦子和大豆产量以及发展果树、重新造林等方面的实用研究。华西协合大学则在家畜和果树改良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教会大学在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实践的社会培训工作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分发改良种子和秧苗。据统计在30年中，金陵大学共分发了2000吨的麦种和1500吨的棉种。岭南大学和金陵大学还分发了改良蚕种。华西协和大学则在四川一带分发改良的牛种、羊种和鸡种，以及水果和蔬菜种，使这一地区的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金陵大学还对农民进行培训，通过短期课程和培训班，以及有关稻米、棉花和柑桔的简易教材，使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许多教会大学还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以及抗战后的乡村重建工作，力图帮助中国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教育和卫生的问题。

五　其他方面

除了医学和农业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外，教会大学还开设了其他一些当时的中国尚无力举办的专业教育。20世纪初，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小学校迅速增加，然而，

师资的供应却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的需要，因此，教师的培训很早就成为教会大学的一个目标。虽然教育系的发展一直很缓慢，但到1920年时，多半的教会大学都设立了教育系，并且教育系也成为各教会大学中力量相对较强的部门。由于教育部规定只有公立大学可以建立教育学院，所以许多教育系都未能继续发展成为教育学院。教会大学中惟一设有学院级教育学院的大学是华中大学，另外有12家教会大学设有教育专业，到1934年时，在学的教育专业的学生共有272名。两所女子文理学院对教师培训都予以特别重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尤以其体育方面的工作而著名。一大批教会大学的毕业生都转到各级学校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时，据报道，教会大学有30%的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时，这一比例增加到38%。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技术的迫切需要也促使教会大学开始发展一些工程学方面的课程。早在1920年以前，圣约翰大学就开设了工程学的课程，不久又建立了工程学校，教学内容主要为民用工程方面。20年代初期，杭州之江大学的建筑系演变为工程系，该系是所有教会大学中惟一达到工程学院水平的部门。1930年岭南大学建立了民用工程学院，该学院很快就作为一个系并入了科学与工程学院。30年代初期，金陵大学也在理学院中发展了一些电子工程和工业化学方面的专业。

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教会大学的文学院很早就开始提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不久经济学系也在一些教会大学中建立。教会大学经济系的重点是放在实用方面，而非理论方面，以帮助毕业生能够在不断扩展的工商领域工作。在1920年以前，有些教会大学就开始提供工商方面的课程。杭州之江大学开办了商学院，后来又改名为工商管理学院。岭南大学的工商管理系发展成了商学院，圣约翰大学的工商管理系则合并到

经济学系中。1930年上海沪江大学建立了都市商学校，该校很快成为沪江大学最著名的部门。

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不重视法制，现代意义上的法学的传播也是从教会大学中开始的。然而正式开展法学专业教育的教会大学只有东吴大学一家。其他教会大学大多设在经济和政治学系中，从政府学或政治科学的角度看，这些系本来应是法学院的重要部门，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则通常把这些系放在文学院中。东吴大学的中国比较法学院，要求学生学习民法、中国法和英美法，该院成为中国水平最高的法学院之一。到1936年时，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中有95人到国外留学深造，72人从事法律教学工作，4人成为其他法学校的校长，31人成为法官。

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不管受没受过专业教育，几乎都在各种专业领域工作。1900年时教会大学所产生的250名毕业生中，有10%在教会工作，25%从事社会或宗教工作，另有25%从事教学工作。到20年代，教会大学产生的毕业生达到2000多人，其中50%的人仍从事以上三方面的工作，但只有5%的人在教会工作，15%的人从事社会或宗教服务，大部分人转入专业工业领域。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前，教会大学贡献给中国社会的毕业生达到1万人左右；其中3500多人从事教学工作，大多在教会学校，500人从事社会和宗教服务工作，100多人在教会工作，700多人从事医药工作，近400人在农林领域工作，100多人从事工程工作，300多人在法律界工作，另外还有很多在工商及社会生活领域工作。毕业生中尚有1100多人继续深造，其中300人赴国外留学。到1950年时，教会大学又培养了另外1.6万名毕业生，教会大学在不到70年的历史中培养毕业生的总数为2.6万多名。另外还有3.5万到4万名学生曾进入

教会大学读书，但没有完成其学业，所以总起来说，受过教会大学教育的中国学生总数可能达到6万至6.5万名。

参考书目：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08-1950.

第十章　教会学校今何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除台湾、港澳外的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由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美国与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关系进一步处于完全对立中。中国政府把美国积极参与的朝鲜战争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因此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从这时起，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与美国有关系的一切活动都被停止。由于教会学校大多是由美国传教士开办，与美国的关系过于密切，故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格外注意。50年代初，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断绝教会学校与美国的经济来往，中止美国对教会学校的任何影响力，并逐渐把教会学校国有化。1952年中国政府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使原来的教会大学与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融合在一起，组成新的大学，而教会大学原有的校名都被取消，新的学校或延用公立大学的校名，或定以新的校名。教会大学虽然在名义上被取消，但它们的校园还在，它们的师资还在。院系调整后的大学自然包括许多教会大学的成分，教会大学只是被拆散组合在不同的大学中。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自然有教会大学的成分。在这一章中，我们就来探索教会学校在50年代初的历史性结局以及教会大学的成份在今日的分布。

一　教会学校的历史结局

齐鲁大学是第一个被解放的基督教大学。1948年9月济南被解放军攻克，齐鲁大学成为共产党执政的解放区内首座教会大学。同年底燕京大学也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归入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到1949年底，随着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普遍建立，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处于共产党政权之下。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由于百废俱兴，人民政府尚无暇顾及教会学校的事务，教会学校在近3年的时期内仍然保持它们的名称，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然而学校的工作和生活则产生了许多变化。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配合新的形势，一些政治教育的课开始出现，如“新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革命”等。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也许对这些课程感到很熟悉，不会感到有什么不自然，然而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又以宗教为宗旨的教会学校来说，这样的课程还是很陌生和不适的。除了政治教育课的增加外，教会学校还成立了一些讨论小组，参加这些讨论虽在名义上是自愿的，但无形的压力使得不参加几乎不可能。教师和学生花去大量的时间参加这些政治学习和讨论，正常的教学工作势必受到影响。例如，当时燕京大学的教师每周要用12个小时开展政治学习，这种情况持续了6个多月。应该指出这种政治学习或政治课并不是专门针对教会学校的，而是当时各行各业全体人民都要参加的，这种学习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了顶峰，现在已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淡化。

与此同时，政府发动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对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也影响很大，使学习的时间更加减少。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把许多教会

学校的教师拖了进来，他们被要求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自我检查，许多人不能过关。学生们在这些运动中则显得很活跃。而土地改革运动则把教师和学生从校园带到了农村，很长时间内学校的学术科目无法如常进行。

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在资金方面。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教会学校的经费遇到重大问题，当时中国政府允许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暂时接受国外津贴，故来自美国纽约支持教会大学的资金帮助这些学校生存下去。1950年由于中美双方都参加了朝鲜战争，成为战场上的仇敌，纽约的资金运到中国变得非常困难，不久中国政府也中止了教会大学接受美国的津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这就波及到所有在华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中工作人员的生活。为此，1950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首先处理和接受了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当时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共20所，受美国津贴的17所；中等学校共514所，受美国津贴的约占半数；初等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有1133所，受美国津贴的约占¼。接着中国政府又发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开始处理接收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将其全部收回自办。自此开始，教会学校结束了其在中国的历史使命，真正融为了中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新中国刚成立时，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员虽然心神不定，但仍然留了下来。然而随着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越来越紧，以及社会上对“文化帝国主义”指责的日益强烈，外籍教员再次成了公众批判的目标。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加剧了外籍教师在中国的不稳定地位，他们越来越为公众所不能容忍。在认

清已无法有效地工作并已成为中国同事的包袱后，外籍教员开始陆续离境。1950年时少数外籍教师就开始离境，1951年离境成了大规模的行动，到1951年底，几乎所有的外籍教师都走光了。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东吴大学的外籍人员早在1950年底就已人走楼空，大多数教会大学在1951年完成外籍人员的离境过程，燕京大学是最后一家撤退外籍教师的教会大学，到1952年该校的美国和英国教员才最后离境。从1949年起，所有的教会大学在政策及管理等事务上就已经纯中国化了，到1952年这些大学彻底成为没有西方人员的中国大学。

二 院系调整与教会大学的分解

虽然合并到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是教会大学的必然命运，但这一合并的形式、时间和进程对每个教会大学来说都不是一样的。1951年底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可以说是把教会大学融合到新中国教育体制中的最后一步，院系调整的目的是要改变旧中国高等教育文理科多工科少、重工业和制造专业更少的畸形状态；改变地区分布不合理、设校设科无计划，以至院系重复，人力物力分散，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的状况。院系调整的最初方案早在1950年就制订出了，但由于当时许多学校的抵触，该计划迟迟未能贯彻，直到1952年6月到10月，院系调整才得以完成。院系调整工作并不是直接针对教会大学而来的，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被调整，但院系调整后，教会大学的名称无一得到保留，校名延用其他大学的名称，这或许表明了新政府对教会大学某种程度的不信任。

齐鲁大学是较早被吸收到新教育体制中的教会大学。济南解放时，齐鲁大学的大部分都移到了外地，所以解放的是一个

空校园。随着杭州、福州的解放，移到外地的齐鲁大学的师生又面临着返回的困难。对于文学院，政府的回答很简单：停办。医学院于1949年秋回到了济南，入学人数猛增到800人，但由于校园被政府机关占用，教学空间变得非常拥挤，许多学生只好住在地下室等地。1950年底，政府正式接管了齐鲁大学，1952年夏整个学校被重组，其医学院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山东医学院，原齐鲁大学的校园由新组成的山东医学院使用。齐鲁大学理学院的部分科系和神学院则转往南京，前者合并到新的南京大学中，后者则并入金陵神学院。齐鲁大学理学院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师生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以及天算系和文科的部分教师则合并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拥有70年历史、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北京解放后，燕京大学很快被确认为北京的4所大学之一，一些教员也被任命到重要的教育岗位上工作，在学人数一度升至1200名，学校充满了乐观气氛。不久随着社会上各种政治运动的进行，燕京大学也开始了频繁的讨论会和控诉会，许多教员都被揪出批判。到1951年春，燕京大学开始国有化。在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的工程学系与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合并到清华大学中，清华大学成为一所高级工业大学；而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则与燕京大学相对应的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北京大学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名则被取消，其校园由北京大学使用。

在南京的两座教会大学最初并没有感到新政权的影响，1950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举行了35周年校庆。不久，学校的科目、人员和课程开始出现频繁的变化。1951年初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到南京大学中，1952年原金陵大学中的电子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与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及之江大学的建

筑系又合并组成了南京工学院。南京大学的校址建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中，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则由南京师范学院使用。

杭州之江大学在建国初期，由于校长离任，学校由一临时理事会和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1950年夏，之江大学的商学院被取消，其民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并到浙江大学中，浙江大学成为一所高级工业大学，而浙江大学的文学院则并入之江大学。院系调整中，之江大学的文学院又与其他一些院校合并组成了浙江师范学院，地址设在原之江大学的校园上。

华中大学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从1951年开始，与私立中华大学、公立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组成华中高等师范学校。

人民解放军进入福州以后，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仍然继续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1950年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中断了与西方的一切联系，同年秋外籍人员全部都离境。1951年1月，政府将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同另外两座学校合并组成了福州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园用作福州大学的农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则用作福州大学的理学院。

岭南大学在广州解放以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一直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在课程中则增加了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朝鲜战争开始后，国内的反帝情绪日益高涨，1950年12月在华的美国人都被视为帝国主义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员开始离境。1951年岭南大学继续作为一家私立大学运行，1952年初人民政府接管了该校，岭南大学的工程系与其他学校的有关科系合并，组成了一所独立的

工学院，其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成华南医学院，其他部分则与中山大学合并，成为中山大学的文学院。

在上海的两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又度过了建国后的前3年。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上海仅保留复旦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另外又组建了一批新的理工学院，而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校名被取消，这两座大学融合在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中，结束了其教会大学的历史。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同震旦大学医学院以及同德医学院合并组成上海第二医学院，以原震旦大学的校园为校址。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沪江大学的政治系、社会系、东吴大学法学院等合并，组建成华东政法学院，校址在原圣约翰大学所在地。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震旦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与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组成华东师范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8所院校的土建学科并入到同济大学中，使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在全国享有盛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体育系与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系科合并，于1952年成立了华东体育学院。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东吴大学的中文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与私立江南大学和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合并，组成了一所新型的师范学院，校名为苏南师范学院，校址设在苏州赐庄原东吴大学的校址上。

1951年1月，人民政府接管了华西协合大学，并将校名定为华西大学，由著名生物学家刘承钊任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中，华西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设医学、口腔、卫生、药学4个系和1所综合性附属医院。

1949年秋长沙解放后，湘雅医学院被接管，由湖南省政府领导，1952年改属卫生部领导，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托管。1953年湘雅医学院更名为湖南医学院。

三　教会学校今何在

从1952年院系调整至今，40多年已经过去，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如果综观今天的中国教育，你仍然会看到许多教会学校的成份。数以万计的教会中小学改变名称后，已经融化到中国的教会体制中，这些教会学校的房舍还在，继续为中国教育发光发热；而教会大学除了为当今的中国高等院校提供了一批美丽的校园外，它所培养出来的师资以及原有的科系仍分散在许多大学中发挥作用。由于院系调整取消了所有教会大学的校名，并将这些学校拆散重组，仅从现在校名，我们很难找到教会大学的成份，故我们还要从历史的演变，追踪教会大学在今天的成份。

从北往南，我们首先来到北京大学。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镇的北京大学校园是原燕京大学的校址，1952年底院系调整将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并，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今的北京大学是在燕京大学校址上数所高校合并的产物，每年校庆时，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也返校，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庆祝。北京大学隔壁的清华大学在1952年合并了燕京大学的工程学系，也吸收和保留了教会大学的成份，所以燕京大学分散在今日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

到了济南，在山东医科大学的校园中，你会看到齐鲁大学的旧址，而山东医科大学也是由原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其他医学院合并而成，初名为山东医学院，1985年更为现名。齐鲁大学的其他部分则保存在山东师范大学中，该大学的前身是山东师范学院。今日的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成为储藏昔日齐鲁大学的两所高校。

在南京，昔日金陵大学的校址上耸立着南京大学，而南京大学本身则集中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的许多科系，由南京工学院发展成的东南大学也含有原金陵大学的科系。如果要一睹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高等学府”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则应去南京师范大学，该校于1984年由南京师范学院改为现名。故昔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日化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中。

今日的苏州大学建在昔日东吴大学的校址上，其前身是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为现名。江苏师范学院本身则主要由东吴大学及其他两所学校合并组成，所以今日的苏州大学不管在校园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原东吴大学的转化。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分化在今日的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中，其中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就是原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改为现名，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园就是昔日圣约翰大学的校址。上海沪江大学则分散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中。今日上海的这4所高校包容了昔日的两座教会大学。

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原华中师范学院就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融合了华中大学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所以昔日的华中大学与今日的华中师范大学有着亲缘关系。

杭州之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分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的数家大学中，我们从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杭州大学中都可以看到之江大学的成份，而今日的杭州大学就是建在原之江大学的校址上，杭州大学的前身是浙江师范学院，是由之江大学的文学院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而成，所以今日的杭州大学具有之江大学较大的代表性。杭州大学近年又并入了浙江大学。

今天设在湖南长沙的湖南医科大学就是昔日的湘雅医学院，该院1953年被改名为湖南医学院，1987年更名为湖南医科大学，现在该校已恢复了与美国雅礼协会（Yale - in - China）中断了20年的关系。

1985年四川医学院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该校的前身就是华西协合大学，今天的华西医科大学仍设在原华西协合大学的旧址上，华西协合大学由昔日的综合大学演变为今日专门的医科大学。

1953年由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校组成的福州大学易名为福建师范学院，1982年该校又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所以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包含了昔日的两所教会大学。

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都吸收了原岭南大学的科系，其中中山医科大学是由中山医学院于1985年更名而来，昔日岭南大学的校址为今天中山大学的校园，故岭南大学现已分化到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中。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对教会大学在今日中国的分布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教会大学对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

参考书目：

Chung Shih, *Higher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Hong Kong: The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53.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 - 1950.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黄展鹏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概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赵亮宏等主编：《中国高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编：《中国高等院校简介》，香港：香港汉荣书局，1987年版。

《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高等学校简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十一章　基督教参与中国教育的展望

一　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成败

教会学校开办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传福音，把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皈化为基督徒，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教会学校在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和强壮上作出了不少贡献。虽然教会学校的工作不是集中在培训神职人员上，但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教会形成了一批杰出的领袖，并且它们还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才。如果没有教会学校，中国的教会可能要弱得多。然而在教会学校被政府接管后，很少有教会学校的毕业生表明其基督教的身份，或参加正式的宗教礼拜，从这一福音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教育不能说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从20世纪起，传教士对教会学校的目的已有了新的看法。1922年中国教育调查团提出6条指导基督教教育的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指出，教会教育应该按照政府的政策行动，第二条指出，教会教育必须满足中国社会的教育需要，第六条指出，教会教育应该，特别是在一般民众中，促进普通教育。二三十年代大多数教会大学申请政府注册时所提出的宗旨也都宣称，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为中国社会培训有用之才，是以基督的献身精神，通过办教育，为中国社会服

务。从这一方面看，教会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应该说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教育领域。教会大学在19世纪为中国提供了第一批近代的高等教育，进入20世纪后，教会大学仍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并且位居领先位置，50年代院系调查后，教会大学虽然结束了其作为独立的私立大学的历史使命，但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留下了积极的和重要的因素。至今不少中国民众对基督教之所以有较好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了教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将教会学校国有化，彻底切断学校教育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联系，这一方面表明新政府对教育主权的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100多年来侵略中国的不满情绪。由于基督教在华的一切事业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保护，甚至利用，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基督教也就是一种殖民力量。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新政权决心在中国基督教事业方面，禁止外国势力的插手。这一政策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学校在50年代初消失后，没有恢复或重新发展的原因。

二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所从事的教育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束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教会也开始重新开始活动。在教会重新恢复活动后，许多教会和教徒也积极从事教育活动。

作为教徒个人来说，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主要是同他们的职业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如果教徒本身从事的职业是教育工作，他们从事本职工作本身也就是基督徒参与教育工作的一种

形式。比如，一个基督徒在中学任数学老师，那么他的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基督徒对教育工作的参与。当然，不在教育领域就业的教徒参与教育的机会就相对较少。作为教会组织来说，它们举办各种补习班、辅导班，为社会服务，这是教会参与今日中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国内的许多教会在举办英语辅导班、艺术培训班等方面，给予社会许多贡献。

除了国内的教会和教徒外，国外的教会和教徒也想方设法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由于中国政府和教会都主张中国的教会要自传、自养和自治，所以对中国以外的基督徒来说，很难获得合法地参与中国基督教工作的机会。许多热心于传福音的国外基督徒都采取讲学的形式到中国工作，他们讲学的内容几乎包括各个领域，但最多的还是英语。在美国和港、台等地都有一些基督教机构和个人负责与中国政府联系，安排这些讲学活动。1983年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的对华教育服务中心，就是一个海外基督徒参与中国教育的机构。该中心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热衷促进中美友谊及文化交流的基督徒团体和个人的捐款，其工作人员多数为热衷中西文化并通晓中、英文，同时具有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基督徒，其宗旨是通过为中国推荐高质量的教育人才，介绍现代知识，以促进中国现代化，并加深中美人士之间的了解，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该服务中心向中国提供的教育人才几乎涵盖各个领域，这些基督徒教员所从事教学的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济南、咸阳、武汉、广州等许多中国大中城市。我们看到，许多基督教机构都已经认识到，不应狭窄地把教育看成传教的辅助手段，教育本身就是基督徒向世人所作的见证，故许多基督教机构都明确地把教育作为他们工作的宗旨。海外的教会中不光有新成立的旨在向中国提供教育人才的机构，并且传统的基督教福音

机构也开办一些短期的到中国进行教育培训的活动。成立于1947年的中国布道会就经常组织一些海外的基督徒到中国教英文。1995年夏，该机构选派了5名基督徒到湖南常德进行为期两周的英语特别培训，80名中国的中学英语教师参加了这次培训。一般来说，在华讲学的外籍教员中许多人都有基督教的背景，他们在华的讲学活动实际上也是国外基督教参与中国教育的一种形式。

虽然从50年代初起，教会学校在中国就已不复存在，但从80年代初起，国内外的教会和基督徒又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服务于中国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基督教与今日的中国教育仍然发生着关系，基督教仍然在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

三 基督教参与中国教育的展望

不管是从世界历史来看，还是从基督教会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基督教一般来说，是从文明较高的地区向文明较低的地区发展，基督教本身所代表的较高文明是它能够在世界流行并为许多民族所接受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教会发展的早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其废墟上惟一残留下来的文明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在西欧的蛮族中传播，最终成为西方的主体文明。近代开始的普世宣教运动，也是基督教由高文明的欧洲传向亚、非、拉的过程。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曾在世界文明上尽显风流，但在近代则衰落不振，这是不争的事实。故基督教在近代也挟其在世界各地流传的雄威，来到古老的中国，这对当时古老且衰弱的中华文明无疑是

一个挑战和刺激。作为当时世界领先文明的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这一文明重要因素的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进步更是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教育是帮助基督教在各地流传的一个重要手段，基督教在许多地区都是通过办教育来打开传教的局面，这几乎形成了一条规律，至今，许多宣教机构仍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缅甸、泰国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开办学校，期望藉此打开宣教的局面。我们尚且不管基督教传播的情况，就教育本身而言，传教士主持的这些学校无疑会改善这些地区的教育状况，使这些地方的教育走向进步。根据基督教在全球传播的规律，我们可以说，只要有低于基督教文明的地区存在，基督教就有机会参与这些地区的教育工作，基督教教育就大有可为。

那么，基督教是否还可以像以前那样在中国开办各级学校呢？这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包括中国社会的需要、基督教本身的能力、中国政府的政策等。反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下半期，中国的传统教育已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必须引进近代先进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而这些工作在当时又不可能由中国本身的教育系统自我完善，这一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传教士的身上。由于传教士来自西方，熟知西方的教育，因此他们就很自然地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介绍到了中国。所以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教会学校开办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均领先于中国，来自国外的大笔捐款很容易满足开办学校的费用，加上英美等国的基督徒大学生很有热情到中国工作，所以当时的教会在资金和人员方面都不缺乏。在中国政府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开办各种学校，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教会教育有较大的干涉，也不可能真

正拥有教育主权。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产生教会学校的许多条件也都有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社会的需要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已与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接轨，在课程和学制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多少差别，在教学质量上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从每年的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选手的实力，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教育水平的一种表现。但是，目前中国教育的弊端在于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在偏远地区、广大农村，教育水平、学生就学率及校舍状况都与沿海地区与城市有较大差别，目前中国实行的希望工程就是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仍然需要各方面力量对教育的帮助，在这一方面，基督教还是大有可为的。从基督教的能力来看，在国内的教会除了维持自养外，要筹集大笔资金办学并非易事；而外国的教会，它们在中国的教会实行三自后，对向中国宣教的兴趣已大不如前，海外的华人教会虽然对向中国宣教非常积极，但大多没有大宗派的背景，属于地方性的独立教会，对办教育之类的社会工作兴趣不大，并且财力有限，较难筹集大笔资金。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今日的中国政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府，并且是以无神论为信仰基础，对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一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宗教，是采取一种宽容但不鼓励的态度。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政府也多次发布政令，不允许宗教团体在中国开办学校，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如果要以传播信仰为宗旨开办各级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的确有参与中国教育的机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只要有不发达地区存在，基督教就有从

事教育活动的可能性。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前景也是如此，中国广大的边远、落后的地区为基督教教育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我们必须指出，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应该首先是中国基督徒的任务，国外的教会和教徒不能也不会成为中国基督教教育的主力。外来的帮助只能产生启蒙和推动的作用，而主要的动力和源泉还是存在于中国基督徒中。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深知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心态、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缺陷，他们与自己的同胞朝夕相处，感情浓如血，最能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重担。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教会在经济上会更加充实，参与及开办教育的实力会进一步加强。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则在另一方面为基督教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放宽了余地。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政府需要把基督教中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因素挖掘出来，教育资源无疑是这种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统一战线以及加快建设步伐的考虑，政府在号召社会办学的同时，有可能允许教会开办不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

在未来的中国，由政府掌握教育主权、由教会或教徒开办的各级学校或许是基督教参与教育的最可行、最理想的模式。开办这种学校的经费主要以教会的捐款为主，教员由学有专长的基督徒担任，教学质量超过一般学校的水平，除了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外，还有强调爱心教育。

至于在近期内基督教参与及支持中国教育的途径，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对国内的教会和教徒来说，鼓励从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做好本职工作，对基督徒、对社会都是有益无害，通过模范的教学工作，基督徒可以将基督之爱彰显出来，服务于社会，荣神

益人，这也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见证。从教会团体来说，他们可以组织教会内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向社会提供各种实用性的教育，这种非学校性的教育应该是可行的，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教会在经济方面有所富裕，也可以参与政府提倡的希望工程，向边远落后地区提供资助，帮助建立学校及失学儿童入学。

国外的教会团体或个人如果有意于中国的教育，则可以在这几方面努力。一是选派一些学有专长的基督徒，通过交流渠道，到中国的各种学校中从事教学工作，一般来说，只要不以公开传教为目的，这样的活动是受政府的欢迎的。二是捐款帮助各地，特别是有迫切需要的地区建立各级学校，当然这些学校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三是在中国及国外设立一些奖学金，资助中国的学生、学者在国内的学习和科研，以及到国外进修提高。只要没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一切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益的工作都会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欢迎。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真正以中国人民的福利为己任，只要心中真正充满基督的爱，只要真正具有献身精神，基督教是会为中国的教育继续做出贡献的。这种荣神益人的教育工作也正是基督徒最能震撼人心的见证。

后　记

在北京大学读书、教书10多年，学习、工作之余常到未名湖畔、办公楼前漫步遐思，看着湖光塔影、雕梁画栋，一天的疲倦似乎都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知道，这座举世闻名的美丽校园是原燕京大学的校址，许多人还能向你介绍，临湖轩原是司图雷登的校长办公室，一到六院原是学生宿舍。然而，对于这所教会大学的历史、对于基督教与燕京大学的关系，却很少有人知道。

基督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常常有一种洋教的形象，加上近代以来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密切关系，许多人对基督教印象不佳，基督教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教会教育也成了一种文化侵略。以往所出版的大多数有关中国教育史的书籍大都把教会教育一笔代过，或斥为奴化教育、文化侵略。几乎没有一本书较翔实客观地介绍基督教在中国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并对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教会教育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进行公正的分析、论述，这种缺欠不仅使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难以深入进行，而且也使中国教育发展史难以展现出完整的全貌。

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是在教会教育的影响和示范下开始的，西方传教士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中首先引进了欧美的教育内容和制度，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血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首先从教会学校中出现的，女学、大学、留学，这些标志着教育近现代化的要素

都由教会学校为中国的教育所提供和倡导。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在今日中国的教育中仍然能被体会到。

自1986年从事基督教的教学研究工作以来，一直有种要把中国基督教教育史整理出来的愿望，但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这一愿望长期没能实现。1992年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后，有幸与加拿大安大略神学院中国研究部的陈荣毅先生相识，诚蒙陈先生的邀请和鼓励，开始动笔撰写该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得到陈先生的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陈荣毅先生的协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在资料的整理和输入抄写等许多方面，妻徐兰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此也表达我的谢意。

王忠欣

1995年8月于美国波士顿

回 应 与 思 考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读后

凡　夫

自唐代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来中国传教并在中国产生一定影响之后，基督教便开始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关系。尤其是明代中后期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进行科学文化传教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而近代基督新教向中国的传播，不仅自觉继承和发扬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进行科学文化传教的传统，而且在进行教育传教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旅美学人王忠欣先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基督教教育事业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篇幅虽然不大，但是几乎涉及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社会教育、特别是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主要方面，对于了解中国近现代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对于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和中国近现代社会及科技文化的影响，都有一定的积极价值，并有助于我们对于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发展相关联的若干重大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

对于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开办教会教育的认识，首先必须立足于近代西方基督教差会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的传教运动。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首先不是中国自己的教会开办的，更不是中国人自己率先开办的，而是近代西方基督教差会来华开办的，因此，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首先应当被看作是西方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向东方推进、特别是向中国推进的一个结果。只有通过了解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真实目的，我们才能真正比较客观地评价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教育传教的历史意义。

早在宗教改革时期，由于新教的冲击和海外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天主教会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海外传教热忱，不仅有多米克尼会和法兰西斯会等将基督教传播到美洲，而且以耶稣会为代表致力于向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传播基督教。耶稣会士的东来，直接导致了以澳门为代表的东方基督教文化中心的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国际性的教会大学——澳门圣保罗学院。这是中国教会大学之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之始。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礼仪之争的困扰，于18世纪中后期几乎在中国歇绝，而曾为基督教向东方传播之标志的圣保罗学院，也几经大火的侵袭而消失。直到19世纪初叶，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向东方的扩张，早先为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重新获得向东方、尤其是向中国传教的机会；而欧美地区的新教传教士，也在帝国主义扩张势力东渐的支撑下，掀起了向中国的传教运动。

正如一位教会史学者所说，“福音奋兴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近代新教传教事业的兴起”。新教传教士向中国开展

的传教活动，与18世纪至19世纪欧美正在兴起的“福音奋兴运动”和“大觉醒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时期罗马天主教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成绩甚大。但新教因地理位置关系与异教地区缺少联系，加上一些内部问题和神学见解有分歧，以致长期在传教事业方面不能与天主教同日而语。然而，17世纪荷兰征服锡兰、爪哇和台湾，新教传教事业也随之开始。为响应约翰·埃里奥特在马萨诸塞地方印地安人中传教的努力，1649年国会决议建立英国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新英格兰海外广传福音会。”“1701年又组织了海外广传福音会。从1705年起，德国虔敬主义推动了哈雷的丹麦人积极开展传教工作。”特别是詹姆斯·库克船长在政府的赞助下从1768年直到逝世在太平洋上作考查航行，发现了许多新陆地，从而在大不列颠唤起了对这些地方的非基督教民族传教的兴趣。1795年跨教派的伦敦宣教会成立。4年后，代表英国国教会福音派的圣公会传教会成立。19世纪初期，英格兰循道宗宣教会、苏格兰教会宣教会等也相继成立。伦敦会、圣公会和循道会等海外传教机构，先后来到中国传教，并成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主力。①

“英格兰传教义务感的这种深化，广泛引起了其他国家对传教事业的兴趣”。②1799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公理会教士大会召开年会，会议列举了不利于基督教的种种表现，诸如基督徒道德的堕落，怀疑精神的盛行，对福音的蔑视和不信任以及参加礼拜人数的下降等，认为只有大力复兴原始基督教教义和仪式，才能重新获得广大民众的信仰。于是，在美国产生了

---

①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596页。

② 同上书，第596页。

与欧洲奋兴运动相呼应的所谓“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也是基督教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海外传教活动。这次基督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许多接受过正规科学文化训练的青年大学生们积极参与进来了。这无疑使基督教的海外传教运动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也充满了文化色彩。这一点在19世纪末叶的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1888年7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罗伯特·怀尔德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成立由当时宗教复兴运动著名领导人穆德和怀尔德领导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并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宣教对象。“从1886至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传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主要是大学生而非旧有的保守的上层宗教人士。他们既有年轻人的热情，又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不满足于老一代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强调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改革。他们并不急于拯救个人灵魂，而企图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① 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两个重要口号：“使世界在我们这一代福音化”和“福音化就是文明开化”。说白了，他们来中国和到世界各地传教，就是要用高度发达的以基督教福音为重要精神支柱的西方文明，来影响和带动已经远远落后的中国和其他非基督教民族或国家，使之走上现代文明、进步的发展大道。而那些受过良好的现代高等教育训练、又具有高度基督教传教热情的学生志愿者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文明开化运动的主力，并使这场空前的西方文化传播运动取得成功

---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成为可能。事实上，近代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正是以美国的青年海外传教组织为主体的。正如王忠欣先生所说：

从19世纪80年代起，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到中国宣教的主力军。这些大学生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大学，中西部开始取代新英格兰成为大多数传教申请者的诞生地。这些宣教自愿者大都生于东部的大城市，很少有来自乡村背景的。与传教士大多来自贫穷家庭的传统看法相反，大多数宣教自愿者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由以上可以看出，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传教士在文化教育素质方面普遍高于早期的传教士。[①]

如此出身和文化素养的大批青年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基督教，给中国带来的当然不仅仅是早期的传教士所能带来的基督教的福音，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文明和文化内涵。他们来华创办各类教育和文化机构，正是这场文明开化运动向中国推进的直接结果。

当然，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毋须否认这场以学生传教士为主角的西方对华传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运动有直接关联。尤其是对于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和充满夷夏文化观念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来保障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权利，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传教者们就不可能顺顺当当地来中国传教；通过他们所带来的实际为中国社会所急需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教育，就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传播到中国来并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不能否认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利用了帝国主义势力，这使他们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阴影。

①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第六章。

那么，这是否就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势力的代表呢?

不可否认，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的确有人充当了帝国主义向中国扩张势力的代表。比如说，近代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就曾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并担任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参与了许多美国对华政治侵略活动。[①]其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如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谢卫楼、丁韪良、狄考文等，都曾参与了西方列强对华扩张的活动，连一些有正义感热爱和平的美国宗教界人士，都曾谴责他们甘愿做列强的帮凶和鼓吹对华侵略战争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耻辱。[②]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西方列强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利益得到保证；传教士们来华的主要任务也就突现出来了。因为西方基督教差会派遣他们来中国是为了传教，而不是充当政府的旗手和帮凶。这实际上也是近代西方政教分离之后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当伯驾和卫三畏被美国政府任命官职时，派遣他们的美部会就曾毫不客气地将他们除名。

---

① 不过，伯驾来中国传教，并非出于侵略中国的野心。他来中国前一时期，在华南开办医院，进行了大量的救死扶伤工作，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广泛赞誉。后来，美国政府出于他在华经历和对华情况的了解，要他出面参与美国政府对华事务，才走上了美国对华扩张势力的道路。因此，对伯驾的认识，似可分前后两期来看待，可能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点，美国学者史景迁和中国学者吴义雄、王立新等都有所论述，参见：史景迁《改变中国》，第二章，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义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三章，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② 详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二章。

19世纪末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特别是美国的学生传教士，已经不用为过多地谋求本国政府对华势力的帮助，而是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文明开化运动”。因此，在19世纪末以后，我们虽然经常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对传教士在华权利的保护，但很少看到传教士与本国在华势力相勾结推行霸权主义。也就是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西方来华传教士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面向中国现实需要的传教方式上。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年轻传教士从此来华开展医务传教、科学传教和教育传教等活动。正如王忠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19世纪末来华开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西方传教士们，都受到过良好的西方科学文化教育，不少人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们所开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对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非常注意吸取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经验教训。他们到中国来传教，除了注意获得政府的保护外，更重要的是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医务传教、科学和教育传教和农业传教等传教活动。

正是在这样一种根据中国现实需要、注重传教方式的潮流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投身于医务传教、科技传教和教育传教等事业。而正是在这种特别注重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传教活动中，传教目的与传教手段有时发生了分离。

其实，从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起，他们虽然来华只是以传播基督教福音为目的，但是，随着他们来华开展各项医务传教、科学传教、教育传教和农业传教等传教活动的深入，不少

传教士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偏离了传教的轨道，而把传教方式本身当作了目的。这一点，在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中，从医务传教中产生出“传教医生”，就是一个明证。伯驾在为美国政府效劳之前，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他于1840年曾自省来中国六年后，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务工作中，不能如来华之初所企图的那样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的“基督教精神较之开初已大为淡漠”，甚至产生了信仰危机，设想过退出教会，以至于他在1845年不得不接受差会传教部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而不再支持他的决议。以科学和教育传教的傅兰雅和丁韪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丁韪良在来中国的船上，感觉到他来中国就是要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异教徒接受基督教文明的福音。等他来中国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要想让这些异教徒接受基督福音非常不容易。于是，他努力寻求打开中国人思想之大门的新方法。他发现，中国不仅缺乏基督教，而且也缺乏与基督教紧密相关的西方科学。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后者更容易接受。所以他得出结论，以科学为主导的西方化，必须优先于传播基督福音，才能有效地导致皈依。由是，他积极参加了清末同文会馆的教授之职，并向美国差会理事会辞去传教之职而就任同文馆馆长，全身心地投入同文馆的工作，并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晚清培养了大批西学人才。

傅兰雅的情形与丁韪良比较相近。他也是满腔热情来中国传教的。但是他来中国后逐渐发现，“介绍基督教只能小心谨慎，循序渐进。只有这样，基督教才有可能被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欣赏。”而“利用间接方式传教所能取得的广度和深度，才会大大超过预期设想。”于是，他在1862年辞去《教会新报》主编的职务，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当科技翻译，

并很快受到重用。他说他现在开始做他非常想做的事情了，因为他一直非常喜欢科学事业，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和机会去研究。不过，在中国政府任命他为翻译官之前，他对不能实现来华传教的初衷感到忧虑，曾写信给卫三畏主教表明自己的想法，觉得从事中国政府所要求的“纯世俗的工作”有悖传教使命。卫三畏等差会负责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实际上，傅兰雅终于选择了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角色。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他将西方大量科技著作翻译到中国来，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巨擘。直到他1896年回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他在中国的最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完全脱离了传教初衷，而成为一名来华传播西学的纯粹的科技翻译专家。

很显然，丁韪良和傅兰雅在后来实际上成为向中国传播西学的纯粹的科技翻译和教育专家，与他们来华传教的初衷是完全背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人看作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把他们的科技教育工作看作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伯驾、丁韪良和傅兰雅等早期传教士或短期或长期对传教初衷的脱离，实际上说明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常常走上不同的道路。有的人恪守传教初衷，无论是以什么方式传道，都不忘向中国人传播基督福音，争取更多的皈依者，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内地会传教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另有些人则逐渐脱离了传教初衷，寻求更切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科技、教育等各种西学传播活动。

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狄考文于1890年传教大会上说过：

当代教育的许多方面虽说不是怀疑宗教，却也是非宗教的。因此有好些人准备反对整个教育工作，不愿意将西

> 方科学引进到中国来。这既不是正确的政策，也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所在。我们不相信愚昧就是虔诚之母。在中国我们不能不从事教育工作，不管同意与否，西方科学将照样输入中国。教会要是明智的话，就应当站在教育工作最前列，在中国取得如同它在西方国家所取得的地位，充当中国比较高级和优化教育的先驱，这是它固有的权利，也是它应尽的责任。这样做既可扩大科学和文化的影响，也可促进教会自身的发展。①

这也就是说，随着来华传教的现实条件的改变，传教士们不能停留于直接的宣传和布道上，而应当特别注重扩展切合中国人现实需要的传教方式。当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急需科技和教育。教育和科学传教自然成为传教士非常注重的传教方式。

实际上，19世纪末叶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包括美国学生传教士，许多人虽然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在中国所从事的科技推广和文教等活动，已经明显超越了传教的范围。尤其是20年代中国化运动和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后，各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只有⅓、甚至更少的人信奉基督宗教，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信仰基督宗教，有些甚至对基督教有反感情绪。但是，这不仅没有削减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大力开办教育、传播科技文化的热情，而且也没有使支持来华传教的各西方差会中断对教会学校的各种支持与帮助。教会大学在20年代以后才真正进入成熟发展的时期。

各基督教差会之所以那么热心于在中国开办教会教育，当

---

① 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1890)，朱有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然有其传教目的，但他们并非在信奉基督教的人明显减少的情况下而有意转向单纯的世俗教育，而是着眼于长远目标，考虑到公开的宗教影响不能发生作用时，应当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一些差会在阐释办学宗旨时，明确地改变了那种赤裸裸的宣教性质，而是改为以基督教精神从事科学文化的传播活动，表现基督精神来为中国人民造福。美国的博尔敦于1926年发表在《教育季刊》上的文章《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便很明确地说："表现基督的精神乃是基督教教育的基本目的。若把这个基本目的应用于中国，应用于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上，则基督教教育便当以全力增进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宗旨。"

近代教会大学兴起之时，正值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世纪之初以反洋教为旗帜的反帝国主义义和团运动，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不可谓不后怕。义和团运动中受到直接冲击的，当然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对于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相关联的基督教传教运动所具有的敌对情绪，更深刻地感受到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信仰和文化的冲撞。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鼓动，实际上也是进一步推动民族自觉观念的增长。对传教士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许多都是基督教徒或是受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或帮助。这也就是说。来华传教士不能无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热烈欢迎向中国传播西学，而不是帝国主义势力。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传教士在中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也只有通过兴办教育、传播科学和文化、开展社会服务事业等等，才能够表现出来。

恰值这个时期兴起的教会大学，虽然也存在西方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以致引起一些民族爱国主义的冲突，正如王忠欣

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 在教会学校中，确实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袍有盲目的西方白人优越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学生指手画脚，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多少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与教会学校中一些传教士所持有的西方白人优越的心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也突破了校园的围墙，扩展到社会上，使20年代的中国不断出现排外反帝的浪潮，教会学校自然也成为公众斥责的对象之一。[1]

但是，教会大学本身很难与帝国主义势力划等号。且不说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许多爱国人士、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爱国外交家，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就是在每个教会大学里工作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极其爱国的知识分子。

最重要的当然是主持教会大学的西方传教士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教会大学在传教与科学文化教育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应该说，没有哪一所教会大学没有传教的目的，否则，西方各基督宗教差会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为中国兴办高等教育。所有教会大学的创办宗旨，都是明确地标榜传播基督教福音，使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教。问题在于，在兴办教会大学的过程中，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往往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作为传教方式的教育本身往往成为传教士工作的主导方面，时常压倒了传教工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教会大学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和神学院不断地在减退，宗教教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尤其是国民政府颁布禁止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之后，教会大学大多取消了宗教的必修

①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第八章。

课程。到了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差会所实施的宗教性的影响自然也明显地消退，教会大学与普通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在培养的毕业生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这也就是说，教会大学在早期虽然表现出很强的宗教功能，但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这一宗教功能逐渐减退，而原先置于第二位的教育功能逐渐占据优势，并成为教会大学最重要和最大的功能。换言之，教会大学并非始终扮演着传教的角色，而是逐渐转变成特色鲜明的科学文化传播基地。

三

关于传教士来华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王忠欣先生在第七章中分别从“传教士参与中国官方学校的教学工作”、“传教士倡导、参与中国官办大学的创建工作”、“传教士与近代留学潮”和“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简明扼要的阐述。他还在第九章就教会学校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贡献和教育成果，作了简要的介绍。从这两章，我们足见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

近代中国教会教育的研究，应当注重探讨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各基督教差会与各教会学校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第一部分之所以作如是简要的阐述，目的只在于以此说明只有弄清各教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所受西方差会的影响，才能真正认识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实际功能。否则，我们很难去合理评价教会大学的学术贡献和教育成果的历史地位。在这方面，王忠欣先生之作就显得明显不足，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徐以骅博士的新著《传教与教育：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一

书，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也为我们研究教会教育树立了典范。徐以骅之作紧扣美国圣公会与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关系，通过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圣约翰大学从创办到消失整个历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关系变化，多角度地透视了圣约翰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王忠欣先生之作特别引人注目的部分，要算最后一章《基督教参与中国教育的展望》。因为基督教在中国仍然存在，而且有发展的趋势。从目前的中国情况来看，西方基督教差会很难得到允许再来中国开办教育事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基督教徒在推动中国的教育发展方面无所作为。王忠欣先生正是思考这一现实问题的。他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的确有参与中国教育的机会，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只要有不发达地区存在，基督教就有从事教育活动的可能性。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前景也是如此，中国广大的边远、落后的地区为基督教教育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读到王先生的上述想法，我们自然想到上面已经提到的1926年博尔敦说过的话：基督教教育应以全力增进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宗旨，任何国家的基督教教育的具体目标，应以适应该国家的环境情形为准。其实，这是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徒共同的认识。基督教虽然非常重视传播基督福音，但是，基督教并非为传教而传教，而是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根本目标。因此，当历史发生了变化，基督教应该依照不同的情况作出调整。近代历史上出现的传教医生或传教教师，其实他们并非违背了基督教的精神，而是以服务社会来表现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如果脱离社会，为教而教，而不是为社会而教，那将从根本上背离了基督教的爱人救世之宗旨。那么，当代中国

的基督教徒，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途中，应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近代以来，教育的落后一直是制约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今的中国，教育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国广大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还非常落后。国家也多次明确地鼓励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都来参与兴办教育。具有丰富的办教育的历史经验的中国基督教徒，应当积极顺应历史潮流、适应时代的需要，大力开展基督教教育事业。

正如王忠欣先生所说，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应该首先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任务，而不能像近代那样依赖国外的教会和教徒。这是当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的，也是中国基督教徒自主的最好体现。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的中国基督教徒的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基督教徒，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而农村的基督教徒是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是贫困和边远地区的农民基督教徒。也就是说，面对中国当前的国情，基督教教育的重任，可能首先应放在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上。中国基督徒如果提高了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基督徒的科学文化素质，就是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当然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了搞好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基督徒已有的科学文化资源。目前，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国基督教徒人数有限，他们在向广大信徒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把弘扬基督教精神与建设富强民主中国的伟大理想结合起来，自觉地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支持和参加乡村基督教教育事业，为

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中国的基督教徒应当大力发扬基督教的爱人救世精神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每年都有许多次较大或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给国家和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广大基督教徒在自救的同时，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救济事业，尤其是受灾地区失学儿童的救助工作，在恢复校舍、补充师资和解决生活和其他学习等困难方面，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方面，近代基督教徒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除此之外，我还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国目前基督教徒的状况，许多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文化素质亟待提高，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事业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几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神学院，如金陵神学院、华东神学院、燕京神学院和中南神学院等。这些神学教育机构在改革开放以后，为恢复中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毕竟由于恢复神学教育的时间还很短，加上许多自身素质方面的客观原因，需要努力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还很多。这里除了提高神学素质以外，可能还需要更多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不仅仅是只会布道，同时还应当为改善当地信徒的科学文化素质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一个成功之处。布道传教并不是最终目标，也不应当是惟一目的。布道传教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增进广大人民的幸福。广大教牧人员应当树立这样一种布道传教的最高目标，结合中国现实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提高广大信教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乃至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早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类的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